

秘密的中国

基希著 周立波译

群众出版社

20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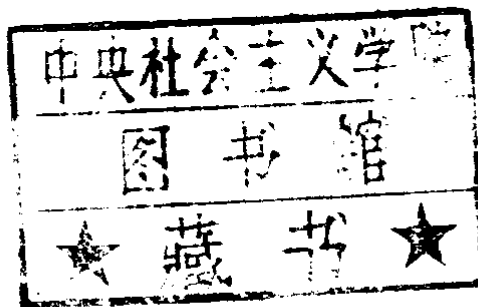


200403740

秘密的中国

(捷)基 希 著

周 立 波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35/18

封面设计：申菊芳

秘 密 的 中 国

(捷)基 希 著 周立波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6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12 定价：0.78 元

印数：105001—142000 册



基 希 像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埃贡·埃尔文·基希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家。他于1885年出生在布拉格，1948年逝世。他是用德语写作的捷克作家，曾先后到过苏、美、英、法、奥、荷、匈等许多国家。他于1932年来到中国，考察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写了许多文章，集成了《秘密的中国》一书。书中所收的二十二篇作品，描写的都是旧中国上海、北平、南京的社会状况。作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炽热的感情，揭露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真相，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行径。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旧中国，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

本书的译者是我国已故著名作家周立波。原书二十三篇作品。根据译者生前的意见，这次出版删去了《屋顶花园》一篇。

本书这次重新出版，黄钢、朱子南、吴晓铃等同志曾给以热情的帮助，朱子南同志还作了校订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在此表示感谢。

目 次

吴淞废墟	(1)
一个罪人的丧礼	(7)
金融投机	(12)
一个印度人指挥交通	(22)
士兵墓地的吉原	(28)
死刑	(33)
“黄包车! 黄包车!”	(42)
巴格达的犹太资本家的故事	(48)
无意中拜访了几个宦官	(56)
即决审判	(62)
纱厂童工	(70)
比利牛斯山的插曲	(80)
被革命冲洗出来的污泥	(87)
影子戏	(97)
军火贸易	(104)
疯人院	(125)
盎格鲁·撒克逊缩影	(132)
感化寺	(149)
堆栈	(156)
南京	(164)
街道	(176)
中国戏	(187)

译后附记	(198)
再一个附记	(200)

吴淞废墟

在这里，黄海变成了扬子江，但是这变化很难看出来。江流是一片汪洋，象流到喀克斯哈文^①附近的易北河^②一样；现在，波浪还是扰乱着旅客们的消化作用；现在，江边不是江边，还是辽远的海岸。

轮船刚刚转入侧面河流，旅客们都跑到了甲板上，在船的右舷指点着，看着，拿出摄影机和望远镜。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会合处，形成了通到大商业市场，扬子江流域的门户。

自从正月末以来，吴淞，吴淞炮台湾这名字，象一枚有强烈爆炸性的炸弹的不祥的营营之声一样，在天空和海底电线中匆匆地一再出现；在国联，在俱乐部的安乐椅上和社会里，都同样不安地说着它。

现在，我们靠在栏杆上，把眼睛或望远镜集中于吴淞。那就是无可置辩的吴淞的本身。顶甲板上的日本太太和绅士们，在高兴地指点那些掩蔽着人的尸体的被毁的房屋，欣赏破坏工作中那奇异的佳作。几天以前，这沿海的许多炮台，并不是这么无遮无蔽的显露着的；它们还有水门汀和混凝土的壁障。

客船在吴淞口没有停留很久；还没有围攻者和据守者滞留在那里的一半长久。轮船一小时走不到八哩，因为河面塞

① 德国汉堡的设防海港。

② 德国的大河，流入北海。

满了船只；江心应该有一个站岗的巡捕来指挥交通。在这里，来往的船只有着鲜明的对照。世界最大的无畏舰碰到了世界最小的渔船。美国舰休斯敦号，排水一万吨，它的每一尊炮都比拥挤在它四周的每一艘舢板要大得多。舢板的风帆是张在枝条编制物上的烟草色的布片。几千年来，民船墨守着怀孕的龙一样的样式。画在船边的眼睛，恐怖的望着意舰都兰托号。民船的刀子一样的桨叶，象要截开它们的肚皮一样。不列颠军舰康沃尔号正要施放一个巨大的弩炮；投射物是一架飞机。蛋黄色的渡船，来往于两岸。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五层楼房的柠檬色的船只，向扬子江飞驰而去。它们的搭客被那几乎触着了船尾的日本装甲巡洋舰，弄得无家可归了。

河岸上没有被毁坏的建筑物，尽是一些悬着迎风飘展的外国国旗的屋宇。壳牌油，美孚油，德士古的银色油池，没有被炸毁；罗迪斯克电报机公司的红砖建筑物的屋顶上，丹麦人很有谋算地竖立着十字架，没有被炸毁；发电厂，因为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的建筑物，它的角楼上，有一个蓝色的圆锥横在红白相间的条纹中的标记，没有被炸毁。此外，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被毁坏的，没有一样东西。

船只沿着岸边荒地慢慢地驰过。它们都远远的落在那些沿着江边向码头疾驰而去的华丽的汽车后面。那些华丽的汽车里斜靠着国联调查团的团员们。他们在这座刚被创造的新的庞培^①调查了一个早晨，要在一个恰当的时间，赶回用午餐。

① 意大利古代都市，在那不勒斯东南十三哩，公元七十九年维苏维火山爆发时被覆没，近年已发掘出来。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最后通牒里要求上海市长制止抵制日货运动，解散救国会，逮捕抵制日货运动的领袖，担保对被杀害的一个日本僧人的赔款。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个最后通牒，全被接受了。可是那天晚上十点半钟，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占领从公共租界起，通过中国地界，而为外国巡捕管辖的许多马路。

日本人希望就在这一天，不仅占领闸北，这人烟稠密的中国工厂区，而且要占领直到吴淞口的黄浦江全岸。第二天早晨，东京电讯社报告占领了吴淞。可是，错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表面上它们是打算去捣毁抵制日货委员会总会所在的中国神庙的。）没有多远，中国十九路军就很快地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战争在一条二十五公里的阵线上展开，而且延长了七个星期。好几万死者和伤者，好几万栋房屋，是这次战争的代价。没有俘虏，一律格杀。到三月四日，吴淞才被占领。

从租界上的房屋里，你可以象在包厢里看戏一样的观光战争。晚餐以后，取下你的餐巾，走至窗边，烟火的展现，在一种有趣的变化中进行；它们突然从装甲巡洋舰上冒出，从飞机上扑下，从巨炮中射出。火焰和钢铁从天上喷下，一刹那间，火焰、钢铁和炸毁物的碎片又喷射到天上去。一刹那——人们的生命和人民的房屋被毁的一刹那的游戏。

因为从半夜到早晨五点钟，是实行宵禁的时间，你得在十一点半钟赶到赌场和跳舞场去，在那里你一直留到早晨五点钟就是。

在白天，你一点也看不出邻近在不断地发生着可怖的景象。当炮弹在天空交织的时候，当整个一条条街道在燃烧，小

孩们埋葬在倒塌的房子下面的时候，当许多人家在逃窜，而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男子和女人不断的倒毙在地上的时候，船舶、电车、黄包车，都照常行驶，影戏院照常开映，商店也都营业，海关职员都坐在办公室里，报纸也都出版。

国联调查团的团员们迟延了很久的时间才视察战地，这样，日本人可以稍稍把战场收拾一下，象 Nestroy 的 Holof rnes的话：Shaff . ts do Leichen weg. i kann do Schl-amperei net leiden（把那些尸体移开吧，这样狼籍满地我受不了。）这的确是不大雅观——一堆堆被杀死的，被砍掉手脚，嘴里塞满了东西的中国男女尸体。这种光景很容易败坏从国联来的绅士们的胃口，这些绅士要赴许多宴请，茶会，午餐和晚宴的。刚刚视察了闸北和吴淞，他们就在华懋饭店饮饗；虽然上海实际上是在中国，不在日本，但宴会还是布置战争的人们布置的。有十六种酒类和香槟，有奥布曼雪茄（来自哈瓦那，装在雕成的玻璃管子里，市价每支一元六角），还有一张丰富的菜单：

日本公使设宴为国联调查团团员洗尘。

菜 单

Oeufs de Beluga gris Perles（串珠鸡蛋）

Consomm'e double en Tasse（杯装双料浓汤）

Paillettes d'or（片状金）

Turbotin Amdassade（烤嫩比目鱼）

Coeur de filet Armenonville（爆炒里脊丝）

Pommes frite, e Promenade（烩土豆片）

Petits Pois fins（香辛小豌豆）

Asperges froides Sauce Vincent (沙司冷拌芦笋)

Dindonneau u Parfum des Gourmeta (香味小火鸡)

Salade Gauloise (高卢生菜)

Mousse Glace, Cathay (卡泰冰肉酱)

Corbeilles de Mignardises (各色水果)

Cafe' filtre (现滤咖啡)

在江湾跑马厅的马匹，骑手，赌金计算器管理员，和马票售票人赋闲的六个星期中，赛马场看到了许多巨大的，激动人心的竞技，但是这种竞技和这次战争一样，没有起点，没有结束，也没有赢得的钱物。跑马场没有遭受过重的损伤。是否摧毁它，在日本军阀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譬如，劳动大学在他们看来就很重要了，中国一切学校、图书馆和印刷所都是一样。这一切通通毁尽了。江湾的劳动大学正象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及它那规模庞大的旧印刷所一样的被炸毁了。日本的枪手，纯粹出于无聊，把大学的创设者的塑像当做了枪靶，它的石做的头打掉了，滚在沙里。在国联调查团团员到来以前，像身已经从像基上拉下，而且被捣成了碎块，这样，他们不会看见这种多余的破坏文物的蛮行的纪念物。只有当你在战地徒步巡礼时，也许可以碰巧看到这位大理石雕成的学者的残骸，散在垃圾堆里的撕碎了的大学注册簿和学生笔记簿的当中。

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也被炸毁了。校舍独立在广漠的郊野上，决不是一个偶发的炸弹所能触及到的。日军瞄准了

这里，并没有顾忌黑——红——金色的旗子，因为这大学里的学生是中国人。一个炸弹落在工学院；理学院、大礼堂、医学院和教授住宅都遭了海军枪炮的乱击。为了好玩，却也带着德国人的周密，一切炸弹空壳，现在都被竖立在足球场的中心，象九柱戏的柱子^①一样。

愈近炮台，大自然和人间庐舍愈被炸毁无遗。木屋的残存物不是木板，而是一些碎片。石屋的残存物不是石头，而是一些石屑。沿着日本人企图在那里搭桥的吴淞江的田野，布满了炸弹坑穴。没有一块方场没有被毁坏。就是在住宅之前，在稻田边上菜园里的砖砌的坟墓，也被炮火炸开了。

吴淞是海军炮队的目标。从江上，在很短的距离之内，日本的水雷驱逐舰和浅水巡洋舰轰击炮台的炮塔和戍军。中国并不想损害它的商港里的船舶，并不想危害任何欧洲船只而使自己遭受欧洲的公然敌视，所以吴淞炮台并不轰击那吴淞港里的船只，正象虹口的日本人进攻根据地，因为是在公共租界的边界上，中国人没有从闸北去攻击一样。吴淞只好听凭毁灭，没有任何真正的自卫。

有着红色太阳和红色太阳光线的日本国旗和日本海军旗，在吴淞的尸体之上飘动着。中国人在退走以前，他们将炸药放在军火的贮藏室，塞进大炮的装置中，把机钮一按，一个地震埋掉了炮台。现在，许多弯曲的、残缺不全的大炮钢管遗留在那里。

日本旗子上的太阳象是一个圆的创伤，从那上面，鲜血向四围流淌。

^① 九柱戏，是立九柱于地，用木棍或球去撞倒它们的一种游戏。

一个罪人的丧礼

张继贵死了。张继贵是拆白党，保护团的领袖，但是这个团体却并不能保证他战胜他的胃癌。知道死快要来临了，他在几个星期以前，曾拿了二万五千两银子献给普陀的神圣佛寺的住持，作为一笔捐款，一笔赎罪的费用。神圣的住持对他很冷淡：“钱不清爽”。张继贵患着胃癌，只得带着恐惧的心情离开佛寺，钱还是装在他口袋里。

只有神圣的普陀的住持，可以给张继贵这样的侮辱。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普陀的住持，张继贵也不会送钱给任何人：他不是给与者，而是受取者——上海的虹口区谁不知道，谁不害怕张继贵，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最高领袖被送到他的坟墓去的时候，是揭开秘密的帷幕的难得的时节。黑暗中的人物终于显露在阳光下了。在这种时候，许多认为中国的秘密犯罪组织是无稽之谈的外国人会增长一点见识。

是怎样的一个丧礼！这城市的整个区的人，拥挤在许多马路上。前面三个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印度塞克教徒，骑在马上，擎着长矛——是的，甚至于还有一个欧洲副捕头和他們一道骑着马走。三个印度人的参加丧礼，管家们给他们每人十元银币，那位白种人，给十五元。

要一个虹口的欧洲平民来做送葬者，跟在灵柩后面走，是办不到的。有一个我很熟识的美国人M君，是他们很想

出一百元钱请去担任这个角色的。M君常常可以为了三杯白兰地，或是一英两鸦片烟去干任何不名誉的勾当，他有着在法官面前，巡捕手里和牢监里面的丰富的经验，没有一个体面的人物愿意和他发生关系。可是他轻蔑的拒绝了仅仅跟在灵柩后面走一走，去装饰这位中国绅士的葬仪的邀请。

就是没有M君，丧礼也够风光了。印度执戟仪仗兵和欧洲副捕头之后，是穿中国衣服，戴尖顶帽的中国骑者。接着，象平常一样，却又远远超过了平常的，是比真人还大的纸人，有三四码高，还有神，龙，犬，里面坐着美丽的女人的轿子，仆人，马匹——唔，简单的说，用纸扎成了将要陪伴死者到阴间去的一切人和物。十四个音乐队员，奏着乐，跟在后面走。

灵柩由三十二名伏役抬着，这是头等葬礼的规定人数。

（二等十六名伏役，三等八名伏役，四等四名伏役；根本没有等级的，由一个人把尸体抛在田野，在那里让狗和猫吃掉，或者被抛在一个欧洲人的门前，他不得不把他埋掉。）

紧跟在灵柩后面走着的，常常是亡者的长子。在张继贵的丧礼中，长子还不会走路，他被人抱着。

亲族们穿着白衣，披着劣等的麻布，作为哀悼的标志。绵延不断的车辆的行列，护送死者从鸭绿江路丧家走到新闸路的扬州会馆。僧人们在那里祈祷着（他们并不象普陀的富裕的住持，计较着钱的清爽不清爽问题）。他们敲着鼓，吹着笛子，唱着经文。香烟向天空飘起。

遗体停在上海的扬州同乡会馆里，要一直停到风水先生对于星宿经过长久的沉思默察之后才决定的最利于营葬的那

个吉日。在这一天，真正是最吉利的一天，在扬州降生的已故的张继贵，要被运送回扬州去。

上海的任何阔人走到他的墓地去都会感到他象一位王子那样的风光。但是地下的王子和上海其他阔人不同的地方是——你们记得吗？——在十四个音乐队员和三十二名抬灵柩的伙役之间所画的那两行星星上面。这两行星星代表两千党徒，两千拆白党的党员，一个“互相结拜”的徒党的两千永远忠实的分子。关于这种永远忠实的连带关系，他们今天——只有今天——在公众之前借着实实在在排成的一个圆圈，一个拉得很长的，向前移动的白色的圆圈，提供了一个图解。他们，所有他们两千人一道，扶持着一条连成一个圆圈的白色的带子。

用着可尊敬的公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可尊敬的公民——的有闲的步伐走着，可尊敬的虹口的盗贼们，盗贼首领张继贵的徒弟们，单行的在平民的面前走过，用他们的悲伤和他们的白色的带子，连结在一起。

父亲把他们指给自己的孩子们看：看那里！那些人，那些在带子里边走着的人们，就是他们！他们吸我们的血，他们向我们勒索财物，他们是保卫强者的团体，强者是属于他们或是保护他们的。他们走了，牢牢的记住他们，提防他们从背后向你捅刀子。

张继贵死了，这并没有变更什么。一位新的领袖补上来了。这一次补上来的不是长子，他还只有六个月大。这也就是他不能跟着灵柩走，却要人抱着缘故。新的领袖已经选定了，是死者的一个亲戚，名叫曹梦龙。目前他要看管张继贵的财产，他的公馆和他的一群侍妾，而对于我们，在曹梦

龙的统治下和在张继贵的统治下，全一样。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在五月初五端午节^①，党徒来了，把票据给你看，替你规定好的税额，你是没有话说的。来人告诉你要付出的数额，而且不给收条，你得付出被索取的数目，他就把你交付给他的数目收受了，要不然，会对你没有好处的，想一想背后的刀子。

象理所当然的一样，按照规矩缴纳你的赎金；而每当临时发生一件事体的时候，又会向你收取并非事先规定好了的款项。如果你在赌场里赢了钱，如果你所押的小马在独得赌注的赛马中得了胜，如果你买的一张彩票中彩了，如果你有一个亲戚馈赠了你什么东西——片刻也不要想把事情秘密起来。你逃脱不了向保护团应纳的赢得财物的捐税。没有一个人是在它的侦探的范围以外的。迟早，一个嫉妒你的亲近的人，或是为了报复你，或是为了你害过她的情敌，会告发你。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这个秘密团体。

这两千人并不是单单靠着这种直接的贡物来过他们的舒适生活的。张继贵和他的忠实的徒弟们，并不是单单靠了这些去购置他们的公馆、轿头和汽车的。比那征收贡物利益更大的（但这还不是最有利益的，那还没有出现）是毒害人民的事业。秘密彩票，擅自设立的赌窟，秘密贩卖儿童，都收入巨额的金钱。但是比这些收入还要好的是鸦片信托组合，是罂粟种植者，鸦片买客，批发商人和零售商人的种种组合。

从四川那些遥远的省份的罂粟花田，一直到这近边有恒

^① 英译本把八月十五日排做十八月十五，又把五月初五当做清明节，似误。

路的鸦片烟枪，是为保护团铺满一路捐税的。保护团的确能够予以保护。因为巡捕——虹口属于公共租界——是它的工具。

法律也一样。自己是拆白党党徒的法官们不是和其他的党徒一道在白色的带子里边走着吗？有一个我很熟，他叫关华新；今天我没有看见他。前清时，关华新已经是一个四品官；到民国时，他更有势力了，他是保护团内部的一份子，同时是一切重大案件的审判官。现在，他已经挣到了几百万财产，作为正义的忠仆，他辞官归隐了。

这种敲诈勒索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渊源。而在这种剥削和毒害人民的现代的事业上还干着更厉害的事体：人民被镇压着，每一个反叛的图谋，是的，每一个趋向组织的行动，都被淹在血水里，而每一个有过激思想嫌疑的人，都要被处死。

在政治上，保卫团也尽着它们的作用。譬如：每当统治者下令剿灭革命党人的时候，保护团迅速地担当了刽子手的职务。不错，在法租界的杜月笙的统率之下，贿赂着法国人，吸干了中国人的血的一个和它匹敌的秘密团体“青红帮”，在南市和“公共体育场”屠杀的工人和学生，比拆白党在虹口的马路和附近闸北的马路上所能屠杀的，要多得多，但是闸北和虹口也是死了几千赤色党人的。

凭借着这种行为，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同样也得到外国绅士们的信任；凭借着这种行为，罪恶的匪党们证明他们是社会的柱石。国家再也不会他们在他们团体的秘密事业上，骚扰这些有用的公民。当他们殡葬他们的一个党徒时，他们可以用骑者，用音乐队，夸耀的出现在公众面前。

金融投机

一 金

要求金子的呼号从九江路，这条中国的华尔街传播出来，远远的传到四邻之外。

快要溺死的人也不会这么急切地叫喊，快要饿死的人也不会这么绝望的悲泣，被痛打的人，酷刑的牺牲者，也不会这么凄厉地狂号的。

比较起来，其他大城市的经纪人是静肃的专心的；一切其他的交易所，比起上海的，都是可爱的平和的避难所。要是我们曾经作过别样的断言，要是，譬如，我们把喧嚣的首位授与了芝加哥的小麦交易所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我们深深遗憾的表白，在上海标金交易所的集会上撤销这一断言的。而且相信，要是我们把喧嚣的世界奖给了上海金业交易所的话，我们是永远不会撤销它的。

以前在这里，金子并不是为了它的物的价值被交易，而是当作了一种生产手段的；中国金匠的行会（Herd）每天在这里集会，以便依据供给和需要，来规定他们的原料的价格。

有赖外国人，中国的金匠得到了下面这种暗示，就是不能靠工作去使金子获利很多——但无疑的可以靠着投机和通货调济。目前在交易所引起狂热的金子，并不适宜于加工制

造，这是因为它大抵是根本并不存在的。就是存在，它的成色（0.978）也和中国金匠用来制造金器的成色（0.992）并不相同，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价格。不，交易的金子，并不是用于加工制造的金子。

不过，这个交易所，依然保存着金业还没有以它自己的原料开始投机的时代的某些独特的遗物。它的普通的顾客没有在欧洲的证券交易所或在中国的街道上所常常碰到的那种肥胖的满足的脸孔。喧哗的，是纤弱的苍白的年轻人。在另外的地方和其他的环境之下，人们会把他们当做异教徒火葬堆前的一些中国式的有宗教狂的和尚。

我们是在这世上无双的金业交易所。房屋和这样一个高贵的地方似乎不大相称：木板代替了镶木细工的地板，木棚代替了电话箱，赤脚苦力代替了穿制服的仆人，扫帚和水桶随便地摆着。

经纪人和银行家所雇用的事务员们，手里拿着电话筒，靠在竹梯上，或者坐在栏杆上。

弯曲的，交叉的，大大张开的手指骚动着，许多声音闹成一片。金子价格以每次一角的幅度不断的起落，那是如此的迅速，使得那发光的牌上的十进位算法的数字，永远停留不住；七二八·二——不，现在是七二八·三了——不，七二八·四——不，七二八·三；角位数象一个罗盘的针一样不停地来回摆动。

金子是赢得物，银子是赌金。在一切其他的交易所，金子是稳定的。只有在通货是银本位的中国，银子老是保持着稳定（在局部的意义上讲），而金子的价格却有变化。对于这个交易所以外的世界，当然，这里产生的金子的价格，就

是银子的价格。

以辉耀的数字在玻璃板上颤动、闪耀和上下跳动着的，是标金换银两的瞬间的兑换率。上海金子一铤值美金二三八元。“银子一铤值多少呢？”什么时候？是你问的时候呢，还是我回答的现在？价格每一秒钟都有变化；在这里，在九江路，它是在指谈中传种，在发光的数字中降世。

在中国，金的产量不多；它要从国外运来。当比价有盈余的时候，一种法定的外国通货的金币输运了进来，来化做标金的赌注筹码；但要是货币价值的时运转到相反的方向的话，于是——你注意过吗？——金块由中国国立银行装运着，开始重新转到了外国，而且重新铸成了货币。（去年有价值一千九百万元的黄金，由中国运到了美国。）

银子可以说是中国的通货；可是一切都凭靠着金子，一切人都追求着金子，不仅是边景^①上的苦力们，就是远远离开这摇摇欲动的地板的大小市民们，也是一样。

大小市民们和他们家族所有的身上的装饰，仅仅在两次投机的间隔期间，用来装饰他们的身体。在其他事物上的技术传统是这样丰富的这个国家，宝石匠的技术，是幼稚的；宝石都不蒙使用。愈是精良的，愈是纯净的，便愈是金属，要是，在九江路，金价上涨的话，于是在远远的九江的阔人就卖掉他的戒指，他的第一个姨太太的手镯和他的老婆的发饰，而且为他从出卖中得到的超出原价的每一块银子偷偷的庆祝着。要是，在世界市场，银子涨价了，于是，他重新替他自

① 边景即法文Goulisse之译意。Coulisse读音如Coolies，苦力。基希常常借着字音的联想来帮助行文的深利，译成中文，就无法表现出来。

己，替他的新的第一个姨太太，替他的第二个姨太太，而且，在某些时候，甚至于替他的老婆，购买许多首饰；但这一次是新造的首饰，因为旧的已经在黄金缺乏的时候被熔化了。

是谁把这样一种激烈和好战的气质赋与中国人的！天哪，这是怎样的一种战斗！在十足的混乱当中，攻击和肉搏在这里那里杂乱的起伏，因此，要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或是形势怎样了，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许多的观察和查访以后，人们才能够弄清这个错杂的战列。

这里——战斗的弧阵，“纯正的投机”。进攻部队的每一名士兵都伸出了他的右手，手是一支高举的连发手枪，连发手枪的双筒——中指和食指——瞄准了对手的胸脯。交易，不然要你的命！

单独的声言的叫唤：我要！

单独的威吓的叫唤：你让！

打到电话箱去的指间电报：他让！

群众的声言的叫唤：我们要！

群众的威吓的叫唤：你们让！

群众的指间电报：他们让！

一种简单的，沉着的，常态的投机买卖。我们买进来，为的是要在玻璃板上的十进数字升上去一点的瞬间，再卖出去。你们卖出去，为的是要在玻璃板上的十进数字转下了一点的瞬间，再买进来。

第二个弧阵很紧张。金子在右边亏损，银子在左边；在两者之间的战斗部队，都竭力想把对方抛出壕堑，银子的壕堑。

离这里不远，在证券交易所，也许正在这个瞬间，一两纹银没有相当分量的标金有利。快！快！为了再卖掉它，取了它罢。

第三个弧阵比第二个弧阵还要紧张。在金子 和 金子 之间，战斗者争夺着每一呎地盘。金子就是金子，但当你是一个经纪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用右手，用声音的糜费倾向着右边把金条买进（以英镑计），就象你的生命靠着它们才取得，同时，用左手，用声音的糜费，倾向着左边把它们卖出（以英镑计），就象你的生命靠着出脱它们才维持着。

当你要变更你的买卖的时候，不管英镑的价值，那交换率，是涨或是落，你的生命的确靠着它。你的生命，这里所有的人的生命，所有这些兴奋，绝叫，呼号，挣扎，呐喊，前进，后退，发信号的人们，和那凭着电话和通信器同他们联系着的他们的伙友们的生命，都凭靠着玻璃指示器上的那些十分之一。

所有的人的精力都集中去变更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却没有一个小数点的生产价值被创造出来。

二 银

使交易所不绝的狂热的金条，写在贷借对照表里的银两——它们差不多都是抽象的价值。付款既不用金条，也不用银两。

没有什么人的口袋里叮当的响着银两，没有一两银子在柜台上是敲得响的。千千万万的绅士每天计算着千千万万的银两，但他们手里从来没有拿过一两银子。另外一方面，千百万工人手里每天拿着千百两银子，但他们从不用银两去计数。

通货单位是铜元的工人，铸造着银两；通货单位是银两的绅士，把铜元抛掉。因为，铜元毕竟太重了，压穿口袋，而且抵不上一个小钱。银两更重，一锭三十一克，它们真会压穿你的口袋——但是除非你是银行里的地窖，你是根本不会携带他们的。而且就是你不得不携带它们，你也断然不会把它抛掉，因为它们每两毕竟要值中国银币一元四角。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具体的银两的种种情形：它是用什么东西铸造的，它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有多少重，值多少银币。而现在使我们惊讶的是：单一的银两根本不存在。

工人辛苦铸造，以便藏在地窖里的东西是银块。不错，工厂的工人和银行里的职员以两作为银子的计算单位，但这银块是一两的五十二倍：它是一个三十一克的五十二倍重，值五十二个一元四角的银的东西。

作为银的成分融化在里面的这种混合的整块，是在工厂里铸造的。在造币厂吗？不，因为银两不是铸币，因此铸造它的工厂不是造币厂。在国立铸造厂？又错了。国家对于这样极端重要的工作实在不能委托给国营企业和国家的官吏！在这个国家里面，对于这样极端重要的工作，是通通委托私人企业的。制造货币是一件不可草率的事体。

现在，银圆在中国变得很流行了，银两的铸造是成比例的在低落了。这国家里有二十亿银币，却还不到两万两银两。“炉房”都要关门了，要是你要看看那还在高速度开工的一个工厂的话，那你要赶快去。

那原料，那重三十二公斤的银块，是从英美运到中国来的。首先是到铸造所。一个粘土炉继着一个粘土炉，每一个炉都掩着泥土，这样，只有一个洞，让原料从敞开的炉口倾

人，木炭在下面徐徐的燃烧着。

一个原始的风箱，由一个苦力用一种原始的方法拉着，通过一个竹管送风进去。当银块借着木炭，火伏和拉风箱的人，烧到白热的时候，便被人放在一个铁砧上，用斧头砍十八下，分裂成十八块。每一块，大概有一个银锭那么大（自然，是一两的五十二倍）。再放在炉上熔一刻钟，铜（百分之十六）被掺了进去，于是这种合金被倒进了一个模型里。

用一个铁槌在这种银块上击了两下，在上面留了两个印子作标记：铸造厂的名字和火炉的号数。要是顾客发现了有什么弊病，那铸造者就要暗中付点活动的钱。要是铸造者发现了什么缺点，那铸造这块银锭的粘土炉的工人就要被解职。这就是这两个印子的意义……

工人把那保护他们的脸孔和颈子不致于灼伤的毛巾，在一个巨大的水桶里浸湿。但水桶并不是为了这缘故摆在铸造所的中央的。把它摆在那里，是准备投进去那完成了的铸造物，使它冷掉。

银块每次投进水里的时候，好象飞溅的波浪打一条着火的船一样，在这水火的交战中，水汽喷了起来，于是波浪平静了，火熄灭了，水汽消逝了。

这船现着红色，好象浴在月光下面一样，再度从水里出现出来。深红色慢慢的褪去了，这小船的沉重的船体是纯净的银子，甲板的表面微微呈波纹状，象丝一样。“细丝”是广东话，意思是精细的丝绢（细丝）^①，这也是中国话对于银两的称号。

^① 纹银又称细丝，基希以为是银块的表面象丝，所以有这样的称呼，但另外有的人说，这种银子因为纯净，热时可以抽成细丝，故云。

于是，这种银丝的船并排的摆在乾船坞里。办事处审查了它们，提领了去。“阿哈，国家当局，财政长官管理着私人生产者！”一点也不这样，你欧洲人，提领它们的办事处是私家的，是一种商业的机关。鉴别银子的纯度不用化学的帮助；有经验的中国人的眼睛，是可以凭着银色去确定误差在千分之一以内的含银量。这一瞥的结果和重量都用墨写在龙骨上。

现在它可以开始它的伟大的旅行了：从一家银行的地窖旅行到另外一家银行的地窖。

三 铜

我爱多量的金钱……（德国学生歌）

……但是我只有黄铜（中国事实）

在每一条马路的每一个转角，银钱兑换商开设着他们的围着铁栏的店铺。他们——象所有的中国商人一样——被他们的许多儿孙，外孙和女婿围绕着。

在招牌上，这种银钱囚舍的所有主，宣布他们可以兑换美金、日元和英镑；他们写出每天的兑价。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他们表面上在牌子的日本货币上，画了一条线。

虽然有这种兑换的牌价，但上海的银钱兑换商所经营的外国票据生意，正和被年轻的耶稣基督赶出庙堂的他们的同业们所经营的一样的少。耶路撒冷的银钱兑换商为了买卖或施舍的需要，把大洋换成小洋，上海的银钱兑换商把银洋换成角洋和铜板。

目前中国一块银元约合德国一马克。但它不止值一百个和芬尼同样的铜元：它值得多些、值二千九百文小钱——换一句话说，每一块银洋要换到和银元一样大而且和银元一样重的铜元二百九十个。

在满洲，甚至于有五文铜元——信不信由你，一块银洋你可以换到五百八十个铜元；而在北平，使用双铜元，但它们抵不上普通铜元的两个，只抵一个半。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之下，在你偶然需要一点零钱，或是在你不需要零钱，不要让你的口袋里装满了零钱的时候，你要去兑换，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一方面谁愿意整天驮着铜板呢？另外一方面，谁又能够希望电车卖票人，报贩或是黄包车夫身上带着一块银元的所有找头呢？当你去兑换的时候，不要怕银钱兑换商会从铁栏里把你的一块银元的等价，都折成铜元付给你——要这样，那重量会很快的使你感到不胜负担，不，银钱兑换商考虑了人类的体力，会给你五个两角的或是十个一角的。只有零头，才给你铜板，也许是二三十个——这要依据着兑换率和银价的涨落，依据赚铜元的苦力每天都要受到牺牲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物事。

有大洋和小洋，可是两者都可能是小的款项。大洋是意味着银洋的分数是和它的倍数一样的多。大洋，十张一角的钞票常常等于一块银元，或者，十元的钞票等于十块银元；可是，小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一角和两角的银角的价格，不断的涨落。

二千五百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是制钱，欧洲人叫它做Kesh（角子）。一千个Kesh合一两银子，这是有孔的青铜钱，是从远古起直到世界大战时止的通用货币。一九一五

年，日本人把制钱一船一船的收买了去——枪炮工业对于就是取着最卑贱的形式的铜和锡，也是并不鄙弃的。日本从中国的督军们手里收到制钱，而督军们却又是从中国人民手里勒索来的。现在，制钱是不大看见了，虽然每一个铜元上面还是留存着当“十文”的堂堂的题记。

在中国。差不多每一省都自造货币，在每一个城市里，银价都不相同，因而各处的银钱兑换业公会，都很兴旺和繁荣。苦力得的工资是铜元。电车卖票收入是铜元，卖票人把大批的铜板放进布袋里，又把布袋放在乘客的座位下面。中国人付给黄包车夫的车资是铜元。工人和他的老婆、儿女、婴儿坐着独轮小车从工厂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付出的车钱是铜元。街头小贩、街头戏子、乞丐，他们只能得到铜元——这是最重的货币，也是最难赚到的。

于是“爱情”想起了发行代替铜元的纸币。“爱情”可以这样做，因为只有从“爱情”的手里，人才会接受代替硬币的纸币。在我的面前摆着一卷这样的爱情货币，“杜开泰”钱庄可以兑换，“王凤泰”钱庄也可以兑换，等等。

中国的“爱情”居处^①的姑娘，在和她的客人分别的时候，把这种当十，二十，四十铜元的纸币递给他，去表示她对于他的造访的感谢，去免掉在她的身边弄疲惫了的他，回家去时步行的劳苦，她想他的恩爱，一定会把所有的现钱给了她，而身上再没有留下一个大了。

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接受这种纸币，就好象它们是通用货币一样；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纸币……

^① 指妓院。

一个印度人指挥交通

他轮流地开关着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灯。他的头上缠着红色、黄色或绿色的头巾。要是头巾是一种不同于指挥交通的灯光的类似的颜色的话，就要损害这一作用了。印度人在公共租界的一切重要的十字路口指挥着交通。

其他的印度人，在银行、百货商店和写字间日夜的看门。这两种人，交通巡捕和司阁巡捕，都穿着英国式的紧身制服大衣。他们头巾下面绷着一把梳子，腰带上面插着一把小刀，手臂上带着一只手环，穿着一条亚麻布的短裤——这是他们的宗教的四条规矩；在这之外还得加上第五条，那就是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刀子，没有理发匠，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子，会碰一碰那蓬乱的胡须。

有许多私人家的司阁巡捕缠着一条黑色头巾，这是十字街口有着较高位置的他们的同事们所得不到的一种特权。实际上黑色头巾在私人家的司阁巡捕也是禁缠的，但是他们声言那不是黑色，而是深（很深！）蓝色。这是英国放任的。英国让他们把黑色称为蓝色。英国曾经有过一种黑头巾的经验。

不管他们的头巾的色泽是怎样，是浅或是深，印度司阁巡捕，塞克教徒们都携带着马枪。这些时候是公共租界的严重时期，亚洲的被榨取者随时可以起来反抗从欧洲来的他们的榨取者，司阁巡捕光靠自身是不够的，纵令他们是魁伟的

有胡须的印度人，他们还得有火器。

塞克教徒无疑是很魁伟的。在法租界做巡捕，戴一个灯罩似的帽子的瘦瘦的安南人，和在“中国地界”用一根甘蔗似的木棒指挥交通的中国人，都比不上他们。当一个塞克教徒站在指挥楼上的时候，黄包车夫就不敢不顾灯光的号令。当一个塞克教徒在海关前面的人行道上巡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绕开他走——没有人愿意被他疑心是在图谋袭击。

这些褐色的巨灵就这样的守护着他们的殖民地主子们的制度和金钱，无情地，残酷地尽着他们的职责。这就是上海的中国人憎恨印度巡捕的道理。

上海的中国人憎恨他们，也为了另外一个原因。有许多塞克教徒感染了上海那种没有限度的榨取的精神，感染了他们在里面充当女像支柱的那些建筑物的精神，一朝抛弃了他们的巡捕的职业，投身于商业，他们以很高的利息借钱给中国人。他们的手里满握着期票，他们整天的留在法院里。殖民地资本的守护犬，殖民地人民的吸血鬼。

从前一个时候，这些塞克教徒们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那不是在这里；那是在印度西北部，在旁遮普。自从十五世纪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回教徒们以后，他们就在一种民主的亲睦中住在阿木里普尔的金庙的四周，信仰一个唯一的上帝，废弃了等级制度和多神论，和偶像崇拜和烧死寡妇。他们对于想要破坏他们的独立的敌人的每一个进攻都给以英勇的抵抗。他们的宗教师（Curu）中的一个有一次被俘虏了，被带到了回教皇帝之前。除了是一个异教徒的领袖的罪过以外，还控告他在被押送的时候，曾经把头转向他的征服者的妇女闺房的那边。“我转过头去，”宗教师回答他的敌人皇

帝道，“向着西方，从那里白种人会渡过海来，要是我们不联合起来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变做奴隶。”

他的预言说中了。不列颠渡过海来，塞克教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通通沦为了奴隶。鲜血流遍了旁遮普。在非罗斯来沙尔有三千英国人被塞克教徒杀死了，在非罗斯普尔被杀了八千。在那些日子，塞克教徒没有被配置在小楼上，他们也不能够用目前从南京路的灯台上照射出来的电气探照灯去照透丛林的黑暗。他们没有目前用来使银行不受亚洲的危害的六发连珠的马枪。

塞克教徒被征服了，被降服了，变成了英国的兵士。不久，英国的塞克教徒的部队就射击了他们的反叛的同国人。他们射击了伊拉克、埃及和缅甸各民族，而且在世界大战中他们射击了他们主子们的欧洲敌人。

但是独立的观念还潜伏在旧塞克教徒的部落里。他们需得被放在更严格的监督之下，剥夺那独立自主的最后的残余。他们的庙宇（Gurdwaras）是一向由公众管理的——现在印度政府委任了由它所认可的牧师来充任庙宇的监守者，而这些专制而又腐败的人，立即开始拿庙产为所欲为了。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塞克教徒又反叛了。他们战斗着，为了要求庙宇归还公众，为了他们的原有的民主制度的恢复——为无论怎样都不能忍受殖民地的一切。在兰克哈拉萨希普，在加里华拉巴格，在阿木里普尔的公园里，英国的机关枪屠杀了好几百男人、女人和小孩。

侦探部，英国的网罗世界的密探网，查出了“阿卡里”（Akali），一个黑头巾团体，是塞克教徒的有着宗教狂热的冲锋队。禁止缠戴黑头巾了，犯了这种禁令的，要被处以

体刑。一九二二年哥罗卡巴格的那种情景，造成了世界文学中寻找不到的一首消极的降服和积极的残忍的叙事诗：每天有整千整万的塞克教徒故意缠着黑头巾——苍苍白发的老人、成年人、得了奖章的世界大战的老兵、年轻的孩子——都自动的离开阿木里昔尔和旁遮普的其他村落，走到哥罗卡巴格去任他们鞭挞。他们一排一排的坐在地上，当英国军队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唱着他们的歌：

Wahiguru, Wahiguru, Wahiguru Ji^①.....
Satnam , Satnam , Satnam Ji.....

上海的马路是弯曲而又狭窄的，有的电车路没有轨道，汽车在黄包车中间呼呼的飞驰，十二个苦力拖着一辆笨重的货车，一直横过公共汽车的路线——指挥交通的巡捕须得没命的留神。这些日子是严重的战争的时期，日本人正在轰炸这城市，国际联盟鄙夷中国人，灾难和愤慨是巨大的——巡捕须得没命的留神着。可有这样的瞬间么，当交通的波浪澎湃在他的脚边，当他十足的象在一个被岩石封闭的岛屿上，十足的象英国人那样僵硬而又笔直的站在那里的时候，战鼓的急击，短棍的殴打，和那支歌：

Wahiguru, Wahiguru, Wahiguru Ji.....
Satnam, Satnam, Satnam Ji.....

① 歌词意为师尊万岁。

却浮上了他的脑海，可有这样的瞬间么？

你碰到下了差的塞克教徒们的时候——在塞克教徒们居住的，而那里的商店招牌也写着梵文的武昌路，你可以从塞克教徒们的口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譬如，在那里他们会告诉你，有一个巡官，的的确确是十足的公吏，十足的巡捕，十足的英国式的，就为了这缘故，他被其他的塞克教徒看成是他们民族的叛徒，被他们憎恨。在一九二九年的某一天，他在跑马厅被枪杀了。英国人逮捕了嫌疑犯。他们竭力想借着各种酷刑得到关于他的朋友或首凶的一些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把他绞杀了。一个菲律宾的革命家被疑心为这次暴行的主谋人，但他们非常清楚向法院提不出证据，因此有一天晚上，几个英国包探袭进了他的住屋，捉住他，在开斯威路砍了他的头。第二天，官许的谋杀者借口“有在开斯威路谋杀嫌疑”，逮捕了八个革命的塞克教徒。这个计谋被报章舆论揭发了，那八个麻烦的塞克教徒的死刑只好作罢。

有时，有力的不列颠会无力对付它所压迫的民族。头巾，不管它是黑色或是深蓝色，或是任何其他颜色——下面的思想，有力的不列颠都压制不了。

不列颠只能够定下殖民政策。在马来联邦，——它强迫减低了整千整万中国苦力的工资，因此，整千整万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被逐出了锡矿，麻栗木锯木厂和种稻农场，陷入了失业和饥饿。在不列颠的直辖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存在着中国不大存在的物事：巨大的中国雇主。他们是船主，米厂主，旅店主，妓寮主人，他们用欧洲人榨取中国人的同样方法，去榨取他们所在地方的本地人。

这就是印度人和马来人把中国人当做“黄色魔鬼”来憎恨，而在中国的中国人又憎恨那些在上海监督他们，鞭打他们，勒索他们金钱的印度人的缘故。

这就是殖民政策。全凭靠着暗探和绞刑吏，竭力防止任何情况下的国际接触来维持它。“泛太平洋职工联合会的书记局”是非法的，它的职员们被处了死刑，或是被判了终身惩罚折磨而死。

但它还是继续的存在着，尽管是非法的。

士兵墓地的吉原^①

参加了追悼阵亡者的仪式以后，我们留在虹口，在那里用了晚饭，上了几个咖啡馆。在这惹人烦恼的战场上，处处都是冒烟的废墟。浅蓝色诱人的灯光从一家酒店里透露出来；酒店外面，还可以嗅到正在腐烂的尸体的气味，在里面，一个日本姑娘的散发着美妙的香气的头，倚偎在她的舞伴的胸怀里。下午，我们祭奠死者，晚上，我们和生者作乐。第二天，要是我们去回想这些印象的话，它们已融成了一片。

下午所祭奠的死者之中，有那作为敢死队的英雄的“肉炸弹”，这是带着手榴弹逡巡，在一次袭击中国阵地时被炸死了的一群兵士。在给东京的电报里，司令官说明这次意外是由于丢炸弹的时间上的错误，已经对责任问题进行严密的追查。可是，当战地通信员报告他们是自愿牺牲生命的模范的时候，这个报告立即就变成了当局的意见。

追悼仪式，长官参加了，他们中间的几个，后来我们在娱乐场里看到了，只是没有下午那些高级长官；白川总司令，野村海军总司令，大野将军，植松将军都只参加了祭灵仪式，在那里他们露出庄严的脸色坐着，象是深深的给感动了。

① 吉原是东京最著名的游郭（花街柳巷）。

骨灰装在铁匣子里。题着白字的深蓝色的旗帜环绕在灵位的四围。前面有一个饰着菊花的祭坛。花环没有束锻带，替代它的是有一块题着字的牌子。

奇妙的是，追悼会场是一家日本人的茶楼的花园。这是一个在三年以前，在一次偶然的失火，邻接着新的故意的纵火中，连楼台亭榭和花坛通通烧毁了的茶楼。在那次和平时节的火灾中，墙壁和大门都没有损坏，那围着门墙的一块房屋的基址，用做追悼场所，倒是非常的适合。

在成为战场以前，虹口区密密的散布着日本人的酒馆、茶楼、跳舞场和其他的夜间娱乐处。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些场所都关了门，但是现在它们又很快的滋长起来，而且更多更稠密；在废墟的中间，一种新的夜生活繁盛起来。

祭司穿了一件饰着花朵的橙黄色的长袍，他那剃得光光的头上戴着的僧帽，在骨骼很宽的脸上闪着金光。三个人协助的人，都象祭司一样，穿着宽大的绸衣。他们帮助把微红色的面糰和一碗一碗的斋饭陈设在祭坛上。

这是祭献死者的食物。在同一天，在同一区里——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北面的地界——我们看见生者在吃着完全两样的食物。薄切烧——读做——Siyaki（西亚基）——是黄色人种的一种菜肴，纽约人以为是日本国菜，正象美国的酒家称“杂碎”（Chop—Suey）是中国国菜一样。日本人常常带着特别的严肃吃薄切烧。浸在酱油里的肉片、洋葱、蔬菜，在客人面前的浅锅里噉噉作响，当还在烧煎着，溅着水的时候，客人就勇敢的开始下箸了。男子都蹲坐在席子上，下女站在他们的旁边，继续不断的把米酒斟满小杯，把生的

肉片放进锅里去。

日本绅士，晚上出门的时候，总是不带妻子的。可是，这追悼死者的祭典，却容许了女人参加。她们站在门口，对每一个进来的人深深的三鞠躬。她们同声的吟颂着，忧伤的转动着念珠，那玻璃球的念珠象戒指上的珍珠一样，停留在中指上。会场里甚至也有穿着华丽的和服，束着红花腰带的艺妓；她们的头发涂了油，梳抹得溜光，银的珠箔在黑色的发髻之间闪烁着。

装饰华丽，轻言巧语的艺妓向那奉令参加仪式的军官们献茶，其他穿灰褐色和服的女人不能优雅的做这件事。艺妓和非艺妓都穿着趾端分开的白袜，一边三个脚趾，一边两个——所谓分歧的脚套——而木屐，名叫“下駄”。

用祭物、祈祷、音乐、和芬芳的香料，祭奠着阵亡的兵士。祭司和助手用整齐的步伐绕着四方的会场行走，念着下界的会众里没有一个人懂得的圣奠的辞句，一面把花花绿绿的纸头，扔到每个坟墓上。

回到祭坛前面时，大祭司继续进行奠祭的典礼，他的助祭用铜锣，皮鼓和手铃奏乐。奇异的乐器是土耳其饶钹（Tschinelle），它们不仅有叮叮相击的声音，也有乱弹和乌乌之声，也许是弹力作用的结果吧，这些都融成了一片，象是鼓声一样的隆隆震音。为什么日本跳舞场的爵士乐队奴性的死抱住黑人乐器，死抱住班卓琴、萨克斯管（Banjo Banjo Saxophone）和其他乐器呢？为什么不加上土耳其饶钹去丰富他们的乐器的种类呢？爵士乐队的演奏节日，固然很奇妙，却只能由于这种革新的变化而改善——在“*Ich bin vo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我从

头到脚浸在爱情里) ① 这歌的每句之后，接着一阵银样的鸟乌之声。

舞女唱着上面那歌，不是用德文原文，也不是日文译文，她们是在用英语唱着“**Fall in Love again……**”（重塑爱河……）。她们都能够说很好的英语，她们知道跳伦巴舞（**Rumba**）慢四步爵士舞（**Blues**这种第三阶段的舞蹈，他们早抛弃了）。她们一大半穿西装，但是——我们的一个舞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去年才开始的。日本欧化，比任何地方都要迟一点。因为日本姑娘的腿子，穿了短衫很难看。日本姑娘的腿子是她们最大的弱点，他们的祖先交叉着腿子坐在蓆子上太长久了。

祭奠完了。最高级官员正现出一副庄严的面貌，向祭物走去。不错，献祭的不是他自己，可是他还是一样献祭了。他现出这种庄严的神情是因为在想着他的可怜的阵亡兵士，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脸孔差不多触着了摄影机。摄影记者乘着一辆运货汽车及时来参加丧礼的事，我们忘记提了吗？这是佛陀外加军人的影戏。

在摄影机的面前，这些人脸上的忧愁的皱纹是很深的。忧愁一定会制成一张动人的影片，象是没有预料到在劫难逃，在战争中，人要被杀的事，似乎已蒙将军认识了。野村海军总司令象一个肥胖的，精疲力尽的军医一样的望着。他的东洋指挥刀——那刀柄占着刀的长度的三分之一——很少赋与他一种称雄中国领海的，日本军队司令官的勇武的容

① 这是好莱坞德籍女明星玛琳·黛德利在“蓝天使”中所唱的德文名歌。

貌。

植松将军好象一个留着尖尖小胡子的木瓜。

他们一个跟一个的走上去，用他们的手指在祭坛上的一个木盒里略探一探，把那敬神的香虔敬的举到齐额，然后放在供祭的菜肴上，烟云雾样的上升着——在这时间里，影片摄影师始终在摇动机柄。将军们的背后，是参谋部僚属，参谋部僚属的背后，是高级长官，高级长官的背后，是下级长官，他们都依着“严格的依照等级而又不拘形迹的次序”，向这些在中国阵亡的日本祖国的防卫者表示着最后的敬意，遵守这个到处一律的军令：“参加故退職少佐N·N·丧礼之第三中队全体官佐，望于明日下午四时在营前列队。不参加者，定予严惩。”

下级官佐在献祭的时候，虽在摄影技师看来，不值得拍摄，但他们也装起庄严的脸容，因为在丧礼仪式中，理应如此；不错，还有来宾——甚至于还有一位外国新闻记者。——这些外宾，会出乎意料的就在同天晚上，在邻近的娱乐场上，看见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和下午的庄严相差太远的神色。

军官们也熟悉最时髦的跳舞，而看着下午的那些粗鲁的武士，到晚上，都是怎样的能够“从头到脚浸在爱情里”，能够和着马琳·黛德利的艳歌舞蹈，那是一种开怀的快乐。

鸡尾酒是巧妙的搀和的；亡者前面的供祭的菜肴之上，一缕缕烟雾高高升到空中：这是祭物在天上被享用的象征；献祭的纸片在温和的三月的微风里，从一座坟墓飘飞到另一座坟墓。在小口路，在虹口的偏僻马路上，战场上的吉原正在营业：廉价的日本灯笼和廉价的日本姑娘排列在门口，在招诱活的兵士们，那些死者的同伴，到妓寮去。

死 刑

一个人在刽子手的手里死了，血从他的颈上涌溢出来，汇成一条长长的血流。生命从一个好象早就死了的人的身上飞进了。

那天早晨，他从囚车里面下来，他那空幻的黄色的脸孔变成灰白，腕上带着钢的手铐，他的长长的消瘦的身体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国衣裳。他上身歪斜着，好象教堂墓地里的幽灵一样随风飘走……

当我等待他到来的时候，我并不想去揣摩他的相貌和姿态；我知道，杀人犯总不会生着牛颈子，也不会生着突出的下巴和凹陷的前额的。但是这个人是格外的不象一个杀人犯；他到象是已经被人杀了的——不象一个还要人家帮助他从生到死去的人。

当他们押他走进地方法院旁边的囚室里，走进今天被提出来受审判，正在忍耐地心神不定地，等待他们的命运的其他三四十个人中间的时候，庄开英（译音）的肩、腿、甚至于连他被铐着的手，都痉挛着。其实，他是用不着忍耐地心神不定地等待他的命运了，他要死了，他不能够逃出死亡的境地了。押解他的两个巡捕，留在那没有他们也已经周密的被守卫着的铁门的外面。因此，他可以象同等人中的一个那样，混在那些不是他的同等的人们的一群里。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经不过是一个幽灵了。

突然间，铁门郑重的敞开了。当生命以巡捕的形象傲慢的、作威作福的，带了一串叮叮当当的钥匙走进去，代表着生死的巡捕走到庄开英的面前，于是别的人都明白了……

欧洲人不是断言死对于中国人不算什么，或者至少没有对于我们一样的关系重大么？“这些人就刑的时候，都笑着。”在外面，一个三道头这样告诉我。

唔，生命快要从他的身体上飞进了的庄开英，口半张着，嘴角翘起，这和他的颤动的话语，他的全身不断的痉挛，象要使人想到，他是愉快的。但是庄开英真的愉快么？或者，他的嘴巴和身体的姿态，是恐怖吗？——这些问话，都没有意思，不过一息息工夫，我们就要看见他从生走到死亡去。是愉快的呢，还是含着眼泪的呢？

死对于他的同难者意义怎样，我们已经看见了：当生命，以一位巡捕的形象，带了一串叮叮当当的钥匙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从每个角落里，他们的眼睛，好象来福枪口一样，对准这个已判决了的人。三道头，一个苏格兰人，他在上海法院服务很久了，他用中国话问犯人在就死以前想要吃什么。庄开英要吃热的肉馒头，冷的鱼，饭和汤，还要香烟。

在审判厅，地方法院开庭了。本来，死刑的确不是一个小案件；但是这个法庭不过问一问被判死刑的人还有没有话说，要不要法院送一封信给他的亲戚或朋友。

庄开英被带到被告席。他比他的同难们优越：他不是一个是被控告的囚人，他是一个高于被告，高于将被判决的人，他是一个已经判决的囚徒。他的身体在木的被告席上漠然的痉挛着。庄开英坐在包探们的长凳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朋

友，他首先对他说了一些话，于是又对法官说了一些话。

他在问候他的朋友吗？在骂他吗？在供认他的罪恶吗？在申辩他的无辜吗？我都不知道。他的翘起的嘴角，他的肩膊的痉挛和屈曲，没有说明什么；而公共租界的会审官，通常总是借着一个翻译的帮助，替工部局警务处的案卷保存所记录下被告和证人的每一句话，现在也没有翻译。庄开英已经不再使人感到兴味。他完结了。

庄开英对法庭没有作什么最后陈述，因此他可以被带到院子里去，那里已经替他摆好了一张没有铺桌布的桌子。一盒廉价的香烟抛给了他，他的手还没有解除镣铐的时候，他就撕开了香烟盒，点起了一支烟。自从犯罪以来——他犯的是窃盗和枪杀袭击他的司衙巡捕的罪——他也许从来没有抽过一次烟罢。

而且也许没有饱饱的吃过一顿饭罢，木筷子挟着一块块的鱼肉，送着倒了菜汤的饭。中国的迷信，说馒头可以比较容易的得到去来世的路。又是一支香烟。他把那装着剩下的香烟的烟盒拿给一个巡捕。要吧？你不要吗？——耸了耸肩，庄开英把烟抛在桌子上，有一支烟落在地上了。当他弯腰去捡的时候，他想起了：捡它起来没有意思。五分钟以前，他是怎样贪馋的想要抽它——当生命流涌到了尽头的时候，情境是变得很快的。

他被捕的时候，从他身上抄下来的财物，包了一小包，递还给他：四十四个铜板，一张当票，一枚钥匙。庄开英用中国式的计数法，一五一十的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的数着钱，他蹙着眉把当票凝视很久；他慎重的撕了当票，把钱放在桌子上。

走吧！庄开英颤动一下，站了起来，卷起他的衣袖，伸出他的两手，手指叉拢着，去让巡捕再给他带上手铐。于是这个消瘦的人爬上了巨大的囚车，第二辆车跟着，^①司机座位的旁边，安放着一架机关枪。“这是规矩”，在第二辆车里坐在我旁边的副捕头，指着机关枪，这样的说。“实际上只有在我们押解政治犯的时候，那东西才有意义。”

常常枪决政治犯吗？

“哦，我的天。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当然，只是共产党。有一个欧洲人也许快要枪决了，那名叫牛兰的，你知道吗？”

“是的，我听说过牛兰这名字——欧洲的报纸，叫他做罪犯。你看他会在什么时候枪决？”

“鬼知道。六个月以前就该处决的。因为打仗，报纸上又这样的闹，讨厌的黄种人老是拖延着。现在他们还要公开审判哩！”

副捕头激怒的喝了一口威士忌。他的激怒是可以了解的。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捉了一个人，以后公共租界就把被判决为死刑的人关在牢监里，最后，把他交给中国人去执行枪决。这些讨厌的黄种人怎敢迟迟的不执行他们的职务！

我们的车子驶过法租界，经过逸园跑狗场，开过苏州河，在一座新房子面前停住了。房子的前面，依照政府房屋的惯例，有一对石头狮子守卫着。副捕头走到里面去请一位中国官吏来监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死刑。”

就这样，一个就要死了的人乘着车子向死亡驶去，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让路给我们疾驰而过的黄包车夫不知

道，用拉长的喉音叫卖他们的货物的街头小贩不知道，用竹扁担挑着东西，一边唱，一边哼着两人合奏曲的工人不知道，蹲在贩食摊旁的人们不知道，站在兑换店的铁槛前的人们不知道，让街头理发匠在剪头，在挖耳朵的人不知道。在我们前面车子里的那个人也没有向车外看。对于他这已经判决死刑，又正向死亡驰去的人没有什么要看的了。

副捕头又喝一口威士忌。

“执行这样的死刑要花很久的时间吗？”我问他。

“你还没有看过一次吗？”他把那长颈酒瓶从他唇边移开，惊讶着我的问话，因为他已经参与过好几百次死刑的执行了：“一次也没有吗？”

我承认：一次也没有。

“唔，这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至少一般是这样。如果犯人立刻愿意受洗的话，进行就快，但是……”

你说什么？我不懂……你说“受洗”么？

“不错。每一次执行死刑的时候，都有天主教神甫到场。有许多犯人最初不愿意听一句改宗的话，但是神甫不肯干休，于是他们困恼了，顺从了，只有政治犯顽固。其他的人最后都答应受洗”。

不可能！而且为什么特别是要天主教神甫来呢？在中国，一切种类的宗教和教派互相竞争着。耶稣再来教派和基督教，教友派和苏格兰联合自由教派，卫斯力美以美教派和救世军，都在收买灵魂、地图和军事秘密。他们都建立教堂和汽油站。他们都对那些受他们施洗的人预约着天国的福祉，对那些由他们保了险的人预约着发生意外时的扶养费。在中国土地上，他们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王国和亨利福特的王

国。

甚至于佛教徒也来到了这个佛教流行了千年的国土——那是日本的佛教徒。基督教牧师为着欧美国家和商业的利益所担任的角色，日本想要由佛教徒来担任。

因此，有着这样多的教堂，每一个都规定了一条进天国的独一无二的保险的路——为什么这些判处死刑的人恰恰采取了天主教这条路呢？告诉我，副捕头，为什么恰恰是天主教神甫呢？

“我不知道。”

胡说，我心里想，是威士忌在副捕头的身体里面说话罢。罗致了在就刑以前两分钟的中国罪犯，对于教堂有什么好处呢？胡说。

车子继续的行驶，驶过商店和手工匠的店铺。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把脸转到右边，而且好象是出于偶然一样，我用手掩住了我的脸——我不愿意被认出来。因为左边有一家旧书店，书店老板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他的经常的中国主顾卖给了他一些英文、德文、俄文的什么小册子。可是，他知道就在同一天，这些书要被另外一个常来的主顾买去，而他买去看完了、又再卖给他的书店。除了违法的革命书籍以外，他也和其他旧书买卖者同样，收藏着华英字典和华德字典，教科书和文法。

要是我的书店里的朋友们看见我和一个穿制服的副捕头并排坐在一辆车子里，跟在一辆囚车的背后行驶的话，他们会怎样想呢？而且要是这位穿制服的副捕头，注意到了读书和买书的中国人同一个欧洲人是朋友的话，对于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他们立刻也会走上我们前面那辆囚车所循的

路。读书会要走上断头台，但是不读书也没有救；我们伴送的这个死人到刑场去，并不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的缘故。

我们在沼泽一样的稻田中间弯弯曲曲的行驶，驶过砖砌的坟墓。黄浦江上，民船的风帆满满的张在五月的微风里。一扇宽阔的拱门打开了。这门为着一个死人而打开，并不是第一次，这门通到监狱和刑场。我的同伴指着一块草地：那就是行刑的地方，那就是将要死的人的就刑处。

暂时，他还留在囚车里。摆出了一张桌子。小孩子们在沙地上游戏，在爬树。我们的车子到来时，他们招手叫来其他许多孩子。一个公家照相师郑重地，辛勤地解开他的三脚架，把它架好。“现在每个行刑的人死前和死后都要拍照，”他们这样告诉我。“从前中国人会找一个人来替死，兄弟或儿子，或竟是他们出钱买来替死的苦力。”

中国官吏在裁判席上坐下来；巡捕站在四边，——确确实实，刽子手站在他们的中间。在那发出可爱的香气的绿色草地中间的小石子路上，囚车开了过来，车里坐着一个等待着死的囚人。为什么他们还不开始呢？

“神甫还没有来。”

这是用威士忌做了早餐的副捕头有意和我开玩笑？因我从来没有观看过中国死刑的执行，他想愚弄我，说有神甫来！

但是不久，天哪，真的来了一个神甫。圣器监守人替那大肚皮神甫打开小汽车的门，在这同一瞬间，一位巡捕替那高高的消瘦的囚人打开了大汽车的门；在同一瞬间，神甫和囚人走了出来。为了使他在信奉耶稣教的时候感到自由的缘故，庄开英的手铐解除了。

神甫是一个中国人。他说中国话。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设法使得新信徒这么快的理解了新旧约，使他这么快就从佛教改信了耶稣教的。庄开英最初是惊惶失措，接着很厌恶，于是很愤怒——不愿听他一句话。活着的肥人不屈不挠地继续和要死的瘦人辩解，直到庄开英终于让自己受了洗，一个有着圣母玛利亚肖像的纪念章，挂到了他的颈上的时候。于是他们教他划十字，但是他摇摇头，这样，神甫就亲自在这位新信徒的身上划了一个十字。同时，圣器监守者打开了香油盒，神甫蘸了一点香油——但是要死的人又猛烈地不肯就范，他不愿意领受这个临终涂油礼。那么，好了，听了神甫的命令他跪下来，随着传教师迅速地复述着一个祷告（他已经困恼了）。于是他们叫他再站起来。但是他不站起来了。

他不站起来，叫着，好象竭力要把他的头盖捣破一样地在地上磕着头。

“他在叫，他们不应该折磨他这样久，”副捕头自动的翻译给我听。“他叫着：枪决我算了吧！”

只有一息息工夫了，我的孩子，只有一息息工夫了：拿出基督的忍耐来吧，一切都准备好了。看吧——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行刑的监督和他的属员在等着动手。

照相师，诚然是相当拙劣的，替你拍了一个小照；你被引到那青草特别繁茂的地方，孩子们逼近的挤了上来，——四岁大的，六岁大的，他们一定常常来看，因为放枪，在小孩子看来，总是有趣的——他们叫你跪下了。

你后面的人，对准你的后脑放了一枪，迅即跑开去，这样，他就不会溅到从你身上迸射出来的，一股一股的鲜血。而你，庄开英，好象突然充满了生命一样，痉挛着直立起来，

却又立即好象要压碎地面一样的扑倒下去。

你抗拒着，当他们竭力想搬动你，把你翻过身来的时候。一块石头垫在你的头底下，这样，你可以由他们拍一个最后的小照。带着可怕的眼睛，没有人色的，染满了血污的，使人不能忘记的脸孔，你映进了照相机的镜头。

就是这样。我乘着车驶回家去，沿着黄浦江岸，通过南市，掠过那扬着满帆的民船，驶过那家革命书店的主顾们，驶过那些商贩和手工匠，黄包车夫和乞丐，他们都好象死人一样。当庄开英还是象死人一样，象鬼火一样的移动，吃他的最后一顿饭，在法庭上说话，跪在刑场上复述着一个祷告，于是后脑中了一枪的这种种时候，他正和他们一样。

现在，活生生的，他在我的前面乘着车子，他跑过我面前，他坐在马路角落里：是这活生生的人，他的血重新迸射，他的身体挣扎着，他的眼睛圆睁睁的凝望着，他的脸孔染上深红色。

“黄包车!黄包车!”

由于战争，上海两个租界的马路上，半夜以后，不再允许走人了。每一个违反这一规定的路人，如果他不是欧洲人，又没有带捕房的通行证，就要被暴虐的逮捕。每晚，被捕的中国工人——男的和女的——小贩和挑夫，被巡捕编成小队，从各处集中到中央捕房去。押解这些人，是由和他们一道抓来的几百辆黄包车运送的——战争和实行宵禁都不能打搅这两条腿，两个轮盘的车子，他们还是和战争以前一样的赶生意。

白天和晚上，这里和那里，慢步和急跑，这边和那边，在酷热之下，在大雨之中，他们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从虹口到南市来回的奔跑：奔跑至坐客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他们永远要蹲着等顾客——在晚上，也是这样，在战时，也是这样，顾不得戒严令，顾不得和这类似的规则，要不然，就连他们所过的那种最低的生活，也不能得到了。

你从随便什么房子里走出来——在同一瞬间，他们从各方面向你簇拥而来，你立即陷入了一种车辆的栅寨，和一片诱惑与哀恳的叫嚷的包围里。

黄包车

黄包车 黄包车

黄包车 你 黄包车

黄包车 黄包车

黄包车

刚刚来到中国——特别是在北平和青岛——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总是竭力避免上街去。突然看到这许多人对你怀着希望，被这些和你一样的人类包围了，争抢着向你献出他们的劳力，大家招呼你，恳求你，又互相的排挤，这会使你困惑的。就是你给的车资要比应得的少——这正是他由你挑选上的机会那有什么办法——也得争取这个小小的机会。

Jih Lih—Che的意思就是人力车，日本人叫jin rick Sha。日本人把L读做R，在横滨，我听到一个演说者说Renin Buxembulg和Riebknrecht^①另外一方面，在中国，把R读做L，有一位教员客气的对我说，他曾读过德文的“Lampaping Lepoltel”^②

黄包车是从日本传来的，但是它的发明者——唔，这算什么发明！——是一位欧洲人。首先想着在一辆手车之上安置一个座位，而且把这有轮盘的座位用做一种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是一位英国牧师培利先生（Keverend M.B. Bailey）啊！祝福西方，祝福教会吧！在七十年代的开端，东方已经出现这种车子了。

一个叫做梅拉（Menard）的法国人，跑到中国，想要取得经营法租界的黄包车事业的特权。但是，英美租界（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们知道在这

① Renin，列宁，日本人把Lenin念成Renin，Ruxembulg，卢森堡，日本人把Luxenburg念成了Ruxembulg，Riebknrecht，李卜克内西，日本人把Liebknecht念成了Riebknrecht。

② 基希是驰名全欧Rasende Rahorter—RamhangReorter（激烈报告文学家）这里指因读音关系把R读L，把Reporter（报告文学家）读成了Lepoltel。

个国度里，用人力来代替牛马和机械的动力，是一桩最稳当的生意，他们不愿意把这有利可图的专利权让给这位企图抢先的输入商。他们决定以一种优渥的执照费，颁发二十张照会，每张照会可以行驶二十辆黄包车。

梅拉先生妥是有着制造二十辆车子的足够的钱，他会很高兴去领取这样的照会。但是他没有，他只能造十二辆车。这个数目不合两个工部局的心意，为了他们的岁入，他们要求每张照会管辖二十辆车子。一八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他们收回了他的照会——这位黄包车先驱的照会。就是在今日，在出租汽车、私人汽车、公共汽车、机器脚踏车和电车的时代，它每年也要替法租界挣二六七、九六六两银子，替公共租界挣三三七、〇三〇两银子！

梅拉的一个同国人，在北京，运气比他好一点。用法兰西橡皮轮胎装在这人拉的车轮上的计划，使他赚了很多钱，而这个，不过是橡皮轮胎制造商的利润的很小一部分。

许多车主，拥有几百辆黄包车。每一辆车，每天可以收入一块七角钱。这种马车不要车房，这种马，不要马料和马房，就是替他装置马蹄的匠人也不需要。这些车夫，赤着脚，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跑上跑下，这里和那里，慢步和急跑，晚上和白天，非常年轻的和年纪很大的，有的全足踏地，有的只有脚趾触着地，许多人患着肺病。还没有什么牧师发明一种挂在人的肺上和心上的自动租金计算表。

车主买了车夫的整个工作时间，他要车夫在这整个时间里付钱给他。找工作，做工作的车夫，要向那租给他两个轮盘，“替他准备了工作”的车主一天缴付八角五分钱。他只能租用十四个钟头：从下午三时到次日上午五时。从上午五

时到下午三时这个时间，另外一个车夫另外缴付车主八角五分，而他可以在第二天额外租用四小时。许多黄包车，只有一个车夫——他的工作时间没有限度。

在上海，拉这种公共黄包车的车夫，有二四、三七八人；他们养活的家口，达十万以上。黄包车夫的平均收入，每月十二元。干这职业的平均寿命是五年半，于是便死去。

为了十二块钱，他们要一个月三十次，工作日和星期天通通一道，从下午到很早的早晨，天天一样，拉到码头，拉出码头，从南市到闸北，从徐家汇到百老汇，这里和那里，这边和那边，来来去去，慢步和急跑，平均每分钟跑一百三十码，一点钟跑十公里。肺部被这种奔跑损坏了。他们还要充当摩托喇叭，但是汽车并不认识这信号。差不多随便那一天，你都可以看到黄车包被撞翻的事件。每一次撞车，总是汽车司机跳下车子，殴打黄包车夫。过度的瘠瘠，心脏病，肺癆病，危险和虐待，是黄包车夫的命运。这样生活五年半，于是死去。

不能抬高车价。他要用他的腿子赛过电车和公共汽车，而且要比它们都便宜。简单的颠覆电车，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北京黄包车夫大罢工时所作的那样，是不行的；为了那次事件，有二百一十个车夫被杀了。他们死的时候，激动地叫着这样朴素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电车，团结万岁！”

拉一个相当长的路程，中国坐客只愿意出二十个铜板，车夫却要三十；于是来了一阵讨价还价。因为轮盘的供给者老在步行的需要者旁边走着，而到头来还是车夫屈就，因为，这里，那里，一步挨一步的到处伏着他的竞争者。欧洲人是比较好一点的顾客，可以出一角钱到两角钱。现在，

在日本海军大炮的轰击之下，中国人的住所正在战烟之中毁灭，欧洲人的生意很活跃。列强都来了，他们不会得不到在中国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水手和水兵，乘着车，在酒吧间和码头边的汽艇之间，跑来跑去。在人力车里，他们觉得好象是坐在Rollis—Royce^①里面一样。他们加快马力——虽然到晚上，这架坏了的机器会要失掉最后一点瓦斯——他们向白俄妇女殷勤的挥手，这些妇女，没有轮盘，没有橡皮车胎，却在这里和那里，来来去去，白天和晚上，充塞在霞飞路的人行道上，闯着马路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和熟人一道，那么，车夫会并排的跑，而且合着步伐，这样，你们可以继续谈话。人性马的速力常常是不相等的。

“你为什么拣了那匹老马？看我的车夫，迈动他的腿，跑得多么好。”

“我叫黄包车的时候，总是只看车夫腿上的脉节。那小腿细长的，跑得最好，就是老的都好。”

坐客很少说出他要去的方地方；自然，车夫是不懂得街道的西文名字的，他的坐客指示他要转弯的地方和他要停车的地方。对于他的坐客们，他是一匹拉车的马，只有在坐客们的脑子里，才能完成黄包车夫举行一种公共的快步赛跑的计划。

在巡捕手里，车夫不会受到更好的对待。只要他因为没有留心停车的信号，就会挨上橡皮短棍的轻轻一击，但这还是他的福气。更坏的是碰到严酷的巡捕，把车上的坐垫拿掉以作

① 罗尔斯·罗伊斯，一种高质量的发动机牌号，以此装配的汽车是一种最华贵的汽车。

为处罚的时候，不到那位严酷的巡捕得了三角钱的贿赂，是不会把坐垫还给他的。要是这位法律的守护者，按照法律来处置的话，他就要扯下车上的照会牌子。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幸的车夫只好拉着车回家去；今天，再也没有机会在市上奔跑了，不到明天，他决不能从捕房拿回他的照会牌子。就这样，车夫起初是生气勃勃，后来是疲惫不堪，走走停停，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来赚得一碗饭吃。

目击这种街头景象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车夫们是安分守己的：“我们”是拉车的牛马，我们尝着鞭子，却不会得到很多的刍秣——“他们”是主人，我们拉，我们用力拉——我们跑到坐在我们后面的主人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去，无论怎样，过了五年半，一切都完结，而我们就和我们的先人一道了。我们象马一样的驾在车辕上，因为这样，我们要象马一样，用我们的腿来跑，而且惹人厌的呼叫。过了五年半，一切都完结，不是吗？

不要错了，你，细心的读者！也许有许多车夫是象你所猜想的。但也有其他许多车夫，会在晚上，在一个房子里举行集会。他们派了望风的人，这样不至于被巡捕突然袭击。车都托付给了朋友，因为要是车子停在那里没有车夫的话，是会引起人的疑惑的。他们在那里学习，讨论，决议什么事情，……

这些时间，车夫们是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来偿付的，要是被捕了，就要用他们的头颅来偿付。他们再不能够延宕五年半，明天，他们就要走上断头台。他们会象北京的伙伴那样死去，但他们最后的呼声，并不是对电车的诅咒了。

巴格达的犹太资本家的故事

法权之外的人们居留的土地，不属于统治中国的任何列强：它属于犹太人和耶稣会的会员。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犹太人。这种人，好象一切其他种族的人一样，在上海的帝国主义榨取把戏当中充任了一个角色。

如果要理解这个壮丽的喜剧，这戏剧的戏单是值得看看的。

强制关税	}	英国
强制公债		
强制输入		
以 上	}	印度
的守夜者		
以 上	}	俄国自卫军
的近卫兵		
受贿	}	法国
烟窟		
淫业		
以 上	}	安南
的看守者		
暗探	}	白俄
妓女		

以上所雇用的

战争和军事挑拨的 } 日本
执 行 者 }

童工
美孚油
烟草公司 } 美 国
传教和大学
的侵犯国权 }

军事顾问 } 德国
军火贸易 }

地产投机 犹太人
债款收取 葡萄牙
赌博（回力球） 巴斯克人^①

外国人的中 } × × 党
国同谋者 }

这个戏单不要看得太严格了。一个演员从那被分派给他的角色跳去扮演别人的角色的事，是并不稀罕的。

今天，象我们说过的，我们要研究一下犹太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研究下巴格达^②的犹太人，他们所经营的是贩卖印度鸦片和上海的地产投机。他们发源于伊奔·萧相族，这种族在十六世纪初，为了避免宗教裁判的恐怖和强迫的洗礼，逃出了西班牙，居留在巴格达。在伊奔·萧相商人经营着香料的生意。但是，似乎是这个种族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又逃亡，对于犹太人的又一次杀戮把他们赶出了巴格

① 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麓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

② 今伊拉克首都。

达。一八三二年，他们取道波斯布什尔海港到了印度。他们在那里化名沙逊，不久就变得比大部分的印度巨富都还要阔气了。

这也许可以看做是犹太人的勤勉和耶和華庇护的明证，而和他们在同一个时候从波斯来的达达族——他们的宗教：拜火教——却没有在同样的时间里得到同样稀有的财富。阿布多拉大卫沙逊，在棉纱业上赚了大量的钱。笛拉布其·詹姆绥推其·达达，在矿山事业上赚得更多。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命运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达达族人和沙逊族人都建立了银行，而且把鸦片运到了中国。

不是耶和華上帝，也不是火上帝，使达达族和沙逊族的先生们获得了他们的无量的财富和他们的英国贵族的特权；使他们获得这些的，是商业和工业的上帝。

东印度公司刚刚不得不把它对中国输出的垄断权交与私人贸易的时候，英国的商人们就要求一切留给他们的市场都要大大的强制开放门户，英国的毛织物和棉织物，特别是印度的鸦片烟，都要能在富裕的中华帝国猛烈倾销。

卡尔·马克思在概括达达族和沙逊族到来的时代的形势时说道：

“在一八三〇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一八三三年以后，特别是一八四〇年以后，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由私贩鸦片招致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

化了。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父君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父母官。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

历史用来麻醉这整个民族的手段是鸦片烟。印度鸦片烟有三种：咖啡色的巴特那^②，颜色比较淡而又比较贵重的吗啡，颜色更加淡而且更加贵重的巴特那勒斯^③。

这个民族籍以脱离他的传统的精神愚钝，开始反叛的行动，是一八三六年六月十六日广东海港的对二〇·二九一箱印度鸦片烟的焚烧。

英国人现在还断言，这个破坏行动——象在波士顿港发动美国革命的英国茶叶的沉没一样——不过是中国罂粟种植者方面的一种竞争的策略。而中国人现在还是断言，那时候，中国鸦片烟的种植不足轻重，而那许多箱烟土的焚烧，不过是反对毒害自己民族国家的一种行动。

毒害国家？我们可以希望一个人为了怕他会毒害一个国家，而放弃他的有利的营业吗？难道英国贸易均衡的损害的

① 这一段引语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

② 产于印度巴特那（Patna）。

③ 产于印度班那勒斯（Patnares）故名。

意义，会比区区几百万中国人被毒害的意义小一点吗？先得考虑利润，然后才是人道。

卡尔·马克思明白的说明了，这种麻醉品贸易的对于殖民者的重要，有两个原因：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卖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①”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英国不能忍受鸦片的被焚烧。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的战败，条约港的建立，咖啡色的帕特那、淡淡的吗啡和非常暗淡非常贵重的班那勒斯的毫无阻碍的输入。

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公司创立者的八子之一，在一八五〇年来到了上海，他是要在这里安家立业的。自然，他不是孤单的，英国公司象贾定，马太孙公司，美国人象罗塞公司，都在老早以前就把他们的大船停泊在这新开商埠的码头上了。

输入商人赚了无数的金钱，一直到卡尔·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预言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不错，中国人不愿戒吸鸦片大概同德国人不愿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即受到致命的打击。”^②

①② 这两段引语均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七页。

当这个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而印度的鸦片输出差不多被中国人的竞争灭绝的时候，英国人的良心就可以在下院萌发了。这个迟迟的——因此也就是合时的——行动的结果，上海鸦片烟协会在亚历山大·贺西爵士主持之下举行会议，决定了把外国鸦片烟的输入，每年减少百分之二十，这样，五年以后，输入就会完全停止了。

这个决议意味着，要是单讲鸦片制造的话，中国已经获得了自主权。沙逊公司专心致力于不可轻视的地产投机。到现在沙逊的营业还是很繁荣，上海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银行和中国最高的摩天楼，华懋饭店，都属于它。而在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的儿子，维克多爵士身上降临了可能降临到一个东方或西方的犹太人身上最大的幸福：他和一位真正的活的洛特柴尔德^①结了婚。

可是沙逊家族的事业却被他们公司所雇用的一位年轻人西洛斯·亚伦·哈同荫袭了。这位年轻人，最近才享着高龄逝世的，是一位生在巴格达的犹太人，但是，他却被当做一个中国佛教徒，埋葬在以前张世和的娱乐园的中心。

一八六二年，西洛斯·亚伦·哈同，象他许多巴格达的同教者一样——象伊利·卡多里（现在也是一位爵士），象沙蒙（现在是一位大影片商），象爱德华·伊兹拉（现在是一位饭店主）一样，是沙逊公司的一位雇员。他在香港停留五年，后来调到了上海的总店，在上海，作为一个不动产的投机者，他独立活动了。他买了南京路的一半，从四川路

^① 洛特柴尔德（Rothschild, 1777—1836）在伦敦的德国犹太银行家。

一直买到苏州河，买了静安寺路的一半，里面包括了那座娱乐园，在那里他要单独的自己享乐。

一九一一年，当革命和共和在这三千年的帝国发生的时候，哈同和保守党，和昨天的统治者交际起来。在他的静安寺路的围着墙壁的领地，他收容了前广东提督陈尚良，南京的强盗将军张勋，和其他丧失了权位的权贵——伟大的慈禧从王妃到皇太后这中华帝国的六十年的绝对统治进程中的血汗同伴。和她匹敌的王妃，和她匹敌的皇太后，王子和太监都需要扫除，于是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对于那些担任了宫廷谋杀任务的人们亲自表示了感谢。当革命爆发，他们逃到在法权管辖之外的哈同领地的時候，有一个时期，天天晚上有炸弹掷进哈同花园的围墙。这些炸弹是要炸张勋，陈尚良，和其他地方上的专制魔王的。这个一点也没有打扰房子的主人。哈同并不关心他的客人在政治上有没有声望，他收容他们并不是出于人类的同情，而是想要廉价的收买他们的公馆和产业。

他希望祖先的神灵赞成他慈善的营业，只是在他的同教者之中表露的。他在上海建筑了壮丽的阿赫·摩西斯犹太人会堂，收了十二个养子，五个欧洲孩子，七个中国孩子。而且在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之下抚养他们长大。哈同常常微服私行，为的是亲自去寻找他的行善的对象；因为这个缘故，人都叫他做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拉斯溪德·哈同。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他死了。他死以后，人们才知道他晚年脱离了犹太族。不错，他是葬在犹太人墓地的教友们旁边；但是大家看到了他那花园的大门上，悬挂着的蓝色的帷幕上，缀着白色的中国丧礼的象征。

二十天以后，和哈同同居了五十年的一个舢舨船夫的女儿，罗迦陵（丽蕤）夫人公开的替哈同发出了一个佛教徒的丧仪的讣闻。六个高位的执事擂着鼓，吹着笙子，敲着铜锣，奉上祭献的香。祈祷仪式所需要的器皿是从一个佛寺拿来的。关于这个佛寺的存在，一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它是建筑在别墅的花园里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后裔和中欧北欧的犹太人后裔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很惊惶，而当遗嘱发表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惊惶变成了苦恼和恐怖。呵，呵！这位逝世的同教者没有留下一个铜板给他的犹太人的集会堂、他的犹太孩子和慈善机关，以及上海的乞丐，西洛斯·亚伦·哈同，这位苏伊士之东的最富的人，明明白白的把他的全部财产——两千万元现金和上海的不动产——遗赠给了他的妻子。

另一方面，哈同的遗嘱不是幻觉，不是幻觉的还有被忽略了亲戚们的呼号：罗迦陵根本不是哈同的妻，她不过是他同居过罢了。作为一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还是伊拉克国王的臣属，依照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他根本没有权利把他的财产遗留给一个不同种族而且不同宗教的妇人……

死者的一个名叫伊兹拉·哈同的可怜的堂兄弟，提起了要求撤消遗嘱的诉讼。许多最有名的律师从伦敦赶来；但是当他们的看见了西洛斯·亚伦·哈同的遗书的时候，他们声言没有办法。这位犹太人是成为一个佛教徒死去的，而且表明了把从中国人身上获得的财产重新归还中国人的意旨，为一个这样明显的违反死者遗命的诉讼案件去辩护，是不公正的。

无意中拜访了几个宦官

这是和北京以及它的近郊毫无关系的，北京近郊的夏天的散步。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印象，我们的眼睛迷乱了。

这里有一座宝塔，宝塔有十四层。在每一层上都有着金色的、绿孔雀石色的相同的波浪一样的飞簷浮在空际。有一座粉饰华丽的牌楼立在走道上。我们不大去望宝塔或牌楼，我们在一种不断的狂喜中困倦了。

在这样的散步中，谈话很容易转到中国的风景上来。

中国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我们中间的一个说。这里的西山，它们不过是一些山而已，和瑞士或埃菲尔的山一样。麦田？各处的麦田都是麦黄色。各处的牧场都是绿色。

他的和他争辩的同伴——到明天，他们也许要掉换扮演的角色的——提起了许多特别的东西：黑白杨木的形状，闪着银光的小块稻田；而这一队垂着头的骆驼，你可以在瑞士和埃菲尔找到吗？

唔，但，是在土耳其或是在非洲！

不，我得承认只有在中国，你才可以找到饰着琉璃瓦的墙垣，和田间的葬龕！

这些和风景没有关系。这些是建筑——也许你要把虎桥和明陵也包括在自然风景里面吧！

我们这样为谈话而谈话的谈着；一面说，一面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走。我们爬上一座圣陵的坟顶，从另外一边走

下去，在一个山谷间，一垛墙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怀着无目的的固执，沿墙走去，去找寻一条通道。

一百步以后，我们寻到了一个宽阔的隙口。这是一家牛乳场的大门，我们得通过这里——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走去。一群狗在我们四围跳着吠叫。它们胆怯地，却从四方八面追逐着我们。当我们站住的时候，它们也离开三步远站住，等着。这样一种护送是不十分愉快的。“一个人散步不能不带一根手杖，”我们说。

但我们很快忘记了狗。朝着我们走来的人，是这么相象，以致每看到一个新的人，这种相象就感到更加显著，直到最后，这种相象竟变得不可思议了。

她们都是年老的妇人，显然是在农场上工作的，有的用绳子牵着牛，有的背上背着袋子，或是拿着耙和草叉走过。她们依照这个国家的劳动妇女的习惯，穿着深蓝色的裤子，可是，和习俗相反的，她们的上身裸露着，她们的乳房不害羞的下垂着。

这些女人们谈着话，虽然她们的谈话声不高，可声音是尖的——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她们发出来的声音带着尖锐的音调。

一个体格结实的女人，她脸上刻镂着无数细小的皱纹，站在一辆装了麦秸捆的大车顶上。下面，人们正用着古老的圣书上面的，却还是现代中国的方法在那里簸麦：在一座踏磨里脱粒了的麦子被人用一个木楸向上抛掷，麦粒因为重量的缘故，垂直落在地面上，轻的糠末好象一阵尘雾般飘开，飘到几步以外的地方落下。

老妇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她们的喉咙上的皮肤松

弛地摆动，头都剃得光光的，只在脑顶盖上留着一束“发簇”，是这么稀少，这么灰白的一束头发，显露了生着这头发的人的老迈年纪。看不出她们有什么毛病，她们大家都起劲地工作着。

后来发生一件使我们找到了一点线索的小小事故：老妇人中间的一个走开去小便——她却以男性本能的姿势站着。

“这个田庄是谁的？”我们向和吠叫的群狗一道慢慢走到我们近边来的另外一个老妇人问道。她走得更近点：“我们是皇宫的官吏，这是我们的退隐所。”

于是我们完全懂得了。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一个老年宦官的寓所。

麦子和糠末被他们向上抛着，小小的驴子在被赶着碾麦子，麦秸捆被装上了大车——我们站在那里望着这些人。五分钟以前我们把他们当成女人，后来看上去又好象是男子，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这些人和他们的同类，自古以来，在帝制的中国扮演过被保护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做过政治家、顾问、操纵者和权谋家，皇宫龟奴和茅舍的绞刑吏。

宦官们把未铸造的赤金，铸造的纹银，绣着龙的织物，和着色的绸缎等各种贡物，积聚得这么多，以致各省反叛起来了。借着政变或毒杀，宦官们终结了一个朝代，以便帮助有更丰富酬报的主子们来即帝位。宦官们用建立海军的帑币去造颐和园，而使一八九五年和日本的战争失败了。

五年以后，维新的努力威胁了这些阉官们的地位。他们很快地把持了义和团，而且慢慢地促使皇朝相信义和团不怕枪炮，简直是不可伤害的。在这种影响之下，皇太后支持了

这次反对洋人的无望的叛逆。但是当运动溃败的时候，列强憎恨地残忍地要求公开执行死刑的长长的名单上，没有一个宦官——黄种人的宦官和白种人的外交家是知道怎样一起密议问题的。

人民一致憎恨这些里里外外都象一个鸡蛋类似另一个鸡蛋一样的——要是这种比喻是非常恰当的话——互相类似的皇宫的宦官们。恨他们，比恨皇帝和王爷，比恨王妃和官吏，都要厉害。“御史”们，那些散布国中的官家监察者的许多奏议，都要求铲除宫廷的宦官——“这些龙座的阴影之内的去势的蜡烛”。

而且实际上，在某种企图失败以后，有许多宦官象替罪的羔羊一样被送进了荒野，虽然在生理上，他们比其他朝官更要缺乏犯罪和公山羊的属性。当然，并不是个个人都是这样。譬如，安得海佩了并不属于他的总管太监的头衔，因为他和慈禧太后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现在还活在中国。另外一位太后，慈安，妬恨安得海，把他杀了，而她自己却不得不以被毒杀来抵偿这个行为。安得海的后继者是李莲英，他充任总管太监直到一九一一年，一直到帝国倾覆的时候。

制度本身总不能变动：后宫需要明明有能力而又实在没有能力的太监，要不然，为了王位承继权的缘故，皇后和妃子为了获得一个小孩，会使用每一个可以使用的男子。

宦官们看守着妃嫔，回护着他们主子们的婚姻的体面。可是当一位后宫的太监一旦容许了一个外人混进宫里，那么，这么一来，变成了母亲的这位妃子，和妃子的后嗣一道，就落在他贪得无厌的掌握之中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些曾是很有权势的人们在干着场

院上的活：运麦秸，扬场，碾麦……这些年老的朋友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庙宇。到庙里去的路一直通过院里的宿舍，群狗伸着舌头，跟着我们走。我们经过那从半开着的门照亮的走廊。在茶桌旁边，一排头上竖着发辫的老妇人，向我们点一点头。

我们的向导说这个退隐所以前很富足，而且，怕我们不懂，他把退隐所以前是怎样富足表演给我们看，他做着从口袋里一再往出掏钱的动作。但是现在——现在他们需要非常辛苦的工作：要挑担，打谷，驾大车。

我们懂了。在帝国时代，差不多万能的总管太监们，是并不吝惜他们随时可以从君王宠爱的高处跌落进去的退隐所的捐款的。只要一个宦官还在宫庭服役，还在管理后宫的交通，而且在国家的会议上发出尖锐的声音的时候，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去瞻养他的已经到了退隐所的男性同伴，同时，在万一的场合，也为他自己的老年作了准备。

和王朝一道，宦官们的政治生殖力也消失了。皇帝逊了位，将军们留着。将军们和外国殖民官以及上海的银行家共管着政府。他们的政务是由一位脸色苍白的财政诈骗者，和他的一群僚属去执行的，他们就是宦官那样的人。

从前皇宫的宦官经营着他们的农场。麦秸捆被垒上麦秸捆，麦壳从麦粒之中被扬出去，麦子被碾着。他们工作得很好，虽然他们不需要瞻养老婆，也不需要瞻养儿子；他们工作得很好，虽然他们并不能够以他们的劳动的结果改变他们的境况。呵呵，这不是为反动者的论辩吗？因为，的确，他们总是大声疾呼地反对人有阶级的自觉的。那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要使穷人沉溺在无知、迷信和污泥里，因为那是他安适的地方。人们不要发展吗——无论如何，这会一致

的！——人们不要借着阉割来除却那些搅乱他工作的种种冲动吗？在每个人生下必要的子嗣以前，当然是要的，从上面看来，宦官们工作得怎样勤勉不是很明白吗？

但是这种未来的政治纲领已经够了。这里有一座庙宇，这是一座好象它的其他的同类一样的佛寺。神龛里摆着一支历史上有名的戟，戟是这样的巨大，使人想着需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去使用它。但是相反，使用它的，是一位宦官；康公是他的名字，在战争中他杀了许多敌人。这是他的英灵对所有宦官都很神圣的原因。他的陵墓那边屹立着“护国寺”，退隐所和坟山。

坟山，在它是一座坟山的这事上，就很稀奇了。一般的说，中国人总是葬在旷野的，多半是在他的降生地，他的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宦官不这样，他们没有家，他们没有血亲，纵令他们是王爷也是这样。是的，有一位王爷也葬在这里，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李莲英。他在慈禧太后的身边作威作福四十年，而且借着她的名号，为了他们两个的利益，残忍无情的榨干了中国人民。

我们透露了（用问话的形式）李莲英王爷不是一个真正的宦官的传说。得到的回答是无限的轻蔑。这是因为我们的可怜的中国话呢，还是因为我们说这样的话伤害了一个宦官的体面？

五角钱的小费，一点也没有慰解这位老头儿——也许，他从前是一位御前大臣，或是一位皇室的司仪官。狗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猜疑，带着滴水的舌头和转动的眼睛，伴送着我们，直到我们重新走出了那垛围墙——我们不知不觉走进了那里边的那垛围墙以外的時候。

即 决 审 判

提审案子的时候，被告走到一个木栏边，他的头和肩就从被告席的木栏杆上突现出来；有时候四五个人，并排站在那里。

这出戏没有开头也没有终结的进行着，好象市场上的傀儡戏。观众只看见人物的后背，紧要的时候，他们听着对话；但是没有人对这整个的戏都感兴趣，每个人都只对单独的一幕，单独一个角色，单独一个插话——因为亲谊或友谊，他被卷入了漩涡的那些人和事，感到兴趣。

三个审判官坐在审判席上，他们的下面，左右两边，是见证人，禀告人，工部局的报告人和报馆的座席，报馆差不多总是没有代表到场的。因为，毕竟，这里仅仅审判小事件：最大的处罚，是一年徒刑，——小的案件，为着一笔小小的款项的犯罪，一天天，一年年，老是一样，显然没有重大的事件。

这就是这么多的包探在这里的道理。有这么多，使得那分派给他们的房间容不下他们，因此，他们在法庭上来回走动，闲谈和戏谑。被叫到的时候，他们大声的通报他们的名字：C.D.S. Number So—and—So, (C.D.S. 某某号。)这是他们的唯一的名字——Chinese Detective—Sergeant—Number So—and—So (华探长某某号)。

也有欧洲人来装饰告发的位置。所有一切英国人都存

——一种演剧的惯例！——一脑红头发，象在十六世纪“最后的晚餐”画里的犹大一样。他们从伦敦或爱丁堡来到远东，为的是要把逮捕可怜的小小的罪人的事，作为一种终身的工作。他们敏捷的走上证人席，来证明他们的牺牲者的犯罪。他们说的是英国话。

睁着眼睛，张着口，象雕刻的傀儡似的黄色罪人默察着说的话。对外国人说的外国话，象雕刻的傀儡似的黄色罪人不能够还击这些话，不能够反驳他们或是打断他们。象雕刻的傀儡似的黄色罪人一定要毫不抵抗的忍受外国人的外国话的诬陷，而且被他们抛进监牢里。

当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为了使公共租界的陪审员听懂，一个翻译一字一字地译成了英语；告发人的控诉，他又替审判官译成中国话。职业的起诉人要说的一切都由一个拿毛笔的书记从头到底地记录下来；这记录要做判决的根据——证明的确是不能被怀疑的，因为还会被其他的人加以证实：每一个被捕的扒手都有好几个华探做见证。（“在上海每一位居民都有五个告发人，”他们中间的一个常常这样说，叹息着这么多的竞争。）

此外，桌上躺着不可辩驳的，绝对不可辩驳的，可怕的 *Corboa delicti*（罪证）：撕裂了的钱袋，或者是放着两粒骰子的饭碗和几个铜板。

一位整洁的梳着分开的头发的中国青年（他的西装上罩着一件黑色的镶着银色带子的律师长袍）是对每一个案件最初说话的人。我们满意的注意到他在辩护中虽然还没有熟谙事实，正和随便哪里的公家被告辩护人的情形一样，却带着热情的真挚申辩他的道理，这个却不是随便哪里的公家被告

辩护人的情形。但是我们的满意是很短促的。我们立刻看出了他不是公家的被告辩护人，倒是公家的被告辩护人的反对者：一位公家的起诉人；不是穷人的律师，倒是穷人的律师的反对者：捕房律师。他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特别派来充任反对中国人的公家起诉人。

辩护巡捕的他，坐在舞台的前面；没有人辩护的他们，就正在他的头上扮演他们的角色。法庭的一角有一个装备着铁门、钢门、窥探洞，重重守卫的房间。这房间的用处是一望而知的。这个傀儡戏院的每一个悲剧演员在他的戏幕上演以前，都被抛进那房间里；他的戏幕演完，立即又被抛进了那里面。在各场之间，人物被捆在一起，带了出去。

天井里，楼梯上，走廊间，马路上——到处站满了卫警。五六个犯人，绑在一道，从囚室拖到法庭，从法庭拖到囚室，从法官拖，到刽子手拖，拖着一直走，拖着转弯抹角。如果只护送一个人，那么适当的方法是提住他的衣领，踢着他走。为了让路给一个高等的或是另外的卫警，巡捕就用脚踢他的犯人以指示方向和催促。

在法院里面，被告也是这样地出现法官面前。被人一推，颠簸的走上阶台——那就是他，从捆绑的圈套里出来的一个傀儡。

即决审判。孙藏和黄贝禄绑在一道。C.D.S.一八四号证明：昨天这两个犯人在一家象牙雕刻店，当黄贝禄在问一个图章的价钱时，孙藏却竭力想偷窃一副麻将牌。黄贝禄释放了，孙藏判罚二十元，这就是意味着二十天的拘留，因为这里没有一个犯人有多余的银钱交罚款。两个人分开了，孙藏消失在角落里装着铁门的房间里。

一个生着灰白头发和灰白胡须的凹眼的人在乍浦路引诱路人去赌博。在乍浦路诱人！就象他们需要引诱一样！几个铜板的赌博！没有用，老人——特别是他从前判过罪——得到了十天徒刑的宣告。他被推进了角落里的囚室。

一次六个，六副脸孔挤在一道，六个躯体挤在一起，一个贼帮。要遭受什么对待？不知道。这就是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但其他一切都不相同的这六个人，用圆睁着的斜斜的眼睛凝望着前面，凝望着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的道理。

他们从闸北一个被炮火毁坏了的屋子里窃取了一位当铺老板的财物，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C.D.S.七十六号搜查一家人家的时候发现了许多赃物，那被捕的青年出卖了他的同党。有一个人否认一切，有一个人否认一半，有一个人否认四分之一，有一个人告发了两个，而他们都锁链链在一道，被告密者和告密者，罪人和非罪人，同党和仇敌。

C.D.S.七十六号叫他们做“流氓帮”，他说这些分子是“流氓”。这正象什么人在欧洲提及“大实业”，却意味着一个小机器匠的店铺一样。中国的流氓帮口的势力正和欧洲的大实业的势力一样，大流氓控制政府，控制警察，控制鸦片贸易，把绑票和奴隶买卖的组织掌握在他们手里，收敛赎金，强勒税款。

但是从被告席的边缘上窥看着的六个头，听到被叫做流氓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荣幸，而审判官的三个头，也没有为了和他们面对着面的人被称为流氓帮的这事实，而感到不安。你可以绞杀这些小流氓，或者，他们要是十分，十分的小——象这六个一样——就把他们关几个月。

下一个案件！罪犯使用了伪币。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

知道，在中国，每五元银币中至少有一元是假的；任何银钱兑换商都会毫不踌躇的以八折把它收受。每一个大一点的将军，每一个地方统治者，都自己铸造他自己的货币。有币模的人铸造货币，为它受罪的，只是可怜的零售商。

下一个罪犯是一个叫闹的口吃的人，生一个平平的头盖，只有一只眼睛。他用手指比划着，竭力想比划出一种动物的样子。人对他说说话的时候他不听——显然是一个疯子。也就因为这缘故，被告席的旁边站着两个巡捕。犯人是一个渔夫，昨天袭击了一个他认为欺骗了他的米商，用一把刀子重重的杀伤了那米商。这个案件要搁延一个礼拜，因为米商还生死难定。要是他死了，那么，这法官就免掉了宣判的麻烦：误杀和谋杀不是他的权限以内的事。

下一个案件，下一个案件……每一个案件，民事警务处的捕头和巡捕都走出场来。正象警务处的稽查员控告每一个犯人一样的控告每一个犯人，此外还叫了诉讼的证人来。替被告辩护的见证人和辩护人，在这个违警罪的裁判所，是看不到的。

巡捕不只是捕捉可怜的穷人，还要雄辩滔滔地加他们的罪名，带来他们的探目和探长，和其他诉讼的证人。纵令是在中国的监狱，他还是隶属于公共租界的警务处的，因为他们看管着特区法院的男犯监狱。

中国人并不感谢这么厚重的关怀，倒希望外国人满足于他们自己不能作为刑事被告或民事被告被传到这法庭的这个事实。中国人愿意从外国权力之下收回公共租界的他们的法院。那将是一件绝好的事！把英国巡捕搜捕得来的小偷和乞丐任意判罪或释放的工作不用监督的付与这个苦力法庭，那

将是一件绝好的事。明天黄种人会要求英国、法国或美国的罪犯，也去受一个黄种人法官的鞠讯，正和现在，中国人之外有德国、^①奥国、捷克、土耳其等的受鞠讯一样。

外国人比较看重的犯罪，在法院的楼上审讯。在民事法庭的前面，外国债主和中国负债人在争辩。律师在这里执行职务；为了使法庭听懂，欧洲律师和中国律师的话被译成了中文。在这里，原告人和民事被告都带了证人来。证人并不宣誓，因为这缘故（让我们到中国去！）宣誓负伪誓罪的手续并不摆在法庭的演剧目录里。两方的亲戚或雇员，不能做证人，因为法庭始终认为他们的证据是有利于他们的雇主或亲戚的。

关系着金钱的时候，两方的争执比那仅仅关系生命问题的时候更为凶暴。关系着金钱的时候，关心的不只是他们，法官也关心。而现在——现在是提起下面这个字眼的时候了，这字眼在巴德卡^①的旅行指南上寻找不到，可是已经大大的流行，而且在中国有巨大的意义。这字眼就是外快（Squeeze）。

外快是部长从军火工业和银行那里收受的东西。

外快是买办泄露营业秘密给敌对的商号所得到的酬报。

外快由出租汽车车主付给挑夫，由鲜果菜蔬商人付给厨司，煤炭商人付给“仆欧头”；由邻近一切商店付给公馆仆役，由汽车夫付给关税征收员，由关税征收员付给汽车夫，由备辩食物者和采办粮食者付给官太太。

外快由国民党收取和支付。

① Karl Baedeker 德国的旅行指南出版家。

外快由将军从他的敌人那里收取。

外快由包探从富裕的犯人那里收取；外快是……唔，每一个人都要得外快或是付出外快。

外快，行贿——用欧洲婉曲的辞令来说是 Commission (佣金)——是便于维持殖民地统治的政治理由的一种：中国人不能自治，因为他们腐败，每个人都要外快。

但是这个字眼是一个英文字眼，对一个外国人愤慨的叙述中国法官公开受贿的程度的美国律师，听到了这样的惊问：“那竟和芝加哥一样吗？”

在这一点上，应该提起一位彻头彻尾的英国保守党员台哈特，当他指出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竭力想证明中国人种的劣等时，他得到了一个同这一样的回答：

“象在上海这个中国城市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凄惨的生活状况，”他雄辩地问道：“你在任何其他的地方看见过吗？”

“看见过的，先生。”有人这样回答，“在怀特杰培。①”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反对中国的理由，并不比中国人要外快的理由少一点漏洞。无论如何，很少中国人或竟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收取了这样多的外快，象法租界当局从鸦片私运者、赌场、烟窟、娼寮和流氓团体中所收取的一样。

没有疑问的，中国是被外快腐蚀了，司法制度也在内。我们知道这点。但是在研究特区法院的时候，我们不能断定哪一个判决是免费宣告的，哪一个是对酬报的报答。

① white Chaope I 在伦敦的东区，贫民集居之地。

要断定这个，人得非常机巧，而且也得是内行。我们不过想象着，受贿的法官的职务，一定是一种极端复杂的职务。这种穿着法衣的奸徒，比起那可以任意裁判，比较单纯，不收贿赂的法官来，需要更多的条文细节的知识，和更多的机敏。金钱主义的法律学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印就的决疑法；法官必须“创造”不公平，而且，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就在万一的场合，一个没有受贿的高等法庭，也不能不批准这种不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也要维持面子，一定要使公众相信：法律女神的天平，是自然而然的倾向送了贿赂的这一边的。

只有一个法庭无须重视高级审判或公众。这个法庭所在的厅堂很大，因此一般人可以成群的进去；但是一般的人却小心翼翼的，并不进去。我们想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同伴小声的对我们说：“走罢，走罢，要不然，人家会怀疑你对于这类的事感到兴趣。”

政治犯，共产党，是在这里受审判。这个法庭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它宣告判决，同时又是批准判决的高等审判厅。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嫌疑的人，并不按照法律和外快受审。二十年的监禁，或是枪决，或是杀头，是他的命运。在杀头的场合，那样迅速处决的中国人的头，要挂在一个特别拥挤的街角上。

纱厂童工

“一份够了，”医生说。

我们要求允许抄录几份病人的病历卡。

“为什么要几份呢？所有的病人实在是一样的。”他指点着上海肺病医院的病床，从那发育不完全的小孩身上爆发着阵阵咯血的咳嗽。“他们都是工厂工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履历，同样的病情。你为什么要几份病历卡呢？一份够了。”

的确，一份是够了：

蔡碧，女性，年十八岁。七年前随父母由浙江到上海。十一岁即入纱厂作工。第一次月经在十个月以前（时年十七岁），第二次是三个月以后。两次均为少量淡红稀薄之血液。以后，经期停闭。除冬间一礼拜休假外，病人在工厂每日作工十三小时，工作分日夜班，轮流掉换。五年前，父患泻黏液与血之痢疾（似赤痢）死去。母尚存，以前健康，惟近亦咳痰。妹亦患咳嗽，其家族似有肺病史。

病人苦于咯青色痰液之剧咳，迄今已逾一月。病开始时发抖，发热，晕眩。两个月以前早已有微咳，病发后痰液大增，最近，痰已发恶臭。病人又常觉虚弱，夜间盗汗尤多。未得许可以前，虽有上述病痛，病人犹在作工，然咳嗽

对于工作已大有妨碍。

述及从前所犯病症时，病人提及三年前曾犯赤痢一次，一年前，颈部曾浮肿。

现状：营养不够，发育不全之病人。阴毛腋毛无，乳房之发育似十三岁女孩者。玻璃色指甲。面部与四肢微呈苍白色。

诊断：（依据体格检查与X光线检查）右肺患青春期肺结核，上叶有中等大小之凹处。

“还有什么办法吗？”我们问医生。

“在中国？没有办法。”

二

中国的工业实在已经超过了儿童时代的规模，她却还没有工人阶级，是在体格上没有：工人阶级的百分之四十是小孩，是那些年龄过了儿童时代，而体格却还没有脱离儿童时代的小孩。象我们在病历卡上看到的一样。

让我们走进一个大工厂的纺织工场吧。小女孩在纺织机，摇纱机，纺锭之旁忙碌着。没有一个小孩看着有六岁以上的年纪。但从病院里知道了外貌不足为凭。在那里，二十岁的人象十三岁，因此，在这机器旁边工作的小孩，看着不到六岁大的，至少总有十一二岁。

用她们的小手，她们能够处理需要处理的每一根纱，她们能够排正空的锭子，或移开满的，并不需要踮起脚尖或爬到凳上去——机器是配合着他们的身材而造的。

机器是从英国运来的。这种技术的胜利，人们不大夸

耀；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关于儿童纺纱机的任何记载。这些小机器上也没有刻镂制造者的名字。而在一切大机器上，大家可以看到Asalcec, Oidham的名字，或其他英国工厂的名字。

“这种小机器是特别替中国制造的吗？”我们有机会碰到一位英国公司的经理，就这样问他。

他赶紧辩白，事情并不是这样。“相反的，儿童机器在兰开郡^①的纺织区使用了几十年，当英国禁止雇用童工的时候，这种机器就运到了美国，供新英格兰和南方的黑人州使用。现在，它们才运到殖民地和中国的。”

为着不公平的怀疑了英国，我们很客气的道了歉。

三

纱厂车间有两百码长。无数的机器全由女孩管理。

在那里，男孩只担任清扫工作。棉絮和灰尘不断地腾成云雾，不断地需要扫除。两个孩子沿着通道挥动两把扫帚，直扫到大家碰头了；这样的被扫拢来的东西，由一个孩子扫进他的畚箕，送了出去。

扫地的孩子，拿着有他三倍高的扫帚，高高的在递送机的防护物上，在运转设施上，扫除尘积着的棉絮，以使不再有重新堆积绒毛的余地。

男人在打包间和动力装置上工作。在工厂的账房里也看不见一个女人，就是在上海的英国工厂也是一样；和母国的

① 英国西北部的一州。

一切通讯，是在都市的写字间，在远离了中国人的城里办理。

在男性职员之中，有站在工厂门口的穿制服的全副武装的司衙巡捕；他站岗的小屋里的报警装置，恐怕是全工厂最新式的器械。

织布工场的雇工是女人。年老的女人，年青的女人，怀孕的女人。不错，织布间有孩子，但他们不做工。他们不过是襁褓里的婴儿，睡在卷线机或织布机下面的篮子里；要吃奶的时候，从下面被抱上来。

让婴儿在工厂的工作间过日子，无疑的，对他们是很不卫生的。为了这缘故，女人们被禁止带他们进厂，可是，这种禁令也许实在是为了下列的理由而发的：第一，婴儿自己并不做工；第二，他们妨碍他们母亲的工作。

第二条理由并无根据。工厂里的婴儿并不妨碍工厂工作的进行。相反的，年青的母亲用双倍的注意照料着卷纱棒和梭，因为任何处罚，或者竟被开除，不仅要使她自己饿肚皮，而且也要使她的孩子饿肚皮。

因此，工厂经理用不着操心对婴儿禁令的严格遵守。这种仁慈使他认为特别人道，正象他认为雇用童工是对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一种慷慨行为一样，不这样，他们的家庭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四

上海和武汉的纱厂工人，百分之四十是小女孩，百分之四十是女人，只有百分之二十是男子。实业，常常是很实际的，知道怎样利用宗教的偏见。在中国，得到一个儿子是生

和死的全部意义，因为要是没有留一个男性的后代去祭祀祖先的话，死了还有什么呢？

另一方面，一个女儿，她是不算什么的。在灾区，新生的女孩抛去喂狗。要是有一个女孩能够当做奴隶出卖的话，那么，她毕竟还有一点价值。奴隶买卖盛行着。在香港，在那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种买卖最活跃。而且每当殖民大臣被问到“妹仔”^①贸易的时候，他在下院的回答，大意总是小奴隶被买去只是供家庭驱使的。

买孩子去做娼妓的买卖，到处流行。在傍晚的灯光之下，奇异的小小的人群出现在大城市的某些街道上：一个穿蓝裤的主妇，她的旁边按身材排列着穿绸衫的大小奴隶。当主妇招呼每一个过客，极力赞扬她的货色的时候，后者悍然的站着。孩子们站在左边，她们也安然自若的一任未来的雇主检阅。要是她们中间的一个被选中了，于是这小东西在他客人的前面庄重地走着，通过后院，走上后面的扶梯，走进那爱的寓所去。

有一种是为着实业的需要而购买女孩的。他们收买一批小孩，给他们一个房间睡觉，给她们一碗饭带到工厂去。上工以前，一个苦力推着他的独轮车，车上坐十二个小孩，一边六个，另一边六个，到厂里去。小孩们的工资归他们的主人。

大城市里的苦力多半不卖他们的女孩，因为她们要帮着养家口。苦力在工厂里，在码头上，或者是在黄包车的前面，整天或整夜地工作，每个月可以得到十元至十六元。但

① 丫头，广东话。

是依照上海劳工委员会的统计，夫妇两口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费是十八元，而一个有三个小孩的家庭要二十一元三角。因此，为着要达到这个可怜的标准，不但是老婆要做工，孩子们也要做工。

成人工资的低廉，是儿童劳动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

五

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制造家，有八八九、〇〇〇个锭子，日本人有三三三、〇〇〇个；目前，在上海和武汉，正转动着二、四九九、〇〇〇个中国锭子，一、八二一、〇〇〇个日本锭子，一七八、〇〇〇个英国锭子。

抵制日货运动常常被引到抵制那些只有股东和得红利者是日本人，而用中国棉花，在中国领土，由中国劳工所纺织的货物。

六

四百五十万锭子。孩子们装上空的，取掉满的，不断地凝神看着纱是不是打结了，或是断了。打结了或是断了的时候，他们用小手指头解开和重新接好。英国的儿童机器——佳妙的，正当的机器！——使他们的工作比较容易。

他们中间有的人骄傲地佩着一个黄色臂章，这是值班监工们的徽记。作为监督人，小孩并不缺乏严酷；他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力之中，他们毫不宽容地指控他们的工作同伴，

一部分是由于工作需要，一部分是为要报复那昨天做监工时偷偷地指控过今天的监工的小同伴。

大人们很知道怎样利用小孩们的这种游戏。不只是在工厂里。整个的夜晚，中国男孩子，身着蓝色的制服，站在上海酒吧间和水滨酒店的门前。单单做一个装点的人或看门人，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因此，他们帮助巡捕去虐待黄包车夫。当顾客离开酒吧间的时候，拉着车，忍耐地，连续好几个钟头在等待这个瞬间的一群人性的马，冲到面前来，叫，邀请，恳求——毕竟，这是找一桩生意，赚几个铜板的问题。可怜的车夫，怎么顾得禁止走上人行道的法律？——他怎么顾得身旁拿着短棒的巡捕呢？但是这小小的看门孩子——愉快地抓住这帮助巡捕的机会，用棍子打车夫的头，踢他们的肚皮，掀翻车子，用力扯轮盘，竭力想拆毁它们，一直到——真是堕落的场面——穿着工人衣服的中国成年人，在那穿着猴子短衣的中国小孩子面前屈着膝，摇动两手，开始恳求“好嘞”，恳求饶恕的时候。

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纱厂里，是在那些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们之中。无期徒刑这名词，用在这里比用在刑法上更为正确：新生的孩子躺在织布机的下面，姐姐站在纺织机的旁边，母亲在卷纱棒旁工作，祖母在缝纱包。婴儿呀，依照你生活开始时所依照的法律，那就是你的一生所要经过的路程。

在这里，你的脸颊会苍白，你的眼睛会矇眬，你的四肢会无力；在这个工场里，锭子嗡嗡的叫，织布机轧拉拉响，空中充满了棉絮，绒毛和麻屑。最初一天所教会你的动作，是你直到最后一天的动作，除了那个，你再不会学到什么。

再不会经验到什么。

学校和操场对于你，你这不被允许做孩子的孩子，是无缘的，对于不被允许做同学的你的同学，和不被允许做游伴的你的游伴，都是无缘的。

七

每天，孩子们工作十二个钟头到十四个钟头，中午都不停工。锭子一刻也不停地转动，就是在—群小孩匆匆地跑去，替自己和她们的同伴把那从家里带来的小小的一篮子饭拿来的时候，也不停止转动。人吃着饭，同时留心着弯轴继续地转动，梭子继续地来往和纱线继续地伸展。绒毛和尘芥落在筷子上，黏在饭粒中。

在早晨，在中午，小孩们还没有露出成人们听天由命的表情；她们快乐的挤眉弄眼，工作的进行，在她们看来，象是一种游戏。但是到晚上看看她们罢，到那时，小小的眼睛眯缝着，小小的腿子抖动着。这不是小孩所需要的游戏的时间，却正是他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了。休息？工厂决不是付了工资让大小工资获得者在休息中去消磨他们的任何工作时间的。

到了十五岁的儿童，在上海大纱厂，工资是二十二芬尼^①一天，在丝厂是六芬尼一天（一芬尼是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而一马克约合华币一元）。

^① 德国的小铜币。

八

在上海的丝厂，监工在车间走过，手里拿着棒子，这样，可以立刻纠正任何错误。

女人们沿着墙，坐在铁凳上；她们的对面，站着小孩子，这些小孩常常不到五岁大。

小孩子在开水盆子里将蚕茧弄柔软；他们的小手烫伤了，因为他们没有橡皮手套也没有浸茧的汤瓢。在那充满他们眼里和肺里的热气的云雾中，他们找着丝头，把茧子递给女人们，女人们把六根丝搓成一道，搭在脚踏的缫丝车上。每一个小孩供给两个女人的茧；一个女人同时缫三十支茧，五部缫丝车，每部六支茧。

蒸汽，热气和汗臭，不通空气。拿着棒子的男人在车间巡行，防止工作的任何停顿。

九

小孩们是有限制、没有报酬的，在家里，在他们的父母的工场里工作；但是在这里，没有机器，没有拿着棒子的人监督他们工作的速率。大规模产业的童工的使用，是跟着这种家长的劳动状况而起的。现在，当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已经过去了的时候，这种杀人的方法早该停止了，要不是——自从孙逸仙先生死了以后——革命的工会被人用斧头和手枪变成了一堆尸体的话。

向上面建议么？听罢！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九号的报告

中，上海儿童劳动委员会曾经劝告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十岁以下的儿童到工厂做工。他们还想提议雇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应该限制每班只做十二个小时，并允许两个星期休息一天，而且不让他们在危险的、有碍卫生的或是无保障的机器上去工作。

建议，上帝知道，是决不过分的。但就是这些建议也在上海的外国统治者手里变成了泡影。为了决定这种改革应不应该制成法律而召集的市民特别会议，只有三〇二位纳税者参加，不够开会的法定人数。第二天，英文报纸在纳税者会议没有开成的报道上，十分坦白的附带解释了，大部分的纳税者认为，不出席是阻挠儿童劳动委员会的报告的任何实施的最简单的手段。

在这里，结束这篇关于上海的社会状况的报告。

比利牛斯山的插曲

一 小小的巨人：葡萄牙人

他们也进——毕竟，这是海员之中的一种最普通的习惯——酒吧间喝一瓶白兰地。他们的兵舰也——毕竟，这是海上列强之中的一种最普通的习惯——在上海的外滩之前抛锚。

但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人数比较少，而且他们的身材是这样的矮小，任何一个美国水手都可以把他们挟在臂弯里，要是不管为着什么想和他们角力的话。他们的兵舰是旧式的，而且很小，不到一千七百吨——和它的英美邻居Kent号，或是Houston号，或是法国的Waldeck-Rousseau，或是意大利的Espero比起来，那算什么呢？葡萄牙在名叫上海的这个国际酒吧间，只是一个无声的来客。

在帽徽上和他们的水上家宅，写着阿达马斯托(N.R.P. Adamastor)。谁在笑？是少年时代读了和他一样经历过遥远世界冒险的卡摩因西^①的“琉息亚德”的他在那里笑。在那些日子，在孩童时代，我们是勇敢的水手；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达·伽玛^②，我们在找寻到印度的路。在那些日子，

① 卡摩因西(Camoens)是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大诗人，琉息亚德(Lusiade)是他歌颂海盗的最有名的叙事诗。

② 达·伽玛(Vasco da Gama)是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大航海家。

我们孩子们看见了在非洲的极南端的好望角，——我们为了三角邮票的缘故偶然爱上了——一半是山，一半是巨人的险恶的阿达马斯托。他遣使周围隶属于他的风浪去和一切胆敢涉足他的领土的人们作对。我们，达·伽玛的水手们，在那些日子，和阿达马斯托所遣使的风涛海浪作过可怕的斗争。我们胜利了。

现在，在那里，那只小小的兵舰的船头上，在小小的人们的帽子上，是我们的仇敌的名字。兵舰和水手不过是来拜访上海的。要不然，“阿达马斯托”号总是停泊在澳门的停泊处。这个有着鸦片专卖权的小岛，是葡萄牙人借着征服者^①和信赖上帝的基督教徒的勇敢精神的帮助抵抗了巨人阿达马斯托，后来又镇压了叛乱的客家人，那斜湾的“海盗”，而取得的权力与光辉的残余。英国夺去了葡萄牙人的一切。比起阿达马斯托和引号里面的海盗来，富裕的英国是更危险的敌人；基督教和征服者的精神合在一起，也抵不过金钱的力量。

大概的说，现在在上海的葡萄牙人是和英国人一样的多，但是英国人管理着银行和巨大的商号；葡萄牙人仅仅管理着帐目，特别是欠帐。他们是讨厌的索债人。为了这缘故，虽然他们有着虚夸的贵族名字，一个礼拜去忏悔一次，而且在他们的Recreo俱乐部至少是象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上海俱乐部”一样的唯我独尊，可是人们还是不高兴看见他们。

① 原文为Conquistador，指十六世纪侵占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书中借用此名。

他们的女儿是惠罗公司的女店员，或者是旅馆和酒店的招待员。因为他们相互间的联系，他们可以很快找到没有付现款，照例给小票据，而又忘记来清帐的任何客人的住址。

熟悉葡萄牙少妇的这种职业，可以免掉你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譬如，你也许会和一个新朋友坐在酒店里，他很愉快，很有礼貌，而且境况显然很好，他在告诉你的实业计划是极可靠的，而且显然适合于你……于是一个姑娘在柜台上出现了，虽然她非常漂亮，你的朋友却突然转到了一边。要是你没有看过我的书的话，你会认为这动作毫无意义，或者至多认为这是出于一时情绪的事，可是，现在你会知道这位样子好象可敬的绅士的朋友，为什么要逃避这位葡萄牙少妇的视线，而且你也会知道他的很好的境况和他的实业计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战以后，除了债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的葡萄牙人，企图和她信用的德国人缔结一种同盟。但是一切德葡的联合商号，不久就成为连累各种营业的一个耻辱事件，都散了伙。这个耻辱事件终于在中国和德国引起了法律的处置和裁判；虽然在这个案件中，上海的葡萄牙人还是选了一位特别肥大的上海的德国人和汉堡的一个商号做他的股东。

在这个国家，进口的营业是借着银行的垫付进行的。欧洲的出口商人的银行把发票寄到上海一个银行来要求兑现，而上海的银行就通知顾客：“由某某轮船运寄尊处价值若干，某某号数之某某货物之单据（提单，发票，保险单等）已寄至敝行进口货物票据部。”收到此信以后，买主就请银行垫付货价，银行自己把垫款付给国外的出口商人。但他不会有危险，因为他把货物保存在他的堆栈里，一直到输入商

人把它们卖掉了，而且偿还了垫款的时候。要是没有买客的话，那么货物就要被拍卖。

这种种拍卖常常会收入垫款的全数——要是它们报称的货物是正确的话。但这正是那个德葡联合进口营业的案件所没有办到的一点：汉堡的货物委托者和上海的货物受托者勾结着，报称箱里的货物是人造丝，后来却发现里面只有廉价的玻璃器、痰盂、搪瓷的杯子。这桩营业的股东被监禁了。经历了这一番大实业界的旅行以后，葡萄牙人又回到了管帐和收帐的事业上。

严格的说，他们根本不是葡萄牙人，他们离开葡萄牙是在十三世纪。要是他们现在回到那里去的话，将会很难认识它了。他们的家乡早就不是比利牛斯半岛，他们的家乡是澳门半岛。澳门以前是一个岛屿，但现在由一条防波堤和陆地相连了。澳门，这太平洋的蒙特卡洛，这岛上洋溢着赌博和鸦片。他们不是葡萄牙人，他们是澳门人。

澳门人 (Macanese) 是澳门 (Macao) 和中国人 (Chinese) 的一个拚合字，这个字是非常恰当的。很久以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的姑娘结了婚，生着优秀的女儿（没有一个欧亚杂种姑娘高兴被称为“杂种”【Half-cast】的，在中国，她们都自称为葡萄牙人）。澳门人的女儿只嫁给葡萄牙人，不会嫁给母亲的同胞中国人。否则，这会完全背驰前葡萄牙人的自尊，他们的祖先的自尊，他们的血统的自尊，和他们的信仰的自尊。

银行里的小小的，显然有着中国人的面貌的绅士在对我说，他愿意料理我的汇款的事。第二天我会来请他吗？为了这目的，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

Jesus-Maria Marques De Silva-Pereira

Lisbon Shanghai

我读了上面的Lisbon和Shanghai（上海）这两个神圣的极其尊贵的城市的名字，于是恭恭敬敬的鞠了鞠躬，他带着一种沉静的庄严答谢着，就象他亲自战胜了巨人阿达马斯托一样。

二 回力球

去了解巴斯克人和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游艺，是饶有趣味的。他们是伊斯托拉里亚^①人的从兄弟，是欧洲原有居民的仅有的残存者；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爬树，还在用枞树球果互相投掷的时候，巴斯克人已经住在比亚利茨^②了。一个古老的民族，有优美的身材，有好看的微黑的容貌和高贵的举动。

他们的民族的游艺叫做回力球（Hai Alai）；高而且快的，他们投掷着回力球；高而且快的，他们接了它，于是重新又把它抛掷，高而且快。球员们有着这样的名字：铁白休·伊利果扬，贾新斯·埃多查，李奥卡多·奥克提，拉法尔·阿拉西比亚，等等。

在家乡，在比利牛斯的时候，他们用球向石头墙上猛掷，球场的四面站着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他们都是老手，他们都是球员，他们都懂回力球，而且能够打。

但是在这里，在球员和传统之间隔离着千万里，隔离着

① 在西班牙西北角。

② 在法国西南部。

巴塞罗那和上海之间的整个的距离。看台上挤满了中国人，鼓励地叫喊着，唤着伊利果扬，埃多查，奥克提，阿拉西比亚的名字——R 这字母对于中国人算什么呢？回力球对于他们算什么呢？巧妙的一击对于他们算什么呢？

晚上的竞赛在一个三棱形的场里举行。混凝土的墙壁有六十米长，十米宽，十米高；只有靠近观客的一边是一排宽阔的铁丝网，有六十米长，十米高。欧洲人在槛里游戏着，在槛前坐着紧张兴奋的亚洲人。球员在他们的右手手腕上系着球拍——一个好象玉蜀黍的穗轴一样的黄色的篮子。这是一只手的扩大物，正如拳击手套是拳头的扩大，网球拍是手掌的扩大，或圆头钝剑是手臂的延长一样。

球员把球从他的篮子里猛掷在 (Front one) 正墙上，掷在那四五十码以外的横墙上，这样，球就反跳四五十码，甚至六十码，跳到对角的墙上，于是又弹跳回来。回力球并不比网球大，却是用实心的橡皮制成，用皮子包着的，重量有一二五克。球员们轮流把球接进他们球拍里，立即猛力地掷回到墙上。这种接球和掷球，需要怎样的眼明手快，需要怎样的腕力——这在比斯开湾，是可以推断的。

在比斯开湾，人人都懂得这种玩艺，却并不人人用它来赌博。在黄海，不是人人都懂得这种玩艺，而人人用它来赌博。赌金计算人的手里握满了钱，收入赌注，付出赌胜金。

孙佐文赌着马利可·伊查苏的独赢和位置^①。王海霆在密哥尔·埃斯卡查加身上以八比一赌赢了。李和琪第五次在

① 回力球普通六个人打，先得五分者叫做独赢 (Win) 次之者叫做位置 (Place) 赌家或赌球员的独赢，或赌其位置。

李奥卡多·奥克提身上赌着两块钱，现在李和琪的钱通通输光了，于是他离开法租界回到中国地界的家里去。要是他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到一家当铺去当十块钱的话，那么，第二天晚上，李和琪又会来，在李奥卡多·奥克提身上每次两元的赌五次回力球。

在中国地界，你不能够拿你的钱赌在伊布林人的击球后裔的身上，也不能赌在追逐一只电兔的许多猎狗身上；在中国地界没有赛马，没有Baccarat^①，没有轮盘赌。在中国地界，你可以搓“麻将”去赌你的运气；但是这种赌博充其量不过是欧洲赌博的可怜的模仿，而且不让你这么巧妙，这么圆满的输掉你的钱。

在中国地界，鸦片烟是被禁止的。在法租界你可以数到三百个烟窟，而赌场至少有公共租界的那么多。为社会一切阶级而设的赌场，供给资本和站在幕后的，是外国人。作为窝家、龟奴、暗通赛马消息者、麻醉剂私贩和赌博引诱者，他们受着他们种族和社会的支配。按照他们的正义和道德的观念，这种犯罪，只要他们是犯在中国，是不算犯罪的。这是殖民地贸易。这只是一个人赚钱多少的问题。

尸体的气味郁积在闸北和吴淞，被掷了炸弹或是被放了火的住宅、大学、图书馆、印刷所都在冒烟，受伤的人在上海的许多医院里呻吟，日本军官鞭打着马路上没有恭恭敬敬向他们让路的任何中国人，新的战壕正在开掘——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外国人用巨大的常常更换的广告邀请你去享受逸园的澳洲跑狗，和巴斯克的球戏的刺激。

① 欧洲流行的一种纸牌赌博。

被革命冲洗出来的污泥

“Poluskie girls?”

晚上，当你出来的时候，赶上前来的中国少年这样。他是干什么的？Poluski girls？他知道你不懂——那么是刚到上海不久。他用两只手做着手势：女人。他本来是想说：

“Porustki girls”^① 这句话，不是正确的英语，也不是正确的俄文，意思指“白俄姑娘”。

走开，我的孩子！要找“Porustki girls”，谁还需要指导者，牵线人，和招引者？她们在报上登着广告，她们在广告招贴板上贴着广告，她们不会忽略每一个公开露面的处所。“哈尔滨按摩浴室”，“娱乐室；土耳其浴室与俄国按摩”，“酒吧间”，“酒店”——电气招牌发出蓝宝石色的光辉。差不多可以说，环龙路的每家人家都挂着一块“按摩室”的招牌；只有一处是例外，那就是“耶稣再来教派”的祈祷室。在那里可以找到俄国的“按摩女”，她们希望碰到一个美国人。找到一个美国商人——是每一个上海的俄国女人的梦，当她为着晚上很清醒，在白天酣睡的时候。

上海的俄文报纸广告分为三类：

医药：“花柳病：某某医师（皇家军队的外科医官）医治一切病症……”——“前军人医院之外科医生医治妇女传

^① 为洋泾浜英语，意为“白俄姑娘”。

染病十天包好”

召租：“繁华区域之店铺，可作晚会或同样目的之用。”——“开设多年之按摩室，高尚顾客专有绅士间。”——“备有家具之住室，独身夫人适用，日夜均无惊扰。”

第三项——Trud：“Trud”的意思是工作，这句话，在苏联是伴着热情使用的，是一句实践的话。但是在这里，在俄罗斯国境之外的俄罗斯，“Trud”的意思是“新开酒店征求舞女：须身材窈窕，备有晚装者……”，“酒店女侍：二十二岁，白肤，绿眼，金发……”

Porusski girls是白俄或苏联的亡命客的妻女，这些人都佯称他们的逃亡并没有政治原因，而公开承认他们有走私、受贿、行贿或投机的嫌疑——自然是不公平的——“曾被通缉”。这些女人，有许多是从哈尔滨和奉天来的，其他是来自西伯利亚各城市。

一个俄国照相馆的陈列窗里：有穿制服和平民衣服的人们的肖像——领袖们的肖像，有的还佩着圣乔治十字勋章。“那是……维支博士……会的会长”，和我们在一道的上海人说，“他有三个女儿。”或者是：“你要不要认识伯爵夫人……洛娃？真是一位漂亮人物！！你要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吗？”够特别的是，上海的外国“上流社会”，虽然鼓励这些亡命者去做反布尔什维克的先锋，却从来不和白俄女人来往，就是她堂堂正正的结了婚也是一样。在他们的政治保护者的眼里，俄国人，从道德上讲，是该置诸法律保护之外的。自然，这说法，与其说是反对他们，不如说是为着他们。但是现在？没有什么人为他们说话，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了。

只有非常少数的“白俄姑娘”被雇为裸体模特儿或咖啡店和茶馆的女侍；所有其余的（和前者的一部分），不论结了婚的，被雇用的，或自由的，都从事于夜生活的营业。

夜生活的营业有种种等级。在每个跳舞场，每个姑娘都立即告诉每个舞客，她在那里不会很久了：下个月起就会到“Casanova”或“Taverne”去，或者，至少会到“De l'monte”去。很可能真会走上她所渴望的这些跳舞场；但是不可避免的，她一定要经过圣文生特医院花柳专科的途径。只有那些为商店老板们独占，不许店员们进去的夜总会，才有真正漂亮的“白俄姑娘”。夜总会中最华美的，要算“Taverne”，在那陈设着软椅子和沙发的客厅里，商店老板感觉到在家里也没有的那种充分的舒适；而俄国“舞女”，在这里，象是坐在一个府邸的沙龙里面一样，她悄悄抚弄着她的绅士，象是从隔壁府邸过来的朋友一样。

自然，这和她要在每次舞完以后，接受舞客从售票处买来的一张舞票的事，是很不相称的。伴舞三次，收价一元，其中两角钱归舞女，此外，她的顾客每喝两块钱饮料，她可以分到三角钱。要是他开香槟，她可以分到一块钱。但是如果在这种份额之外，她不能从她的香槟顾客身上得到更多一些，她一定是非常笨拙。

夏天，当热浪抑郁的闷热的笼罩着上海，太太们都在海水浴场行日光浴的时候，Porusski girls的收入有了增加的转机。战争也不是坏事：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军官们，都把他们的战地特别饷消耗在夜生活中。

自然，在上等夜总会中，一个酒店女侍的开销也是很大的。你如果要象一个真正贵妇模样的少妇，就一定要请理发

师理发，要有两套晚装和定期的体格检查。还有什么留作家用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酒店女侍、舞女和按摩女的丈夫和父亲，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寻觅少许外快。为了这个，他们替法国巡捕做暗探，破坏罢工，叫他们的妻女去探试商人老板们，看有没有机会找到职业，或者设法找一件小小的佣金——也许是卖皮货，或女孩，或鱼子酱的佣金。

因为太平洋沿岸没有大西洋沿岸防范严密，常常从上海航行到罗斯·安极立斯州的酒类私贩，靠这些俄国侨民来供给“苏格兰”威士忌，“法兰西”白兰地，和“巴威利”啤酒。

约莫有一千白卫军被编成义勇团，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近卫队，他们的月薪是一百元。在跑马厅会操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英美日商业领袖，同时也是他们的军事领袖和他们的太太们的顾客面前列队走过。这种俄国部队，勇武的，带着军人的谨严，在外国人的面前列队走过，齐声嚷着：“Doloi Bolshhevikov”——“打倒布尔什维克”。

虽然依照一九二四年的“北京条约”，中东铁路雇用的一半哈尔滨俄人，决定归苏联，另外一半决定归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反对中国人。的确，他们之中差不多没有人有中国或苏联的护照，仅仅有一种登记的卡片，证明他们曾经要求入籍的事实。

虽然在他们和中国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对立这一点上，也许一致，但他们内部还是极不统一的。君主政治派矢忠于“沙皇”西利，认为他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正当统治者，其他君政主义者却认为任何沙皇都行，单单除了上面那位大公西

利，因为他是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将他自己和他的海军部队任从布尔什维克处置，却又被他们拒绝了。

共和主义者也都互相仇视。第一是法西斯蒂，第二是民主主义者，第三是社会革命者，第四是孟什维克。第一种人深信教会，第二种人是互助团的团员，第三是反塞姆族者，第四是犹太人。第一种人要求哥萨克安德曼·谢米洛夫做军事领袖，第二种人拥戴前中东铁路总理贺华兹将军，第三种人拥戴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蒂加达，第四，第五，第六，要求笛脱里奚、伊萨可夫或格雷波夫几位将军。

上海有一万白俄。在全中国，连满洲在内，有七万二千。他们组织在几百个团体之内，他们中间发生着死战。就是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他们也都互相攻讦对方的腐败。我们面前，有一张从“上海时报”剪来的报纸，上面有一个代表二十三个团体的委员会反对为俄侨收款的另一委员会。签字团体的名字是奇奇怪怪的：

皇家俄罗斯俱乐部

伯爵社

前叶哥尔联队同人会

前乌拉尔联队同人会

前满洲支队同人会

前安龙可夫将军联队同人会

十字勋章获得者联合会

国家宗教委员会

俄罗斯正教会

俄罗斯国家会社“信仰，沙皇和人民”。

等等。

这些侨民分成许多阶级和等级。反动的意识和对于那些剥夺了他们特权的人们的仇恨，无法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多年以来的共同愿望——就是苏维埃制度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缘故，对于他们，趁早站在他的反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好处的这种共同愿望，也一样不能使他们联合。他们一个看不起一个：官员看不起平民，贵族看不起百姓，反塞姆族者看不起犹太人，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看不起没有勋章的人，圣教中人看不起不信教者，地位稍许好一点的人看不起地位稍许差一点的人。他们互相轻视，每一个人都竭力想用大话和夸耀凌驾另外的人，而他们的太太们却在同一夜总会里干着同样的营生。

“你高兴这里吗？”我们问一个舞女。“生意怎样？”

“啊，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守到收市，要一位绅士陪伴我们那么久，是不大会有的。”

“顾客们常常同你们约定第二天再来吗？”

“啊上帝，上海的竞争太多了。……你给我买一瓶鸡尾酒吗，先生？——喂，你，汉子，一瓶鸡尾酒！”

“先生”是指我们。“汉子”，是指俄国侍者。七年以前，在莫斯科，我们看了一出戏，戏里的主人公是宣传委员约瑟夫。有一幕是在酒店里。约瑟夫用革命的方式呼唤侍者——“你，汉子。”

观众都嗤嗤的笑。侍者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被当做同伴招呼：侍者被人轻蔑的叫做“汉子”，而我们是“先生”；充当舞女是“Trud”。

有十五个俄国姑娘在一个叫做“Tumble inn”（通伯尔旅店）的房子里“工作”。引诱我们到那里去的，是这个

名字。Tumble是伊利莎白时代，海战以来出现在一支歌谣里的一个古英文动词。那次海战中，有一艘满满的藏着慢慢在燃烧的麻屑油和焦油，外表却象无害的挂着风帆的兵舰，让风浪吹送到敌人的舰队中去，为的是要烧毁他们的船只，这水手歌谣的歌者就是用这样一只火船来比拟他的鬃发的情人，在他反复的查察(Tumble)她以前，她显得这样可爱，这样贞淑，几天以后，才知道她是一只火船。

她有着黑黑的，流盼的眼眸，
她的头发卷曲的垂下，
一个缥致的女郎，一个贞洁的女郎
却生成轻浮的模样
我轻抚她
我摩抚她
我爱抚她
我tumble她
使我深为惊异，
她不过是一只火船
扮做了美女。

如果我们转载了“Tumble inn”的营业卡片，想来是不会有多大的关系的。“Tumble inn”并不同意使每一个英国水手看了“Tumble”这个字，就会惊心动魄于那支歌曲的寓意。不，营业卡片上说，我的姑娘们并不和那个姑娘一样，象一只火船去烧毁敌人的兵舰一样去烧毁她的情人的。

Tumble inn

静安寺路一八二弄十四号

(在水手总会对角)

有全市最可爱最洁净的姑娘

(上海医师 R·霍尔柏一周检验一次)

到处都有俄国女人，大街上，小巷里。朱葆三那条小小的马路充满了霓虹招牌，水手，音乐，拳斗，黄包车夫，喧闹声，卖花女，乞儿。二十家舞场的舞客都是水手：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水手；宽阔的裤管扑扑飘动，这种宽裤的穿着者都沉醉在酒精里，站立不稳。俄国姑娘们坐成一个圆圈，等候他们挑选去伴舞。在“Victoria (维多利亚)”舞场，她们扮成舞蹈者，足球选手，山泽女神，游泳女郎……扮演狂欢节的故事。在“Stenka Rasin”是大盗的故事，在“Merle blanc”是蒙特码特故事，在“Tkatshenko”是伏尔加的故事，在“Tkhornieglasa”是吉普赛的故事。故事和服装都引起肉感。如果这还没有效力，姑娘们就玩弄她们的吊袜带，以此来引动那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少年的兴趣。

“白俄姑娘”中比较老的一批——也许，她们的亡命是始于一九〇五年吧——都棲息在百老汇路的许多酒馆里。如果店主是德国人，他的店子挂着像“Grill Room”（炙食房）一样的无损大雅的招牌的话，那么，也许要使他家乡感到他在东亚变成一个富裕的酒家了。俄国店主挂着一切文字的招牌，也有中文；可以过苏州河，也不拒绝黄人顾客。

过苏州河，跳舞和女人都比较便宜；饮料不再是鸡尾酒，只有啤酒。看看那些女人——或者是最好不看她们罢：她

们要抓住人的每一瞥，好象是抓住一条生命线一样。但是——还是看看她们！和她们谈一谈话罢！言语和音调仍和她们远方的姐妹们一样；在她们生硬的探戈舞步之下，藏着她们祖国的韵律；在脂粉和舞装之下，隐匿着某种使人想起她们的过去的前途的东西。要是她们留在家乡，她们也可以有些造就的。就是现在，要是她们回国的话，她们也还能够有些造就吗？“她们有些造就？”太迟了……过去了的前途。

将来的前途就在眼前了；要是你不在她们之中过活的话，你可以在两三个晚上遍历各种阶级。舞场和酒吧间的系列很快就完了，于是另外一种工场，摆在俄国姑娘前进的路上——一种非常特别的房子，但是也和酒吧间和跳舞场一样的分为许多等级。公共租界的头等书寓，价钱多至二十元。在法租界，价钱比较便宜点。在福煦路和霞飞路会合处——的确，这两位法国元帅^①是高尚的被尊崇着——在比较华丽的建筑物附近，简直充满了娼寮。譬如，在“比较高等”的咖啡馆，顾客醉时，就会有一个舞女来小声告诉他，请他到对角马路的“Allaverdi”去等她。在马路对角的“Allav_erdi”，他被娼妇接待了，睡在她的怀里。

黄昏，虹口河岸的码头附近，暗黑，而且发着奇臭，曲折的小路通到码头上或是水边。大琵琶桶使得狭窄的路更加窄狭了，年老的，样子很难看的，麻脸的“俄国姑娘”拦住过路的每一个人（苦力在内）她们揭起自己的裙边，嘎声的说：“Come to myhouse（上我家里去）……”最后一个的“h”，她们读成喉音，“Khouse”。她们的“Khouse”

^① 指福煦和霞飞。

是一种木板小屋。从四方八面，她们向我们驶来，这些火船……这些残破的火船。

我们拿几支俄国香烟送给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很高兴，高兴能够用俄语说话。她是从苏联阿穆尔区的一个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蓝泡）来的。“我们逃出来，是在八年以前。那时正是冬天。我们，我和我的丈夫，走过冰冻的阿穆尔。他带了一千块钱。我们怕被捉住，害怕极了。”“但是”，她得意的嘎声的说：“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影子戏

（当然，这是在北平；在上海，在这殖民地的首府，影子戏是不存在的。）

请来演戏的戏子，在院子里搭起他们那有长度宽度，却没有深度的舞台，在等待日落。到日落天黑以后，戏就可以开始了。

坐在淡白的月亮下的人凝望着，被迷惑了。中国观众包括不去巡逻却来看戏的区里所有的警察，这一家的仆役和这一家的主人和主妇。他们为了这样那样的对话而鼓掌，为了这样那样的言语嗤笑着。而一无所知的欧洲人望着，奇异着，为什么西洋没有和这幻灯戏可以相比的东西，但也不想去模仿它。

已经很久远了……唔，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影子戏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关于这一点，只有象发明物本身一样充满了孩子气的幻想的许多古老传说。最早的传说有一位银匠陈羲，最初在吴帝（纪元前一〇〇一——九四七年）的宫里演出了这种幻灯戏。后宫的妃嫔被主角优美的姿貌和骑士般的风采迷住了，一次又一次地叫重复演出，一直到吴帝嫉妒之极，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愤怒地吩咐把主角斩首。于是陈羲把皇帝引到台后，让他看见他的情敌不是人，不过是着色的驴皮的制成的傀儡。皇帝看见这个，惊异而安心了。但圣旨是不能收回的。因此，几分钟之后，主角被拖出了戏

台；依照皇帝的旨意，刽子手砍了他的头。看戏的妃嫔们为这位优美的骑士的可怕结局，歇斯底里地哭泣了几天几夜。

按照另外一个传说，一位名叫齐少翁的道士发明的这种着色的影子戏。当汉武帝（纪元前一四〇——八七年）为了他宠爱的妃子^①的死几乎发疯，而且变得厌世了的时候，齐少翁声言他可以使亡者显灵。的确，他把那可爱的夫人引到了皇帝面前的银幕上，当皇帝重新看见她，听到她说话的时候高兴到了极点。每天晚上武帝总要叫死去的爱人出现在他面前，说着许多逝去的夜晚的情话。（对于主上的兴致和幻想感到高兴的宫廷侍者，供给这位影子戏的扮演者以脚本材料。）

有一个月夜，齐少翁把他的女伶的演技提到了热烈的高度，武帝心头充满重新拥抱他宠爱的人的不能止息的渴望，冲到了这幻术的银幕后面——这是星相家严格禁止他的——他发现了一切都是虚空的幻术，愤怒地把他宠姬的傀儡撕成了碎片，而一身兼制作人、背景画家、女伶和技师的齐少翁，则屈辱的死在刽子手的手下，去偿报他的四重勤劳。

“……因为他尊重通俗的趣味，”在议论这历史的传说时，侨居中国的抒情诗人这样说。

“……因为他太放纵了他的艺术家的资质，”不在德国继续做穷酸的讲师，却在中国做有利可图的伪造古董生意的艺术史家，这样冷冷地插嘴。

但是我们——我们是一点也没有想要参与这种哲学论争

^① 李氏夫人。

的意思：我们要讲述那现在在我们眼前放映的戏剧起源的第三个古老传说。

这还是汉代的事：都城被匈奴王子莫芬围困了，围城者带来了他的有野心，好征战，而且嫉妒成性的王妃。被围的城里饥饿已极，箭和火箭都射尽了，旦夕之间都城就要陷落，这就是说，被围困的人，特别是帝后，要遭惨杀了。

后来，中国的皇后——她深知她的女敌的性格——想到在那正对匈奴王子营帐的城墙上放演影子戏。她单单把少女的形象——那种逗人爱恋，引人迷惑的少女的形象——放映在幕布上，企图去引起那些鲁莽战士的情慾。

她一点都没有误算了效果：匈奴的王妃看着这难于抵敌的女子卖弄风情……看着她身边的丈夫……知道他若过度的沉溺在这种战利品里，会让他合法的王妃进地狱去……于是，立刻吩咐解围……她带着军队开走了。她的丈夫怀着那被打断了的梦幻，一个人蹒跚地走在后阵。

你一旦亲眼看见中国影子戏时，会认为这三个古老的传说是不无根据的。一块块透明的兽皮，显露了难以相信的表现力；每一个肢体，都好象有自己的筋肉和关节；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唱的每一句歌词，都是这有机的成为整个躯体动作的一部分。的确，并不要象疯狂地嫉妒的吴帝一样，不要象疯狂地真挚的武帝一样，也并不要象疯狂地嫉妒的匈奴王妃一样，你也会陷入在你面前活动着的人物的幻觉里。

要是有什么使我们没有象吴帝、武帝和匈奴王妃一样的被欺的话，那不是演戏者欠缺，却正是他们值得称誉的地方。我们的意思是这样：这种兽皮制成的傀儡，能做的事情不比人能做的少；相反的，它们能做的事情比人要多得多，

而这就是在观众心里，对于她们的真正存在引起怀疑的唯一原因。譬如，我们看见一个人变成了一条龙。不错，在实际生活中，这也许可能发生，但是告诉我，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刚刚变成了龙的人，在喷火，腾空，和吞食所有男女的功夫上，会象他在影子戏舞台上的形象一样，立刻成为那样一个完全的熟手吗？

要是影子戏的形象避免了这种超自然的手法，要是它作为纯粹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要指摘它有任何可疑不象之处，或是有丝毫不自然之处，是不可能的。十分自然的，两个尼姑一同走上一座小山；十分自然的，“山中老人”的出色的侍仆，在两位来客面前低低地鞠躬；十分自然的，他替她们打开了庙门；十分自然的，是虔诚的隐士和两位尼姑之间的谈话。而它们其实并不是尼姑，而是化为了人身，而且为了露出她们的本色，走近“老人”时又舍弃了人身的怨鬼。

不仅是地上的凡人和天上的精灵都很逼真，看着这背景罢！真正由戏子演出的中国舞台上没有这种背景——在那里，森林和城市是一样的，监牢和金銮殿是一样的，观众只能由戏子的言语和手势告诉他，台上的背景是被人设想出来的。

这里就不同了。在开始的时候，在这种用剪刀剪成的人物出场以前，他们居住的世界已经创造好了。右边是一所房子，下面，一条泛着青色微波的河流平静地流过，左边，一座褐色的石山耸立空中，山顶是隐士黑红红色的小屋子，这屋子我们在第二幕又会看到，样子完全一样，且可以说是象实物一样大小。

下垂的衣袖，颤动的雉鸡毛，王子转动的佩刀，头发上面的花朵，衣服上面的彩饰，满族公主穿的靴子，飘动的须髯，官员的嵌了宝石的腰带，和他的宽大的裤子，田野里的树，树上的鸟，石头缝里的蛇——造物者本身是不能把它们造得更好了。

不仅是地面上充满了生物，天空也密密的，蔽满了飞虫和其他有寓意的飞鸟。这一切好象和谐的星座一样运行。而三个古老传说中，帝王们以为傀儡是真人，或是超自然的东西的误解，似乎比这个实际的事实，仅仅由一个人，操纵这整个人烟稠密的行星仪活动的事实，有更多的理由。

这是我们在表演战争中发现的。军队挥舞着刀剑相互冲击，标枪在空中呼呼的响动，火焰向天上喷射，野蛮人的首领倒在地上，躯体被砍成两段，他的马也是一样——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象从前的武帝一样，我们从座位上跳起，跑到台后，我们想知道是由什么样的一种巧妙的机械操纵这一切的。

但我们发现仅仅一个人，一个衣着很坏的中国人站在一盏油灯的后面。他每一只手拿着一根用三根铁丝连接在正在上演的人物身上的绳子。人物约莫有六七吋高，是用那加工得透明的驴皮做成的，剪切了，穿了孔，两面都精致的着了色，涂了漆。上臂，前臂，大腿，外胫，臀部，头——都钉连在一起，却又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以任何方式独立活动的分离的皮片。

三根铁丝连接在人物的颈和两手上。有些人物，譬如那位折裂了的将帅，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制造的。有些，譬如动物，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系在铁丝上面的。

影子戏的技师以不可思议的灵巧，有时一上一下地扯这一根铁丝，有时扯另一根竹棒，有时扯着两根，就这样，他使银幕上的人和一切生物都有了鲜活的生气。如果一个人物要转身，他简单的用手把他扭转过来，手抬在灯光的上面，这样就不致于让观众看见。

四五个人物的——甚至于军队的——同时的动作，只是出于技师的快捷。而对于铁丝的操纵，还不是艺人的全部工作，他还要代替戏班的每一个演员说话，代替他所献映的所有的人物唱戏。只有在群众的场面，那世代相传记住了戏文的，坐在一边的三位乐师，才帮他呐喊。当我们知道了扮戏，和使好几百人物登场下场的都只是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乐队在比较上，是很大了。但是这三个人也有很多要做的事：胡琴的清越的音调，月琴的嘎声的弹奏，和铜锣的铿锵敲打，配合着戏的动作，就是在舞台监督的两手牵动着许多新人物的时候，也不会有晦涩不明的地方。

那天晚上的第二个戏里，一座竹林烧燃起来。火势很大——也许太大了，用做投影的那张纸做的银幕（我们说它是银幕，是受了电影的影响），着了火。但戏剧没有间断，演唱没有停止，这傀儡戏的技师立即用一块纸糊好了那个洞。

他名叫白其乔。在他的幻灯戏演了武士剧和一个赛会的滑稽剧，终于结束了那天晚上的演唱以后，我们和他谈了话。乐队收拾了乐器，拆除了舞台。白其乔把他的每一个皮制的男女演员放进分开的封筒里，每一个封筒又放进一口大箱子里各自的架子上，箱子整顿得好象一个便于携带的食橱一样。他是在微弱的月光下面做这工作的。

白其乔继承着他先人的行业，自古以来，他的家族就靠

这“映戏”过活。他自己的戏是从他父亲手里学会的，戏文从来不写下来，差不多所有映戏班的演唱目录都是同一的脚本，同一的人物和同一的对白。

这样的映戏班还很多吗？几年以前北平有一百二十个以上，在热闹的市街有他们正式的戏场。现在白其乔只剩有两个竞争者，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公共场所可以去演唱了。这种戏仅仅由私人请去在家里演唱。

白其乔说，他死了以后这戏班就要完结了，因为他的儿子是一家国际饭店的侍役，没有学戏。其他的映戏班也都是这样。

两百个左右的戏班只剩下了三个，是怎么弄的？美国的游历者和古董商人，把作为幻灯戏的演员的傀儡人物大批收买了去。演傀儡戏的戏子突然看见大堆的银洋是够高兴的……现在他们做了说书人，坐在街头巷尾，没有音乐，没有人物的，讲述那些旧戏。千百年以前，公共场所的说书人走到一个戏幕的后面，舞动许多傀儡的侧影，来发展他们的营业，现在却正相反。

这时，白其乔收藏好了他最后的优伶，关好了箱子。他和他的乐师们挑起它，于是带着这种行将消失的幻灯戏，他们走了。

在这整个晚上，我们始终没有想到，这种诙谐的笑剧的衰亡原因，外国殖民者的金钱和俗物根性，就是在这影子戏上也投下了它们的阴影，他们连中国的影子也都要收买去，那美丽的，着色的，灵活影子。

军火贸易

“不要和我谈论国联和政治，和国际公法那一套罢——你是不能够用这些来欺骗我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些胡说！”真的吗？真德先生。

“老实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实际上，世界分成了许多军火工厂的利益范围。你只要看看地图：那里属于西莱德—克留佐，那里属于克罢布—埃森——我是说伯弗尔斯—瑞登——那里属于都潘·尼茅斯，那里属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

而上海呢，真德先生？照你的地图，上海属于哪里？

“上海是一个粪堆。假如这里是属于一个军火工厂，而不是属于一百个的，那它就不会是一个粪堆了。”

照你的意思，它应该属于哪一家工厂，真德先生？

“唔，自然——自然应该属于我服务的那一家公司。决谈不到其他任何公司。”

真德先生替一个军火组合服务，是可惊讶的事吗？在上海，每一个出口商人和进口商人都和军火贸易有关系，或者——我们不想夸张——都很愿意和军火贸易发生关系。军火买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决定性的实业，虽然，搜遍关于中国的所有著述，你将找不到关于它的一个字。除掉有关系的人私自聚会，或是和他们认为可以供给消息的人相会时以外，谈起它，正和记述它一样的少。

那些装做久居者，装做“居留中国的老资格”的人们，感叹着已经过去了的时世。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旁观者，他们表示了不满：“你知道，在从前，出口商人总是亲自运送他的贩卖品，把它交割。自然他可以向检查员、海关职员和其他当局办理和运货人员所办理的非常不同的交涉，譬如，你记得老贺非德吗？在日俄战争当中，他冲破了一切封锁。有一次，他们截取了他们的财物，他把这件事一直闹到海牙的仲裁法庭。他胜诉了。但是现在呢？运货的人们偷运货物时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有些人继续地诉说，就象在这些日子还做得不够一样，其实是做得十分够了；他们继续地诉说，就象海关早改变了，但其实海关并没有改变。

“是的，”从前——从前，定货都先付款，于是人使船在约定的地点遭难，船便被买主的敌人“劫掠”。敌人得到了军火，也付出代价——正和事先决定的价钱一样。现在，中国人要求都保险保运；拦截者完全失掉了作用——“在这里一切是该被整顿的时候了”。

真德先生说外国的煽动家把军火供给广东人。“他们那样干，只是为了加强革命，信不信由你。在这交易上，他们不许任何人赚钱，他们自己也不赚。谁会听到过这样的事，把军火出脱，什么也不赚……？”

不要怕，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事。

如前所述，在上海市场，很久以来，军火就成为决定的易卖的货物。以前葡萄牙人到这里来，实际上是来卖银子的；但中国人宁可要弹药，因为有了弹药，就常常可以不花代价得到银子。一尊好的大炮，虔诚的葡萄牙天主教徒，除

了相当数量的茶、丝和瓷器以外，还要求至少有一千二百个异教徒来接受洗礼。在东京九段坂的“游就馆”，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基督教的大炮，炮上有十字架，神圣的拉丁文铭刻着年数：“造于耶稣纪元一五五〇年”——关于为了报答这些大炮而入基督教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任何博物馆都没有留下形迹。但是，几百年来，受洗总是偿付军火代价的有效手段。在太平天国事变中，为了报答供给的一批枪炮，林阿福将军和三千人一起加入天主教，另外两位革命军领袖李则吾和陈阿霖倡导基督教信仰，为了这个，传教师们供给他们来福枪。自然，到后来，为了异教徒的满清皇朝的利益，这些新基督教徒被欧洲人出卖了，被一队英美的囚犯（“常胜军”）打败了。

主张中国需要外国统治的人们指着上海说：“把泥沼一样的黄浦滩变成了堂皇的大都会的，是我们呀，中国人的劣等，可以由他们不能以感谢心情认识这个事实，得到证明。

就好象轮船和铁路，没有外国人的独霸，不会传到中国来一样！就好象单单依靠中国，实业是不会发展的一样！就好象帝国主义单单不让中国市场沾沐它的恩惠一样！就好象只有日本的海岸城市，可以不要外国的帮助而能发展成为商业中心，而环抱世界的中华帝国的那些海滨城市，却不能够一样！就好象那想象中的泥沼一样的地方，不是“河流之王”——那通到十分之一的人类去的，长一千哩的唯一可通舟楫的河口上的三角洲一样！就好象在轮船航行的时代，这里却无论怎样都不会兴起一个世界一样！

外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和中国人的血，替自己建筑摩天大楼和别墅，在它们的阴影之下，中国人饥饿的活着，饥饿着

死去。对于它们，中国人也许应该感谢罢？他们应该颂扬他们交付庚子赔款和其他贡税的银行建筑物吗？叫一个罪人去颂赞他要被人绞死的绞架的牢固罢。最后残留的满哈坦^①印第安人，被外国人逐出，屠杀，灭绝了他种族的最后一个人——把他带到纽约，请他赞赏对他故乡的虐杀者罢！

美国的美国人仅仅逐出了，屠杀了和灭绝了本地的居民。亚洲的美国人却让中国本地的居民活着，好从他们那里勒索贡税、赔款和不动产，把他们当做鸦片和吗啡，收贿和卖淫的有利对象，把他们变成驮兽、家畜和干活的动物，叫他们的孩子照顾儿童纺织机，而且占领他们的土地。在国内战争中，在内部冲突中，外国人最初为了换取大批的金钱，供给双方军火以后，都一致援助着本地的压迫者。

在留驻上海这个新港的第一天，法国的首任领事，完成了领事的最初一件职务：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一家法国公司的法国商人奥罗尼先生，要把他的货物——两百箱军用弹药——存放在上海一家旅馆里，因为旅馆主人不肯，所以新到的法国领事敏体尼的干涉就成为必需了。

这事情发生在英租界；不久，一位名叫雷米的法国人购买地皮，法租界也建立起来了。也算是法租界的建立者的雷米先生买卖着军火。当他做了领事的女婿，自称为雷米—敏体尼的时候，他可以更大规模的做这生意了。美国领事们也从事这样的贸易。说美国领事格里斯武德先生在私运军火，是军火私运者雷米的岳丈向法国外交部声色俱厉的控诉中说的。听到这事以后，法国对美国说：格里斯武德应该调走。

^① 纽约的一部分。

他的继任者是克林汉先生，这位先生，作为美国领事，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一方面帮助着钦差大臣，而作为“罗塞公司”的贸易所的主任，却又卖军火和整个战舰给太平军。

这种两面欺诈的行为是违法的，代理敏体尼的埃丹先生在他对巴黎的报告中这样叫喊；而隔壁的雷米—敏体尼先生却始终在供给皇家道台以枪械，同时也供给太平军的领袖以枪械，每次五百支。

太平天国战争，区划了白种人从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转变到对中国的军火输出时代。在上海被围的时候（一八五三年，九月），由雷米—敏体尼先生卖给太平军的子弹，呜呜地飞进了雷米—敏体尼的花园，在领事馆的门前爆炸，毁坏了大教堂。军火商人又同样恭敬的服务被围者——向敌对的双方做生意，比那根本不和任何一方做生意，要强多了。

停泊在上海港湾的船只带了四种货物：“圣经”、“钢琴”、“洋伞”和“玻璃器”。圣经是连发手枪，钢琴是炮，洋伞是来福枪，玻璃器是弹药筒。

萨那巴利找着了一种很足注目的营业：他替中国商人的内河货运准备武装护送舰。他亲自带着一船军火到宁波去供给太平军，而且赚到这样多的钱，以至在一八六一年六月的一天，在船上被他的两个意大利水手抢劫谋杀了。

当一年以后，外国人为了中国的皇帝，参加夺回宁波城堡的战役时，他们整千整万的被杀死了。关于这点，斯泰维尼将军作了一个在世界大战中重复了，而且在其他战争中还要重复的记述：“要是欧洲的同盟者遭受了这么难堪的损失的话，那是由于太平军具有完备的欧洲武器的缘故。”

“在那时，人们一定可以赚得多一点。”

我也这样想，真德先生。

依照真德先生的意见，分割地球的国度，在上海、北平、南京，到处有它们的代表，因为到处进行着将军们的征战，到处需要军火。

维克斯·阿姆特朗领导着，因为一般是英国在领导。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了这种领导权，又在那时候取得了海关监督权，而且使英国货物比其他国家的货物要容易得多的获得登岸“通过”的准许，来巩固他的地位。

西莱德—克留佐的国度（“克留佐”这个没有信义的字，在大北大厦的名牌上是没有的）在和英国竞争。它的使节，麻强德先生监督在上海外滩执行职务的属国使节斯柯达，潘贺拉的行动，而且又监视着驻在北平直布鲁勒军火工厂的领事劳兰特先生。

纵令中国常常借外债，但它还是很少得到什么钱。毕竟，人是不能把钱放在这些中国人的手里的，是吗？他们要是不要钱，却要军火的话——唔，那就好了！世界大战以前，维也纳的两家大银行，“北奥贴现会社”和“奥国土地贷款所”，和中国商定了三笔借款，条件是要向的里雅斯丁诺订购巡洋战舰，而由比尔森的斯柯达工厂装甲。

在上海，英国的出口货商号供给坦克车和铁甲车，法国的商号供给炮，捷克的供给机关枪，挪威的供给炸药，比利时的供给连发手枪，瑞典的供给探海灯，德国的供给毒瓦斯，美国的供给绵火药和硝酸盐——这一切都是公开的。

非公开的营业至少有公开营业同样的规模，它有估量不到的利益。人可以比较便宜的去购买，特别是旧的军需品。对于这些，制造的费用已经不再算数，而购买又是秘密的。

“自然，多少是这样。”

我知道，真德先生。

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军需品都抛上了市场；贩卖人一个比一个卖得便宜。军火商号经理人的营业被威胁着，政治和商业的冲突增大增多了。因为每一批军火，不管是供给北中国军阀的，或是供给南中国军阀的，由于兵士们的丢弃，结果都落到革命者手里，所以列强的使节们开始感到不安了。谁能保证，广东人会以反对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他们中国的银行家和将军们的军队为满足呢？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国内战争不会同时威胁外国统治者和他们自己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呢……？中国人手里的每一支来福枪，每一个弹药筒，都增加了危险。

一九一九年，由于北京美国公使的提议，列强们签订了一个协定。在这协定上，他们的人民被“禁止在全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巩固的政府以前，将军火和弹药或制造这些的原料输入中国”。后来，意大利、荷兰、丹麦、比利时都被邀参加了这个“禁止输出军火的协定”——只有德国遭到排斥；那时候，它还是被看做蹂躏欧洲人种的国家，因此没有订立协定的权利。

但是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欧战的残余者感到比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战场幸运和安适。这样一种有利的买卖不会被“禁止军火贸易”的协定倾覆吗？倾覆？为什么？绅士们是很知道怎样解释绅士协定的。譬如：当吴佩孚的军队备有不列颠的钢盔的时候，供给他们的商号平静地说明：这些钢盔卖给中国人，原只是为了装饰的目的，原只是在检阅的时候用的。

不列颠军火商号供给一百四十架飞机给北京，这是为了民用的目的。军队接收了这些飞机的事，难道是那有所戒备的商号的过错吗。

日本人把迫击炮，臼炮和炮弹供给张作霖。上海的诉讼证实了：正是公共租界的最高官吏，作了张作霖购买军火的经理。

自然，当不是专营此业者，就是非军火商人，把以上情况透露出去的时候，是讨厌的。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性质的误会，德国人大显了头角。毕竟，他们是和禁卖军火的条约毫无关系的。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由青岛进口，在济南出卖。一九二四年的海关统计表，表明了百分之三十二的公开军火贸易是德国公民经营的；关于非正式的贸易，没有统计。

“你知道吗？排除在军火贸易协定之外的人占了军火贸易的首位。”

因此，你看，真德先生，上海就是一个粪堆，也不要紧。^①

“唔，——原来是这样！”

以为禁止输出军火的国家的商人，毫无作为地忍受德国人的竞争，那是不对的。因为，在斯巴^②和日内瓦，德国是被剥夺了制造和贩卖军火的权利的。

因此，反对德国的行动发动了。最初使用的是轻便武器。譬如，有一种轻便武器是美国电讯社“美联社”。一九

① 真德先生是德国人，所以这样说。

② 比利亚城名。

二八年一月三日，该社电告青岛征发了许多铁路货车去输送德国供给孙传芳将军的军火。对于这事，德国出现了下面的评论：

一个有信用的电讯社，竟发出这样的消息，不能不使人惊讶。众所周知，汉堡的中德商号联合会明白的宣告了从事整个中国贸易的他的会员，没有一个是和中国军火贸易有关的。而正在整顿混乱现象以准备发展将来营业的商号，竟去供给军火以助长混乱的事，是不可能想象的。

八天以后，第二次射击发放了。这一次射击是发自比较巨大的炮口。英国官方电讯社“路透社”青岛电云，有一挪威船从汉堡开来，载有七千支德国来福枪，十架汤姆逊机枪，和足供上列枪械使用的弹药；除此以外，不久以前，一只德国船在青岛起卸了机关枪和迫击炮。两批货物都是运给中国的北方军队的。对此，德国回答：

这个电讯，特别是自德国各海运公司发表了它们的船只不装运军火到中国去的，是应该以最大的谨慎加以研究的。

于是一尊真正的大炮放射了，那就是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伍博士，他要求扣留最近一批装运德国运华的军火的挪威船，而且声明，在调查证实了关于德国给张作霖和其他军阀所运军火的电讯的正确以后，他要处罚和这案件有关的德国在华商号。南京政府发觉，北京政府委托天津、济南和青岛的几个德国商号，在德国购买价值五百万元的军火和军需品，把它们装运到华北。根据这个委托，挪威船装运的货物，已经由德国在华一家商号的经理交给了张作霖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德国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上，共产党议员西托卡在讲演中宣读了伍博士的声明。德国

外交部长西托内斯曼博士，答复了西托卡评述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他的中国同事触及德国在东亚的工商业的声明，却没有作一个字的回答。他干脆的不予理睬；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了汉堡东亚商业联合会说明它的会员根本没有从事军火贸易的声明，轻易的否认几百万元的工商业的存在，是可能的吗？

“那位伙计也许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吗？”

不，真德先生，一点也不知道。

“唔，好呀！”

同月，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德军需品贸易的领域里，又发生了事故，而且渐渐的，连德国外交部长对于东亚商号的善意的信念也动摇了。这是从一家报上的电讯开始的：

基尔，一月十一日。一艘挪威轮船停泊在霍丁诺自由港装货，货物的一部分是作为开发矿山之用的炸药，运海参威。打算转载到轮船上的是前天从哈勒^①开来的载着被称为机械和机件的十七车货物。约莫有一半货物运上船时，一次特别的检查发现了来福枪的弹药，因此，海关当局制止继续装载，而且扣押了货车里面的货物。弹药箱上写着运送奥斯陆^②，但无疑是运往中国的。制造地不明，但是可以确切的推断，这是外国的军需品——也许来自捷克——而哈勒不过是一个中间转运处。挪威轮船离开了基尔港。没收的弹药在基尔销毁了。

鉴别货物的检查是凭着情报进行的。供给情报的人读了

① 在普鲁士。

② 挪威国都。

官方否认关于运军需品到青岛的事，写了下面的信给当局：

“你们错了，先生们，要是你们相信德国没有军需品运到中国去的话。譬如，请看看这一艘船是装载的是什么样的机械罢。”看到这信以后，当局不得不去查看，于是发觉了这是把活人变成死尸的机械，但是不成问题——这是外国的！官方的说明是这样：

显然，德国海关当局是被欺骗了。军需品只是在虚假的谎报之下，才准许从德国运送的。我们知道，不成问题，德国商人和这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德国政府和德国船主协会，以及汉堡东亚商业联合会缔结了一个协定，约束这两个会社不要在德国港口装运武器或军用品，或是在德国船上装载它们。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着这个协定，因此，只有这两个会社以外的人或外国人才可能有这种行为发生。

是海关当局，为了指责被欺，使大家知道这宗货物不是外国的，而是来自托各附近的苏布里兹的一个商号的德国产物呢，还是一个竞争者主持的呢——谁知道？总之，服尔夫电报局很快的泄露出了矛盾：

基尔，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服尔夫电报局）。在基尔港的军需品扣押案件中，我们知道，检察处连同刑事调查处正在哈勒和托各从事调查。截至现在止，这批货物的发货和收货人究竟是谁，还未查明。

什么？检察官和刑事调查处竟查不出十七辆货车组成的一个列车，和三百吨重的一船货物的委托者和受托者是什么人吗？报纸帮助当局，宣布了委托者和承揽转运者的名字。据说，被委托这种营业的运输商号，在军政界有相当的关系。这是指，象一月二十日的“柏林日日新闻”上所说的，

不久以前，因为耻辱事件引起了大家注意的海军部海运局的某某几位官吏。

对于议员西托卡提出的问题，西托内斯曼博士回答说，他收到了有海军总司令真克签字的声明书，略谓海军部没有一个局和供给中国军火的事有任何关系。

议员西托卡（共产党）：“要是德国外交部长以为用这一声明书可以了却这件事的话，那他错了。声明书不过是我所说的话的证明。没有人说海军部本身牵连到这一事件，而是说在海军部占重要位置的先生们牵连到了。但是，对此，海军总司令真克没有回答。这更证实了我的责难。为什么真克对于海军部重要人员牵连到这一事件的具体问题，不作答复呢？”

德国外交部长，西托内斯曼博士：“当人们告诉作为部长的我说，我的部员干了这种事，而且当我声明我部的各局都与此没有牵涉时，我得说明，那也是指着有关系的个人而言的。把海军总司令真克的声明解释为仅指各局机关，是不行的。”

没有一个通过外交使团以达到他的地位的外交部长，会象西托内斯曼一样易于置信。他相信船主们的声明，他也相信海军总司令的声明。而国防部长却也不机敏。

“如果海军部要对‘柏林日日新闻’提出控告的话，”国防部长格罗勒在二月十日这样说，“那我完全赞成，因为这是把那两个断言没有牵连的官吏诉诸法院，使他们宣誓和迅速解释的唯一方法。向检察官提出诉讼太麻烦了。”

五天以后，格罗勒宣称，他亲自审问的结果，给他这样的印象，就是“一家有关系的商号违反了它的义务，企图把

那拆散的军火运到国外去。这家商号欺骗了一家十分可靠的转运公司，使它相信一切都不违背规定。”两个被指控官吏，宣誓说明他们和这事情毫无关系。

那一定是非常奇怪的讯问，国防部长亲自执行的讯问。从来没有什么想要拆散的意思，也无所谓违反了义务，也没有什么转运公司被委托者欺骗了的事情。有关系的商号公开答复：关于委托贩卖品，他们问过国防部海军部，而丹尼尔陆军少校通知他们，部里不知道委托贩卖品的事。和购货的商号经理一道在基尔替委托贩卖品准备一切的官吏，在他回柏林去的时候，被嘱咐这样回答。他打电话到海军运输部去，那边的人向有关系的商号解释说，否定的消息是从一个不精明的处所发出的。另外一个电话中，转运公司得到了委托贩卖并不违反规定的认可。

德国议会上面的一个质问，引出了国防部卷入了军火漩涡的事实。法律调查继续着。这事情经过一年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十八日，基尔州长的法庭，审讯了西曼陆军少校（已退職），海军反间谍部普洛兹上尉，和柏林商人西华兹，叨布，陶格，维推金斯与莱宁；他们都被加了违反军火法律的罪名。当然，案件是秘密审讯的，当然，所有被告都无罪释放了，当然，诉讼费用由国库支付。当然，就是在宣布判决的理由时，也是不准公众和报界进去旁听的。

检察官通告要上诉。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二日，在基尔听到了上诉。经过严格的秘密审讯以后，所有的被告又都无罪释放了。

“唔，那么，你作何感想？”

我根本没有什么感想，真德先生。

正当挪威轮船和他所装载的德国军火在青岛的时候，正当挪威轮船和他所装载的德国军火在基尔的时候，第三只军火船作了一次更奇异的航行，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整个捷克的公海舰队，不是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里把波希米亚^①配置在海上吗？但现在的地理并不同意莎士比亚，所以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其他捷克船可以在公海上遭受这种战事的危险。

这是在马尼拉开始的，不是在布拉格^②的马尔道河港的马尼拉，而是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的马尼拉海港。在一九二八年初，有一艘两千吨的轮船停泊在那里。船头上闪耀着用鲜明的金黄色的字，我们可以叫做截塔（Zeta）的船名，桅顶上飘动着一面有蓝三角的红色和白色的旗帜。船上有一位德国水手，一位德国船长和九万支备有弹药的来福枪，和一辆装甲车。它不过是要在马尼拉添好煤，再安稳地开到中国去。

但是，正和泊船处的生活中常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两个水手在一家海滨酒馆里喝醉了酒，于是谈起了藏在他们船舱里的那种有趣的货物。

这谈话——这是海滨酒馆的谈话里常有的事——被南京政府的政治代表听到了，他要求菲律宾的海关当局和总督扣留这些运到张作霖那里去的军火。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他电告了他的政府，他的政府派了一艘炮舰到公海上去兜捕“截塔”号。张作霖被一个有关系的人警告了，也派一

① 现为捷克一省。

② 捷克首都。

艘兵舰去保障运输的安全，这样，太平洋的海战逼近了。

在护卫舰到来以前，“截塔”号在晚上偷偷地拔了锚。它急急地驶去，炮舰跟在它后面咆哮着。在离山东六百哩的地方，“截塔”号接到了追赶者以无线电发来的命令：它得立刻停驶，不然，就要开炮。“截塔”号没有停驶，于是开炮了。刚刚来得及，喘着气，但是毫无损伤的，“截塔”号跑进了青岛。

那时候，已经站在蒋介石方面的英国报纸和国民党报纸一齐展开了一个反德运动。据云，“截塔”号是一艘德国船，水手是德国人。它在汉堡装了货，从汉堡开出。只有捷克军火工厂的声明，才使得德国在华的商业没有被取缔。因为这个声明至少说明了货物不是德国制造的。来福枪在九月末用三十辆货车又运到汉堡，保了一万元的险，由一家转运商号承办。因为租用的船只没有到来，委托品在汉堡存放了两个星期以上。“为了避免意外”，军火由一个警察分队守卫着。船到的时候，委托品装了上去，船只就归了一个布拉格的商人所有。用“截塔”这名字，它扯起捷克的国旗开出汉堡港。

英国和捷克之间还作了一个短短的收场白。在英国下院对一个质问的回答中，述说了在布拉格的英国公使曾经建议捷克政府，建议不要允许对中国输出军火。对此，彭内西博士照会了英国公使：捷克不能参与禁止对华输出军火的任何协定，除非这协定是平等的约束一切国家的。

捷克人很可以这样回答。他们没有参与绅士协定，并不是他们被宣告了不是绅士，而是因为他们被宣告了不是以航海为业的国家。好，从那被人给与了另外一种评价的德国人

那里，他们买了一条船，去运输被法国控制了了的他们军火工厂制造的货物。要是英国责备他们的话，他们可以随自己的便回答。德国就不能够：它被条约限制了要缩小军备。

但是德国外交部慢慢开始觉察到，德国商号在中国军火生意中，并不象他们所高兴表示的一样，是毫无关系的。因此，外交部的国务秘书萧伯特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汉堡东亚商业联合会，在信里他说了下面的话：

“我承认，‘东亚商业联合会’之会员商号，按照去年四月给外交部之保证，已停止从德国商港或用德国船只运载军需品到中国去。从中国政局看来，我认为应郑重告诉我国在华商号，务勿供给中国军火，即用其他方法，亦所不许。”

有了这封信，德国在华的军火贸易是不是就会终止，真德先生？

真德先生只笑一笑。

证券交易所的景气！证券交易所的景气！满洲的战争！
上海的战争！证券交易所的景气！

一百年以前，在欧洲，常常有人为了人道的缘故，扬言反对欧洲人把鸦片烟输入中国。扬言反对军火贸易的，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是为了竞争的缘故，一部分是因为害怕商业对政治的种种讨厌的后果。可是，凡是希望没有政治危害却又可相当获利的地方，从铁屑商号运出的为使人类变成碎屑的委托贩卖品会变成正当的营业，挪威—捷克的欺诈会变成德国的爱国行为。军部的代理人会变成商业代理人，违反法律会报以释放。

只有释放，会公开的宣布，这营业的其他一切都是秘密

的，一切都假装，遮掩在烟里，笼罩在雾里；给与假的解释，作出假的声明，有着假的委托者和假的目的地；在一面假的国旗之下，这种杀人的器械被送到杀人的场所去。

一切都是送给中国人民之敌的。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以后六个星期，我们不是在南京又看见了他们，而且不认识他们了吗？在上海，他们用着拿去打猎更适宜一些的历史以前的燧石枪，穿着破衣服，对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他们穿着漂亮的灰色新军服，带着军用水壶，武装带，和发亮的崭新的来福枪，连发手枪，和大炮，开去打——打什么人？打国内的敌人。

有赖工人通讯员，我们知道了货物是运到哪里去的：运到香港，那不列颠的直辖殖民地；运到青岛，那北方军阀居住的地方；运到大连，那日本的海军根据地；运到上海，在那里的江上和江岸上；除了中国人民，人人都是全身武装着。

告诉我，真德先生，欧洲不送什么军火给中国的苏区吗？

“不，那根本不可能。红军没有一个海港，他们完全被封锁了。”

要是他们有着一个海港的话，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好处吗？

“一点也不，凡是欧洲和美国炮舰可以开进的地方，他们的军队就会登陆，他们会用海军的大炮去轰击红军。”

那么，红军的军火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你知道，是这样的。当什么人从政府的军队里投奔到红军里去时，他们非常巧妙的教育他，把他放在他们的士兵

一起，和他谈话，谈起资本主义和那一切，唔，我们不难想到，他们会和他谈些什么。于是这个人把他的来福枪换了五块钱，被送了回去。”

送了回去？

“正是。自然，第二天，这个人会尽他所能携带的带着许多来福枪，又回到他们那里去。此外，如果可能，要带几个弟兄去。”

糟糕的事体，真德先生，糟糕的事体！

“随便你怎样想罢，可是白军丧失的枪支愈多，我们就能愈多的替他们制造。”

在纽约“工人日报”上（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八月），美国工人通讯员记述了新泽西改营军火贸易的辛格缝纫机厂，把它的出口供给给了什么人，而且是怎样供给的；在纽约的港口，日本“平民”是怎样的“替中国”保护着用几千万元购买的轰炸机。

关于易北河下游，布隆萧森附近的波维哈根的运输货物，工人通讯员在“汉堡民报”上，有这样的记述：开往中国的每一艘轮船，都装载了四〇〇——七〇〇吨爆炸物——骨胶，导火线，硝酸甘油，火药，无烟火药，来福枪，连发手枪和机关枪的子弹。一家炸药工厂用驳船把货物运上东亚的轮船。爆炸物装在靠着德国深海的轮船上从英国运来，而且转驳着。

在汉堡和汉姆之间，军械和弹药箱从密封的捷克的货车转运到大驳船上，驳到东亚的轮船去。

海关和警察当局经常在船上。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轮船日夜不停的装载着军需。装载是这样的匆忙，使脚夫们不得

不连续做七班——上班四个钟头，下班半个钟头——搬运弹药箱时，疲倦得常常倒了下去。

这种“正当的商品”，这种“专为东亚矿山使用的爆炸物”，在中国登岸是不是也同样的正当，依照一个水手的描写，在太平——但不是和平主义者^①——洋上的手续，是这样的：

在海中看不见的地方，在荒岛之间，抛下了锚。我们都很惊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升上了一个旗号，升起五分钟，又降落了。我们周围是一片死寂。约莫过了一点钟，一只商船变成了一艘兵舰，飘展着中国海军的旗帜，显现出来。经过一番调度以后，它系在我们的船边。一位穿西装的中国人，同许多水手，走到我们船上来，和船长谈了一会。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二副走过来，要我们起卸一号舱里的箱子。我们每个人从穿西装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七块钱。这工作约莫花了三个钟头。船舱里还剩下许多军火和弹药，在我们开到上海以前，这违禁品的剩余部分都卸到了吴淞附近的许多驳船上。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冬天，当不宣而战的战争在满洲和上海进行的时候，那是做私运军火生意最好的时机。后来，在中国十九路军违反南京政府的旨意，阻止了日本人前进和休战以后，国际联盟插嘴道：日本和中国应该调停，关于满洲，至少应该来一个形式上的协定，这样使国际联盟不致于失掉面子，而日本可以立刻开始进攻苏联。

^① 太平洋的英文是Pacific，和平主义者是Pacifist。这种字面相同的联想，译成中文就难以表达。

一切都很好。但是那些已经订购的，正在横过太平洋运到中国来的军械该怎么办呢？

在华懋饭店的一个舒适的角落里，一位在白天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法国军械组合，晚上在Gasano（新华）跳舞厅喝香槟酒的绅士，和另外一位在白天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德国机械组合，晚上经营军械生意的绅士，舒适的坐在一道。这两位世仇，有许多话要互相耳语，而且有许多计划要订立。

小鬼们奉着命令，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

“把货装起来运走，或者，要是货还没有运到那里，就在路上折回去。”

“折回哪里去？”

“海参崴。”

“什么？给苏俄人？”

“不要多话！”

这个只是关系上海大鬼的事，中国购买的军械要运“到海参崴去”。如果说要把它们运到日本去，激进的报纸想到，把作战的材料运出国去接济敌人会引闹出事的。因此，这材料只是运“到海参崴去”，要是船只在中途碰到突然的损伤，不得不开进一个日本海港的话，谁也没有过错；要是船和货被日本人捕获了的话，谁也没有过错。战争就是战争。那么，你以为怎样？你以为我们要去讨好日本人吗？日本需要我们的军火吗？你可知道，不到一年以前，日本三井洋行（四川路四十九号）在卖军火给中国？就是这样！（日本现在高兴从中国得到军械的事——当然，是用不着要对每一个苦力去说的。）

因此，上海军火商人的那个光明正大的老原则又重复

了：受货人永远收不到货物——收到货物的，总是他的敌人。

那么一切都不错，真德先生：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你叫上海做粪堆？

“哦，——唔，道理就在这里！”

疯 人 院

朋友们，如果我老是这样说，请打我一枪罢！朋友们，如果我老是这样说，请打我一枪罢——如果你被叫去抵罪，只须指出是出于我的请求，这会证明你的行动不过是我借着别人的手的自杀。朋友们，如果我老是这样，请把我象一只疯狗一样的枪杀罢。“象一只疯狗一样……？”比起一个疯了的人来，疯狗倒比较近似它原先的性情和形象！

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苦恼的，无可逃避的纠缠着你，挡住你的去路。为什么不把那不再是人的生活，而且永远不会再成为人的生活了的人的生活，立刻结束呢！为什么要让这些生物，污秽他们自己，摧残他们自己，在痉挛之中扭曲着，在没有生气的冷淡之中茫然自失呢？为什么要让他们继续地饥饿，绝叫，猛烈地击打着他们周围的一切呢？

熟悉欧洲的疯人院，熟悉那里的走廊，那有着软的墙壁的囚室的任何人，都会感到要想象出比这里更糟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但看见过中国疯人院的任何人，却会知道那感觉是不对的。要是你不愿意知道的话，不要读下去罢——这本书是有够多的篇章可以去读的。

我们是在“鬼屋”里。这是在北平西北门(North-West gate)附近。我们询问的那些人，称呼那是疯癫病院，它正式的名字是“疯人医院”。这是一个警务机关，一

个拘禁危险的疯人的囚牢，构造和北平的拘留所没有两样。一个“衙门”，一组密密的里面围着许多庭院的凄凉的屋宇。

这个城墙边上的“衙门”，以前是一个庙宇。木雕的装饰早毁败了，窗板已经打坏了。没有装铁闩，也没有装铁门。庭院有守卫提防。在中国，人是汽车，是起重机，是机器，是桥梁，是电线，为什么他不可以同时也做门簰、门闩、大门和警铃呢？在这文化教养很低，人口过剩的国家，人是有多余的。守卫好象门闩贯穿在那里一样，安置在行政机关的门前和大门口。

一个从欧洲来的政府医官，可以跨过这穿制服的人锁和穿制服的人门，以及穿制服的人闩的警戒线。行着和一个政府医官身份相称的鞠躬礼，病院的院长把我们引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不是医生，关于精神病的疗法，他所懂得的和一位精神病医师一样的少。

关于我们首先问起的鬼怪，他觉得不能不笑。的确，病人和病人的亲属总想象着有一种鬼怪，普通总是一个狐狸精，依附在疯人身上，正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但是现在，中国的医生同意了他们欧洲同事的意见（谦恭的鞠躬），认为这种假定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

至于，不错（鞠躬，并且大大的张开手臂），至于同意欧洲的假说，说精神病和脑神经有怎样的关系，中国医生却办不到。他们认为精神病是由于人体上的某种器官，特别是由于胃、黏液和唾液的分泌物，由于内火和外火（？）引起来的；但是，脑子本身和疯癫根本没有关系。

也许（微笑的表示，鞠躬），也许欧洲的病人是这样，

中国的精神病和脑筋决无关系。

“这种病症大概是由于呼吸不顺调，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因此我们医治病人，主要的是给他用针刺。”

（这里我们可以插进一段关于针刺的叙述。我们有机会在上海一个中国女医生那里见识过针刺。女医生的器械是一套象编针一样长的针。每一口针——医术的暗示——都包在一块特别的有色的绸子里。我们看着她疗治一个患呕吐的八岁女孩。又看着她疗治一个诉说快要失明的年轻的男子。女医生一动不动的把她的病人看了五分钟，于是小心的选了那适当的针，没有消毒，甚至于也没有揩干净，她准确的把它们刺进肉里，孩子刺在肚脐上，男子刺在脸颊上，至少刺了三厘米深；血流了出来。）

“此外”，院长继续说，“我们企图借丸药和膏药的帮助，把那由下而上的呼吸引导得和正常的呼吸一样。”

结果呢？院长向我们——我们不是政府的医官吗？——投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我们这边正和你们那边一样，很少结果。”

送病人到这里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通常是由警察捉来的。有时是法院送来的，或者是在家里再也管不住他们的亲人把他们送到我们这里的。我们大半是收容那些不能过活的贫民。”

病院的收入怎样？

“哦，很小。整个的病院，连同一百五十个病人，九十个男的和六十个女的，每个月只有七百块钱。”

七百块钱要维持一百五十个病人整月的生活吗？

“不，你没有懂我的话。七百块钱是我们的全部收入，

“里面有我自己和医生以及看护的薪水，剩下的才是病人的生活费。”

每个病人大概——？

“每个病人大概是六分钱一天。”

六分钱！职员呢？

“我们的报酬很坏，伙食是由院里供给。”

人们可以猜到，不幸的职员吃的是不幸的病人的饭，他们扣减着病人微少的口粮。病人吃什么呢？

“面包和蔬菜。”

后来我们见识了“面包”和“蔬菜”：一种柠檬颜色、柠檬模样的玉米窝头，和一种不放盐的、街头小贩当做垃圾抛弃的植物的茎。

“你想要怎样，”当我们开始巡视的时候，中国院长对他从欧洲来的皱着眉的同事这样说：他们想着病人要么是在这里医好了，要么是死掉了。但是他们没有医好，也没有死掉。“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男宿舍。各种形状的形体，可怜的不成形状的形体……朋友们，要是我老是这样，请打我一枪罢！

好象是不大可能，但这里的情形确比欧洲的疯癫病院更加可怕。欧洲，病人的解脱给拖延着：已经快断气的人，要拖延许久以后才让他断气：他的苦痛由于人道的考虑给延长着。死者都在卫生的状态中保存着不埋。死者，象这里的这些一样。在西方，人忍受着在卫生和美的背景下不敢终结的苦痛。

但是在东方……飞着口沫，说着胡话，赤身露体，带着

脚镣，一个病人仰天躺在石头地上：他的手臂搬起大腿，使腿竖立着。在欧洲，也许他们由比较温和的方式钉上脚镣，也许这种事情是必要的；但那一定是秘密的，不是公开在院子里，在其他病人的面前。

不错，纵令其他病人看着钉脚镣激动起来，也不必害怕会有集体的愤激的骚动。所有激烈的疯病人，都同样给锁住了，或者是连锁着一个手腕和一个脚踝，或者是用两副铐子，一副把两只脚铐在一道，另一副铐着两只手。

蚊子好象知道没有手可以触到它们一样，密密的飞集在没有防御的肢体上进食。有两三个上了镣铐的形体在竭力的挥动他们的扇子；这点小小的心旷神怡所花费的痛苦代价，可以在那红肿的手腕上看出来，扇子每动一动，手铐就要在手腕上擦一下。大笑从一个指手画脚的人的没有牙齿的口里发了出来。

有一个人昏呆的坐在那里——蚊子和喜欢探问的来客，都不能把他从那种孤独的一动不动的状态里惊醒。他不挥扇，也不搔痒，不向客人叫骂，也不对他吐口水。朋友们，请打我一枪罢！

女人仅仅由一张门，从男子的部分隔离开。在那边，破衣褴褛，或是一丝不挂。这对于病人似乎是相称的（院里不供给衣服），但在这里，在女人中间，却给人以一种女巫世界的印象。

院子里，有一个女人不停地磕头，她的前额因不断的碰在地上，都脱掉了皮。她悲叹着她的命运：她的丈夫讨了一个小老婆，让她，他的正式妻子，挨着饿，因为她没有给他子嗣。她祈求着神明，保佑她生一个儿子。

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带着镣铐，躺在宽大的普通病房里的石凳上。在这里，一张上一世纪的风俗画苏生了：在被征服的城市俘虏来的，放在空旷市场上当做奴隶出卖的黑发的处女，正是带着这种旁若无人的狂怒睨视着。

一个快乐的病人请我们到她的病房里去，她要卖些糖果给我们。她陈列了她的货物，那其实是并没有的。这样表现了她的演戏的才能以后，她向我们证明她也能够读书和写字。她朗诵着一本并不存在的书，又用一支并不存在的铅笔写字。

还有的病人威胁的簇拥着我们，叫嚷着他们依附着鬼，这是一种可怕的虚构，同时叫嚷着他们饥饿，这是一种可怕的事实。

饥饿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从自己家里的小房子转入这所“大房子”（监狱），但是逃进疯人院对他们并没有帮助——在这所大房子里，他们还是要挨饿。

大部分人到这里来是因为物质的贫乏，极少数人是属于第二类——遗传的患者，或是第三类——被麻醉剂，特别是海洛英，麻醉了的人们。

而且就是精神上的因素也是植根于物质的贫乏。中国人努力保持礼节，维持“面子”的习惯，被贫穷弄得没有可能。要是洋车夫的洋车被人偷去了，他感到屈辱，要是他不能弄到一部新车的话，他不敢再回家去，而是逃进了疯狂。要是因为小产，一个女人辜负了家庭对于子嗣的期望的话，当她的身体为了艰苦的工作变得更衰弱的时候，她会变得更加更加的绝望。想到她的将来，想到她会当做一个没有用的老婆被轻蔑，结果不得不去服侍她丈夫的小老婆的时候，她

发疯了。体面失掉了，一切都失掉了——而穷人失掉他们的体面要比富人容易得多。这在中国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

疯狂并不过于滋扰家庭和路人的人，可以安然在屋外和街上偷偷走动。但那被强迫加入这地狱里的乐队的人……

朋友们，要是我老是这样，请打我一枪罢——即使不过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温良的病人一样的病人，也这样叫唤。

盎格鲁·撒克逊缩影

一 工部局董事

“刚才说话的人，是我多年来熟悉的朋友，Mr.——呃Mr.——呃——”

说话人支支吾吾，两手局促不安地搓动着，会众开始笑了。当一个人提起敬重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的姓名时，的确是相当好笑的。

对于大家的讪笑，说话的人以为是怀疑他在夸耀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友情。因此他说明道：

“十五年来，我每天都和这位绅士在俱乐部谈话，但是我只晓得他叫做A.P.C.”。

说到这里，骚扰停止了，可以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再笑了。因为到会的人都知道称为A.P.C.的那位绅士，A.P.C.就是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亚细亚火油公司）。

“大班”这个字的意思是洋行经理。远隔着他们的欧洲和美国的总行，有巨额的款项由他们任意处理。他们有许多多的雇员，负债者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大班们总是占据着上海工部局的议席，虽然最近五十年已经有许多人反对大班们的寡头政治。

使得那位说话的绅士两手局促不安的绅士，就是A.P.C.

的大班。当然我们没有十五年中天天在俱乐部里和他谈话。但是我们知道，他经营中国火油进口贸易已经四十年了，而且毫无阻碍的得到了A.P.C.的董事的职务。因为这样，他也同样变成了上部局董事。

他行使他的公家的职权，正和他应该尽责他私人的写字间所要求的一样，正和董事会的他的八位同事，那些最大的银行、转运公司和出口商号的大班们行使的职权一样。

我们看见这些绅士们一起在那里。他们平常总是坐在戏幕后面的舞台上，今天幕布拉开了，因此，公共租界的纳税者可以瞻仰到他们的统治者的丰采。

八位绅士，围绕着一张大概是从市政厅搬来的恰好合适的橡木桌子，坐在和桌子配成一套的橡木椅子上。他们的后面坐着主席。

九位绅士保持着九重的固定。他们穿着九条有灰色条纹的裤子，九件晨礼服，和九个竖起的领子，有着九颗珍珠的九只别针插在九条领带上。九个头，收拾得很整洁的银灰色的头发，头顶上的头发大都相当稀疏了。七只眼睛在七副独眼镜的后面闪闪发光，两双眼睛戴着眼镜（戴眼镜的人是日本人）。

所有这九个人，连最高位者在内，构成了公共租界的董事会。A.P.C.先生（见上）和大抵只是互相知道他们商号的名字的大班们在展览着。

看下面的会场罢，这是纳税洋人的大部分。他们每年开一次会。每年纳税达五百两以上的人，有选举权，每年纳税达一千二百两以上的人，有被选举权。

这样，有三千西人有权选举，统治一个大城市，统御一

支常备军和一支海军，规定对于百万中国人的法律和税务。

同样的事情在邻近的王国进行着。邻近的王国是法租界。法租界住着二八九、二六二以上的中国人，而西人不过七、八一〇人。这少数西人中（不过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法国人又不过八九二人，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公董局的公吏和雇员；而法国总领事和法国市政厅毫无顾忌地我行我素地继续着他们的独裁统治。

关于大英统治怎样呢？“大英统治？”我们不是在谈公共租界吗？它的行政不是国际的吗？自然，完全是国际的。所有住在公共租界的三十种不同国籍的人都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英国人掌握着一切权利，而中国人却毫无权利的这事实，暂且不说罢。

台上的九位绅士并不亲自行使这些职权，第一，他们并不尽是英国人，他们之中只有五位是英国人；第二，他们决没有这么多多余的时间，他们是大班，他们要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去处理他们的私事。

但他们不用愁。工部局所有较高的公吏都是英国人，执行着英国的政策，象所有的英国官吏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反射作用。租界的陆军（被称为义勇团），租界的海军（被称为水巡捕房），政治和刑事巡捕，交通巡捕，救火队，监狱司，卫生、财政、河工、电气、运输、教育各部，都是英国人管理。但是让我们不要隐蔽事实罢：工部局乐队的指挥是一个意大利人，市政厅的书记是一位美国律师。

英国人专制地统治中国人，已经有八十年以上了。已经有八十年，中国人没有领有土地的权利，甚至于没有走进公园的权利，要求容许他们派代表参加工部局董事会的每一次

申请，总是被轻蔑地拒绝了。南京路的惨杀案以后，民众暴怒地表示要根本扫除整个工部局董事会，为了这缘故，成立了一个由五人参加的中国顾问委员会。当大战以前，议席让与了德国人和美国人，大战以后，议席从德国人手里收回交给了日本人的时候，英国的绝对权限没有变动。同样，当一九二八年，五个富裕的中国人在工部局占了议席的时候，英国的绝对权限也没有什么变动。事情很快清楚了，就是这些委员，并不想妨碍这个中国城市的百分之百的英国的行政，因此，他们才被允许做了工部局董事。

此外，工部局西董正在秘密筹划，准备公开规定上海市为自由市。要是他们这个计划成功了，中国人会完全退出政府。这实在是一个困难的计划，有点儿象巴黎的英国商会通过一个决议，要使巴黎市脱离法国，宣布它是一个自由市一样。

但是事情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五个中国人被允许参与了工部局董事会的评议。但是今天为什么他们没有坐在台上呢？

他们从他们纳税的同国人那里得到委任，但是中国董事和中国选举人都和这里进行审议的市民会议毫无关系。

九个西董是以一种极端的族长的方式被选的。被推为候选人的人，就站在候选者的地位，以候选人的资格在报上刊载他那极端特殊的纲领。纲领常常是这样：他赞成对于他们的中国同市居民的有诚意的关系；同时，他将竭力维护西人的极端有限的权利。就是这样，任何选举人都从容而且甘心情愿地在印就的候选人名单上划掉一切人的名字，只留九个，来表示他们的投票。删除次数最少的九个名字是当选者。

今年，日本人——这果决地投票的唯一民族——因为美国对于上海战争的态度，竭力使得两个美国候选人中的一个失败了。这件事引起了上海美国侨民的巨大骚动和众多议论——自然，在所有的西人之中也发生了这同样的影响。但是把获得董事会的两个议席算做巨大成功的美国本身，却对于日本的挑战置诸不问。上海的美国通讯员，从日本军队司令那里获取他们的消息，他们不愿意断绝这个重要的新闻材料的来源。

利用一年一度察看选举的权利的人并不多。要是卡尔登大戏院每天晚上都象市民年会那样座席虚空的话，那它老早塌台了。只有八十个左右堂皇的纳税者坐在正厅，约莫有二三十个普通人坐在楼厅。

实在也没有很多诱人去的事物。一位现在做了工部局董事的英国从前的将军，宣读一张决议案的单子和一篇欢迎词。对于我，一家报馆的代表——我是代表着柏林Loi Kalan Zelter的——第二天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给了一张印好的应该执行的事项的目录表，已经说过的一切和将要说的一切都印在上面。

有什么人要说话吗？没有人要说话，我要付表决了。赞成的请举手。谢谢。这个提议通过了。

偶发的事项不会被等待而且也不会发生的。今天只有一个发言人参加了辩论。他竭力反对以前的发言人，他是他这么多年来这么熟悉的Mr.——呃——，Mr.——，呃——简单的说，他反对两个中国委员被推为土地委员的事。一个人说话就够了。日本人和一两个白种人大大的鼓掌。实际上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仇视中国人的，但大会的提议通过了，

因为人人都懂得，委员会的位置给与中国人，并不是为了他们的美丽的斜眼睛的缘故……

也许反对人的意见，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白，让他们参与治理他们自己国家的行政的漂亮赠与，并非是毫无异议的颁赠的。也许记不起名字来的那位绅士，早就和第二个发言人商定了这个质问。无论如何，今天和十五年来的每一天一样，可以喝威士忌，掷骰子，因为继续了一个钟头的上海议会今年的年会，和平地结束了。

二 洋泾浜 (Pidgin) 英语，殖民地的语言

洋泾浜 (Pidgin) 英语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没有文法，只有可怜的极不完备的语汇。虽然它不能够正当的被称为人造的语言，但它也不是什么人的本国语。

在一个有将近一亿人口的地域里，这种语言做了白人主子和他们的有色人种的奴隶之间交谈手段。洋泾浜英语是一种不规范的英语；不规范到适合于欧洲人的口齿和有色人种苦力的脑子的程度。（这种情形，如同伶俐的成人和小孩谈着意义不分明的话一样。）有色人种的人们学会了讲这种适切的不规范的英语，讲得很流利，而外国商人在远东住了一生，对于中国话和印度话，总还是连一点最微小的知识也没有，甚至于洋泾浜英语也不能说。自然，他用不着懂得任何土话，毕竟他是欧洲人，是成人，同时是主子，而其他的人不过是小孩和苦力，是落后民族的成员。他们中间的千百万人现在已经可以流利地说欧洲语言，而且可以阅读西文书报的事实——这还是不能引起白种人的思

考；他所想着的还是意义不分明 的言语，因此，洋泾浜英语还是停留在他传授给他的居停们^①的那种知识的基础上。

别的人们也许会有下面这位绅士同样的经验，这位绅士命令他新雇的仆役开窗子，自然，说的是Pidgin——大概是这样。“Open window, understande?”（打开窗子，懂吗？）“Certainly, sir.”（好，先生。）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并接着说：“It would really be a pity not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pring air.”（不享受优美的春天的空气，的确是太可惜了。）

为着这句话，商人开除了这个仆人。用和绅士谈话的同样语言和苦力谈话，是他所不愿意的。

Pidgin，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是Business（商业）这个字的变体，商业是外国人和土人接触的一种活动，Pidgin在洋泾浜英语中是一个重要的字。但是从Pidgin的产生中也产生了其他重要的字，而且从表现这种语言里的观念上可以知道它的创造者和教授者的心思。

譬如，没有Give（给）这个字。“I give”不过是证券交易所的用语：我不给人家什么东西——谁给我什么东西！Give这个字译成洋泾浜英语是Pay（给予）。“Pay the missy tea”（给小姐一杯茶）。女主人这样吩咐她的仆役。得到这个吩咐，仆役决不会请她出去到茶馆里喝茶，他不过立刻递给她一杯茶。“Pay me a kiss.”（给我一个吻。）书记对大沪舞厅的舞女这样说，当他送她回去的时候。这话

^① 原稿为栖止、歇足之处，这里为当地主人之意。

是对的，在晚上，他花了这么多的钱买舞票，现在是姑娘给予他的时候了。

be (是) 怎么样？在商业活动中，这个字是不存在的。对苦力用is (是)？对货物用are (是)？不，他们都是be long(属于) I am(我是)thou ar (你是) he is(他是)——在洋泾浜英语中是：I be long (我属于) thou be longest (你属于) he be longs (他属于)。你这人不过是别人的所有物。I am sorry (我抱歉)这一句话，应该译成：My be long sorry (我的属于抱歉)。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东西是is，一切都是be longs。

数字没有变更吧？数字是够事务性的了，不是吗？不。在洋泾浜英语中你不说One, two, three 等等，你说One piece (一块)，two pieces (两块)，three pieces (三块) 等等。虽然白种人就是出于“原始”的智力，也可以省掉piece (件) 这个字。但他还是这样说——甚至于不定冠词也是‘piece’，One piece girly(一件姑娘)，仆人这样的通知。或者：“Two piece gentlemen were hereo (两件绅士来了)这也非常的对；人也是商品，因此都用piece来计算！

从古代起，庙宇装饰着雕像和香炉，屋宇装饰着彩绢和灯笼，女人们装饰着象牙梳和银胸饰。当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成了商品，连男人和女人也成了商品的时候，这些装饰能只当作装饰吗？当装饰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当外国人要它们，而且使它们成了一种最重要的商品时，祖先的坟墓和屋子里的装饰，会随随便便地丢弃吗？当外国人看来，这是奇物的时候，那在祖先看来，是平常的什物的东西，还依然是平常的什物吗？在洋泾浜英语中一切装饰有一个名字，

而且是一样东西：Curio (古董)。

最要紧的是要牢牢记着 ‘Kumsha’ ——外快——这个字。这个字的观念到处可以找到，但是在这里，这个字是从商业界得来，从 ‘Commission’ (佣金) 这个字变来的，或者——有一小半可能是——从Come ashore (上岸) 这个呼唤变来的。用这种呼唤，转运经纪人招呼过路的舢板靠岸，以便划到海船那里去。

‘Kumsha’ 是差人所要素的物事，‘Kumsha’ 是乞丐要素的物事，而商人和公吏却使用着正当的纯粹的英文用语：‘Squeeze’ (外快)。

有两个字是从葡萄牙人的时代开始使用的：一个是 ‘Savy’ 意思是“懂”，“知道”，“你知道吗”，另外一个 是 ‘Masky’ 在远东英语界和洋泾浜英语界，‘Masky’ 是常常使用的一个字；这是从道地的英语 ‘Never mind’ (没关系) 道地的俄语 ‘ничего’ (没关系) 和道地的德语 ‘Sch-eissgeal’^① 之间变化而来的。它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明白吗？——Masky!

任何小的物事都是 ‘Pony’ (小马)；‘Pony’，是利久酒的小酒杯，‘Pony’ 是小孩子，自然，‘Pony’ 也是那蒙古种小马，为了少许运动一下，主人在早晨骑着它跑一跑，因为不这样，运动的机会全被黄包车夫占去了。

‘Topside’ 的意思是上面，‘Bottomaide’ 的意思是下面 ‘Chop-chop’ ——一句广东话——意思是快，而

① 它的中文意思为 “(带咒骂语气) 完全一样的。无可无不可的，没关系的。”

‘Old’ 是老。

这样罗列了洋泾浜英语的字汇以后，现在我们可以重印它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只名叫‘Lo—Le—Ley’^①的歌。为了使读者容易懂些，我们在歌中保存着R这个字母，中国人——真是象小孩子一样——总把R读成L，因为他们觉察不出R和L之间的不同来——对于他们，两者都Masky。

歌是这样：

Oh my belong too much sorry
And then my no savy what kind
Have got one old piecy story
No wantchy go outside my mind.
That night belong dark and coolo
Rhine water maky flow all right,
Topside plenty stars very coolo
Looksy down in that eveniog Light.
One nice piecy girly sitting
Too much curio topside
Her golden hair she is fitting
Hethat curio belong very bright.
Fishing—pidgin—man pony piecy sampan
Belong very curio inside
He only'looksy topside girly

① 这是Lorelej在Pidgin英语中的变体。Lorelei 是德国故事中的莱因河女妖。她常常在莱因河岸的岩石上，唱美妙的歌，她的歌声和她的美丽，引诱着舟子，使他们触着暗礁。

He never looksy waterside,
Masky that pony piecy sampan
Go bottomsides very chop-chop
For foreley maky too muchy singsong
And anytime never can stop.

Savy? 要是不，你可以在任何书店买到这个洋泾浜英语歌的德文和英文的翻译^①。

只要稍微研究了各种文字的历史或原理的人，都会知道，熟谙洋泾浜英语是极有教益的。帝国主义在它的文字的创造上所作出的成就，是人们再也梦想不到的。

人们也许想知道，对于这种有心造出的文字的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是不是已经有了。没有。有文法、有字典吗？没有。它的全部文学不过是一本题名 *Piqgin Inqlis Tales* (洋泾浜英语故事) 的韵文，这是二十五年前在广东印行的。作者是一位幽默的“诗人”。用洋泾浜语言，他嘲弄一个把广告上的优待券错认做钞票的人力车夫，嘲弄一个缝合了一个英国水手外衣上面的破绽，就在招牌上大书“海陆军部指定成衣店”的成衣匠——一句话，他嘲弄着中国人的愚蠢，他嘲弄中国人，可是他们中间最蠢的人，在他们的臀部上所有的智慧，也比这位诗人和他的同类，在他们脑子里所有的智慧要多一点——我很抱歉，在兴奋中，我信口说了“脑子”这个不适当的字眼。

① 这首歌是海涅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所作长诗 *'Rethrn home'* 的第二段。E. A. Bowring 的英译是这样的。

In vain would I seek to discover
 Why sad and mournful am I,
 My thoughts without ceasing brood over
 A tale of the times gone by.
 The air is cool, and it darkleth,
 and calmly flows the Rhine,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sparkleth,
 while evening, 's sun down shine.
 You sits a wondrous maiden
 on high, a maiden fair,
 With bright golden jewels all-laden,
 She combs her golden hair.
 She combs it with comb all-golden
 And sings the while a song,
 How strange is that melody olden,
 As loudly it echoes along!
 It fills with wild terror the sailor
 At sea in his tiny skiff,
 He looks but on high, and grows paler,
 Nor sees the rock-irred cliff.
 The waves will the bark and its master
 At length swallow up, then me thought
 Tis Lore-ley who this disaster
 with her false singing hath wrought.

这英译歌如果译成中文，大意是这样：

我无法知道。
 我为什么忧愁，
 一个旧故事，
 老记在心头。

天空是微凉和黑暗，
莱因河在静静的流，
在落日的余辉里。
明耀是山头。

一个奇异的女郎，
一个美丽的女郎，高高的坐在山岩上，

她在梳她的金发，
她满身的金饰呵，是多么的明亮。

她用金梳梳她的金发，
她正在歌唱：
那嘹亮的回声传来，
是多么奇妙的古调！

歌声惊骇了舟子，
在海上，在他的小舟里；
他老望着上面，脸更苍白了，
他看不见岩石环抱的绝壁。
波浪终于吞没了小舟和舟主，
于是我想，这是那莱因河上的女妖，
是她，用她那迷人的歌唱，
造成了这次灾难。

三 “那里是海边！”

到了晚上，港口是属于通常称为Gob和leatherneck的
美国水手和水兵的，纵令酒馆里也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兵士，而

且占多数，但也还是没有人敢于反驳这事实。其他国家的海军里的水兵是在服兵役，因为他们是在服义务兵役，每天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分配物；而美国人却是志愿从军的，他们拿着适当的然而的确是很好的薪俸，自然是实实在在的美金。“在你赚钱的时候学习”，招募新兵的传单，这样写着。

你的钱越多，姑娘们就越爱你，这情形，在中国和在莱茵河上是一样的确实，在水上和在陆上是一样的确实。酒馆主人欢迎美国水兵和水手，不大欢迎非美国的水手，也为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了禁令的缘故。船上没有酒，港口酒很多；在船上，美国的海军中没有一个醉汉，在港口，美国的海军中没有一个清醒的人。

酒馆主人也是美国人，也是水手，但他们已经不再能够说美国护照和美国海军制服是他们自己的了——使一个美国人成为一个美国人，一个水手成为一个水手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他们怎样失去了他们的护照和制服的呢？因为他们是逃兵。实际上，他们就连逃兵也不是，因为逃兵这概念，包含了下面这意思：逃兵离开他的部队是瞒了他的长官的，而且陆军或海军当局，要缉拿他。可是，这酒馆主人的离开他们的部队，不但没有瞒着他们的长官，而且甚至是奉了他们长官的明令的，海军当局也根本不要缉拿他们。他们是合法的逃兵，这是别的国家的海军里面和犯罪学上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的情形是这样：他们以前是一艘美国兵舰上的水手，但完全不是令人满意的水手。他们用赌博或是同性性欲的习癖，或是以很高的利率放债，去腐化他们的伙伴。直到有一天，事情闹到这样的程度，舰长叫了他们来，向他们指

着栏杆那面，指着下一个锚泊港的方向。

“那里是海边，”舰长说，“那里是海边。”

于是这个人就这样被暗示到海边上岸去了。他不再回到船上来，却走到最近的酒店主人那里，把他和美国海军的职业上金钱或感情上的种种关系，和他对于赌博技术的精通——事实上是把他“在赚钱的时候学习”的一切，献给酒店主人，听他使用。

有什么酒馆主人不愿意雇请一个替他带来了新顾客，而且除了分佣金以外不用付给薪金的合作者呢？要是这位寻求职业的人越了分，那他就会得不到什么，但是他没有越份，他的百分佣金使他有个可观的收入，此外，他还可以从赌博和放债中得到利钱，于是，这位以前的水手自己不久也成了老板。要是可能，就在上海。上海是太平洋上最好的地点，比香港、西贡、马尼拉和新加坡加在一道，还要好一点：在那里常常有军用铁丝网的出现，那里常常麇集着各级船员，对于他们，我们的朋友是知道怎样去诈骗的。

水兵们穿着他们白色的短衣，斜戴着他们那白色的厨子帽，和他在一道。他教那些二等水手、火夫和三等炮手去喝各种各样的混合酒，去把他们三十二元美金的月薪，信托于两粒骰子的赌博。要是来赌的人是一个外行的话，那这两粒骰子所起的变化，比平常从两粒骰子上面所能期望的，要多得多。可是，人学习到这个，不只是在赚钱的时候，也在丢钱的时候。

资格较老的船员也到酒吧间来。他们老早学会了骰子戏是怎样玩的。为着证实他们的知识，他们那么猛烈的击着骰子筒，使柜台有裂成两段的危险。他们一个月的薪金，远远

的超过了三十二元美金。他们每个人的制服表露了他们在喝酒上，或是赌博上，或是青春的爱情上可以花费多少钱。白色的飞鹰同样在每一个袖子上扑着翅膀，但缝在那下面的物件，却是各色各样的，而且精确的表露了酒吧间主人可以从他身上赚到多少现钱。带着红袖章，缝着轮船推进器的，是轮机间的运转士，薪俸美金四十二元。水手长的助手缝着一个舵轮，薪俸四十七元。炮手长有两个交叉着的炮身和三道袖章，一个月可以有九十八元美金来作骰子戏的赌注。主任铜器师和主任电气工程师有一百一十元美金，而准士官有一百五十六元美金之多。

所有顾客中最受欢迎的，是服满了四年兵役，而且准备继续报效的人们。现在，他们有六个星期的假期，口袋里又有四个月的薪水。还有川资，川资每一哩只有五分钱，但是合计起来，数目就大了，因为从上海到巴尔的摩尔^①的航行是好几千哩。这航行根本不会有，这笔川资就花在从上海到上海的途次中。这种可以自由登陆的水手，买一套平民衣服，充作平民，却在水手的酒馆里用水手的谈吐和水手们谈话，在骰子上输去水手的钱。不同的只有一点，对于他，登岸的自由不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结束，他可以随便长久的去喝酒和掷骰子；他根本用不着上船，他——所有的伙伴都羡慕他——可以随便睡在哪里。

但是美国海军执政所采用的，称为教育学上的杰作的节俭的教诲，是怎样的呢？那是这样的：差不多每一个水手都得留下他薪水的一部分不领。议定的这数目，这薪金的一部

① 美国马里兰的人口。

分，每个月由军需官汇到一家银行去，通常总是旧金山的意大利银行。要是水手需要一笔特别的费用，竟至负了债——军需官还是只知道章程，不知道怜悯：薪金的一部分还是要扣下，汇到旧金山去。

军需官方面对于上海酒馆主人的顾客的这种严格，对于酒馆主人是一点也没有有什么不便的。譬如，一个有偿付能力的海员要用他的储金的一张票据来偿付他的账务时，酒馆主人耸耸他的肩头，喃喃地说，他不同意，他接到从旧金山来的现钱要好几个星期，而鬼知道下个月美金的兑价会低到怎样的程度（好象美金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标记，或者好象中国银币有着一种向上涨的空前未有的能力一样）。到末了，他同意把票据打个对折收下——而他却在任何银行十足的兑了现。

对于水手，打对折就足够了；只要这数目容许他在圣乔治舞厅买得到够多的舞票，够他那天晚上整夜的跳舞，或者容许他在朱葆三路那条灯火辉煌的喧闹的小街上，找到一个白俄，从她那里， he 可以用他的储蓄，他的学习的时候赚来的钱作交换，得到一个纪念物，带回家去。

被踢脚指使的黄包车夫，每天晚上拉着水手们从一个酒吧间到另一个酒吧间奔驰着，他们得到两角半至五角美金的车资。为了在中国的地位，美国牺牲了几百万元。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凭借着黄包车夫们，得到了这笔钱的一点儿余沥。

感 化 寺

我亲爱的儿子：

我写信来极力劝你一定要努力避免堕落。

突然接到我，你的父亲的这种非常严格的忠告，你一定会很惊讶。你知道你父亲的生活态度和这一种道德上的劝戒，是并不调和的。实在的，我的儿子，从今天起我知道了有可怕的惩罚在等着我。我要逃避它们是太迟了——也许悔悟还不太迟罢，但要戒绝我那爱好的罪恶，是太迟了……

但是你，我亲爱的儿子，你听从这劝导，学习我现在所学到的事情罢。你所犯的每一桩罪恶，你所耽溺的每一种恶习，你所牵涉的每一种堕落，你所陷入的每一种恶行，你所违背的每一个命令，你所干的每一种淫为，都会得到它适当的报应的。

今天我在几组着色的塑像身上学到了这些。它们不是艺术品——在外国人为了我们的艺术品贪婪地来到的中国，在每一个烛台，每一个花瓶，每一件玩具——一句话，每一样东西——都表现了我们祖先的传统和匠人的匠心的我们这中国，只有今天我所凝望的这些塑像，是完全没有一点风趣的塑成的。我一生中，为了劝诱和尚执事出让他们的圣像圣器，到过许许多多的庙宇——今天我到“十八地狱”庙去的时候，是第一次，我找不到一样便于转卖的东西。

这个庙里的塑像，真正是外国古董商人——普通总是站在一件真的艺术品前面的时候——所说的不值一钱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特别的几千年的国度里的一切，都有他的特别的几千年的意义。不值一钱的东西也是一样。在这里我要说明：这一组一组的塑像，不是出于艺人的想象，它们象征着纯粹的，赤裸裸的，毫无修饰的，真正的现实。

是的，我的儿子，现实。一想到今天我所看到的東西，我的心还在跳，我的手还在颤，我的腿还在发抖；一想到明天等待着我的东西，我的心更跳得厉害，我的腿更抖得厉害了。

我请求你，我的儿子，避免罪恶。避免它。间或也听一听我这父亲的忠告罢，这样，你将不必用利息和复利来报偿每一次的失足。

有一点是实在的，会有这样的一天，在意志薄弱的时候，你会失悔你听了我现在忠告。那时候你也许会遗憾地想起你不必要的还清了的那些债务，想起你洁身自好的没有诱惑的那些姑娘。“哦，为什么我要放着这种享受不享受呢”，你会不知不觉地这样想，“都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写给我的充满了道学狂言的那一封信的缘故！我万万不该听从他的忠告！”

在那时候，我的儿子，在将来你会咒骂我的那种时候，来吧，到北平来，去证实我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的信上告诫你的话是正确的，而且想想你的可怜的父亲罢，他死后的命运，你会在那里，在你眼前的塑像身上看到。

为了你到北平来的这种过迟的巡礼，我要把到那庙里去的路径写明给你，我刚刚从那里回来，我的牙齿还在象一个疯子手里的铜锣一样震颤得发响。

洋车夫并不高兴拉你到那里去，他害怕那地狱里的鬼怪聚集的地方。大概他会把你朝东拉过齐化门^①，但是他会在东岳庙前面的马路左边停下。

这不是你所需要的庙——除非你真正是上天不容的患了一种疾病。只有在那种时候，你挤过“龟庭”里面的人群，去摸一摸铜马上面相当于你身上患处的那个地方，于是在那用木头雕成比活人还大的你的许多同患者一道蹲在里面的壁龛面前祈祷和祭奠。要是使你苦恼的，不过是一个疮，那只要在那适当的菩萨身上的适当的地方贴一个膏药就行了。你会立刻认出那适当的地方，那里贴满了膏药，鼻子上、腋窝下，颈子上、腿子后面，到处都贴了。万一你在马路上伤了风，或是得了腹痛病，眼睛发了炎，或是患了可以说是由于爱情引起的病症（但是不，后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虽然你不是木头做成的，你却正是为着摒弃快乐而到这里来的），那么，你走到用木头做成的那群同病者那里去罢。触一触菩萨身上相当于你身上觉得疼痛的地方，眼睛痛触眼睛，牙痛触牙齿，手足痛触手足，你便会好起来的。

以后，从那里走开。朝东走一百步，顺右手走到马路的对面。只要在一边挤着那伸出枯瘦的手的烂眼睛的患麻疯的乞丐，你进这窄门时就要付出代价。以后你就到了“十八地狱”，那有着十八层地狱的庙里。在那里，地狱里面分别管理着各个区域的许许多多的公吏，包围着你，缠绕着你。

一个方场。一个房子的方阵。有十八间和临着天井的大殿的长长的高度相同的四座房子围绕着的方场。十八个地狱里有野兽，大群的观光者站满了它们前面的空地。这野兽并

^① 今朝阳门。

不是活的野兽，而是用那雕刻的着色的木头做成的。观光者不是动物园里的怀着兴味的观光者，他们都是战战兢兢的忏悔者。你可以清楚地说出他们是在忏悔哪一种罪，因为他们各自站在描摹了惩罚他们罪过的兽穴前面。

他并不怕由于他的行为暴露了自己，他也不斜眼看他近边的人。由于近边的人好象是他同伴一样的站在那里祈祷和祭奠的这事实，表露了他们也是他的同罪者，他的共同谋杀者，他的盗贼同伙，或是更坏的什么。他注视着他来世的运命，一种恐怖的注视。

但是你的注视，我的儿子，不必含着恐怖。你面前所描摹的运命，没有一样会在来世降临到你身上。藉着我的父亲般的告诫，你避免了这种运命。我，你的父亲，却没有能避免，因为我的父亲没有让我注意这座在重压下引起人沉思的庙宇。你还会失悔你避免了罪恶吗？

或者，你以为你犯罪可以不被看见吧？十八位阎王的头上都有无数的眼睛，不是外国魔鬼那种横的，向外突出，看不见东西的眼睛，而是斜的，切口一样的，锐敏的眼睛。他的角上有眼睛，他的头发里面和那围在他颈上的皮领子上面都有眼睛——我可以打赌，就是在观光者看不见的那一边，他也一定有眼睛。你做的事，没有一样可以逃出这么多眼睛的。而且每一件事都在阎王旁边的大账簿上记下来了。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负债的登录从来不可能被忘却。负债者要用他们的苦难去清偿债务。

地狱里面的宠臣们，那些生着狗鼻子和蛤蟆嘴的怪物（大概是阎罗王的穷亲戚）执行着刑罚。有一个人的心被挖了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坏奴仆，而且从他主人那里逃跑了。

另外一个人被割掉了舌头，这个长长的象蛇一样的舌头盘曲在行刑者的手上，这是一个说谎的，欺诈的舌头。看那里，看他！他们拖着他的头发，把他拖到断头台，已经有另外两个人跪在那里，刽子手已经处决了他们，他们的头躺在他们的脚边。也许他们是改革家和煽动家罢？要是这样，那他们活该！

但是这个小小的孩子——这个被那狗鼻子、蛤蟆嘴的胥吏，用一个木头压榨机压扁了的孩子，到底能犯什么罪呢？这孩子没有犯罪，他的被压榨，不过是为着他父母的一种惩罚——我希望，我的儿子，你不会因为我的缘故也遭受这种非人的酷刑。我将会非常懊悔。但是，象那孩子一样地死去，比象隔壁的一群——剥了你的皮，总好一点：有着耳目口鼻的脸相也同样的悬挂在半裸的剥了的手臂上。

千万不要在你头发上涂油膏罢！这位年轻人，他们把他挂在天花板上，这样，他生平用去梳理他头发的所有油脂，都会流尽。一个尅扣斤两的商人——阴间的无赖把他反曲起来，一直曲到能够把他的颈子系在他的脚踝上，于是用一根绳子把他吊在屋顶上，在那里，他好象一位演杂技的人一样摆动着。同时——他还吊了一个秤锤：他骗取了多少斤两，秤锤就有多少斤两重。悲哉！

三个人被强逼爬进一个烧得通红的管子里去，前面一个是女人，后面两个是和她有关系的男子。这就是通奸的代价。悲哉，悲哉！

这里有一个男子，他的头插进了这地狱的大锅里。那里有一个嵌在裂开的树干里的人在和树一道被锯断。这里两个不贞的女人，一个穿青衣的妻，一个穿红衣的妾，在被迫吃

掉她们的情人。这是在惩罚她们呢，还是在惩罚她的情人，不大明白；但是，两个女人脸上的神色无疑的是不愉快的。男子的面部已经被吃掉了，因此，观光者无从判断他的表情。重利盘剥者和伪证者被人滚下一座插满尖刀的山坡。悲哉，悲哉！

生时没有清偿期票的人，不要以为死会解除他的债务。哦，不！每一个小钱都要用肉体的一部来抵偿。这是地狱的通货。要是肉体的各部不够抵消所有的票据的话，那么，不足之数一定要在来生去补偿。在来生，负债者会生做一个残废的人。这里有两个负债者跪着，在他们旁边，债主把那早过了期却还没有清偿的期票呈给阴司的判官；同时，地狱里的猎狗——露出本相的地方审判厅的皂隶——贪婪地把它们的爪子伸向所有可以撕裂的肉体。

一对淫荡的男女，他们睡在那里，正象他们平常睡着的那样。但是这一回他们不是躺在有着柔软的枕头有着柔软的鸭绒垫被的“炕”上，他们是躺在一块铁板上，在那上面燉煨，熬煎，一直到他们失掉了他们的视觉和听觉，最后，连他们的触觉也失掉了的时候。

可怕的，使人麻痹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那第十八层地狱里，在那一切地狱的地狱里继续着，阎王坐在这里，手里拿着笏和决算表，对带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个人，判定他再去投生的时候，他该做个什么东西。

带着狞笑和嘲弄，差役把判决传给一个罪人。判决是一块破碎的骆驼皮，这表明来生他要做骆驼。第二个将要变成一个暴烈而又不无危险的老虎。对第三个，他们递送着一张鱼皮，使人想起了他的服装的款式。你也不会愿意披那第四

张皮的，那是一张野兔皮。

在极左边站着一个人，他们带着恶意的满足看着他，交给他一张患疥癣的老鼠皮——不，这不是一张毛皮，是布满了出脓的毒疮的一张老鼠的没有毛的秃皮，因为这个人反叛了元首、政府和僧侣。

你可以亲身看到，在中国阳间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所要忍受的刑罚——最近有五个二十岁的诗人被活埋了，——比起这种犯罪，在中国阴间通常所遭受的刑罚来，还要合乎人道一点。

凭着一切神鬼的名义，我的儿子，要服从元首，服从政府，服从僧侣，永远不要怀疑他们的权力，这样，在你死后，你可以重新回到人间来做一个公民和纳税者。

要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有什么患疥癣的、秃皮的老鼠在你面前跑过的话，你可以十分清醒地参加追捕，以扑灭这种可恶的丑类，因为你听从你恳切的父亲的忠告，永远做一个统治当局的忠仆。

你的慈爱的父亲白洛游 上海买办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北平

附白：要是由于你终生弃绝娱乐的结果，看到这种惨象，你会体验到某种性的快感（象今天和我一道参观一个惩戒寺的几个青年人一样）的话，那你不必烦恼，淫虐狂似乎不是一种该被惩罚的犯罪，相反的，所有的鬼都公开的沉溺于此道，而且也许他们对于有同样倾向的靠他庇护的人，比较的怀着好意。

堆 栈

这里人们所看到和所听到的，尤其是嗅到的一切，简直太混杂了。斜架的跳板和平台，以及高架着的跳板，把各种各样的堆栈联成一个莫大的混合体。负着重物的苦力蹒跚地走下倾斜的跳板：“咧拉，咻拉，”前面的人这样地唱，“我来了，走开。”“咻拉，汉拉，”后面的人这样应和着，“走开，让我过去。”

咧拉，咻拉

咻拉，汉拉

这种恳求不是特别对我们，也不是特别对任何人而发的，当他们并不要使什么人注意他们来了的时候，当他们并不要请什么人走开让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地唱着。在他们负着重物，以细小而快捷的摇摆的步子走着的时候，或是在他们——这是上海特殊的街景——五个或十个一道拉着一辆载重大车，拉得身子差不多俯到了地面的时候，他们都哼着这个调子。这同一的六个音节，在这倾斜的道路上无尽的嗡嗡地传开去。

咧拉

咻拉

汉拉

每隔几分钟，这苦力的歌唱，会被轮船汽笛的尖叫声吞没。船只和堆栈并列着：在百老汇路，在杨树浦路，在地价比公共租界便宜许多的浦东。

堆栈在这里被写为和被称为go down(下去)，这个字使人想起狄更斯时代一个有颊须的伦敦商人的形象，他叫他的学徒到地下室去拿一捆衬衫布料上来——go down。

但是上海的go down和英文中的go down没有关系。这个词是从马来话‘gadogn’来的：人不要下‘godown’，人要上‘godown’，这不是家长制时代的地下贮藏室，而是最现代的混凝土造成的建筑物。要是这中间有什么可以使人想起狄更斯时代的事物的话，那就是劳动状况。上海的伦敦商人，坚执着狄更斯时代的劳动状况，而且根本不想去改变它，连他们在英国已经改变了的那种样子都不使它达到。

关于上海的工厂，有发表的统计和社会调查的结果可以查考，但是关于堆栈，却简直没有文字资料，虽然在中国制造的东西，比在商业流通过程中的东西要少得多，而这一切的流通是首先在堆栈里面进行的。

有的出口商号有自己的堆栈；有的堆栈属于房产公司或转运公司。它们把房屋出租给各种贸易部门的商号，因此，绕着一系列的堆栈走一遍以后，人们差不多可以明了外国贸易的整个结构和许多工作的方式。

门都敞开着，货物在搬运进去，由苦力用竹扁担挑着运送。苦力背着棉子包，喘息着在斜架着的跳板上走。

汉拉

咻拉

咧拉

他们在辛苦的工作，而接受他们运来的货物的工人们也是一样的辛苦，不停不息地。他们的脚踏动旋转的机器，不停不息的，棉子冲击着轮盘，落了出来。剩在里面的只是以前黏着在棉子核上的茸毛。这是一切棉料中最没有价值，却还要作为加工之用的东西。茸毛和尘埃在空中飞旋着。要去污的棉堆沿墙壁堆放着，也到处散布着絮毛。工人们在这灰色的棉堆上吃饭，而那些还不能工作的小孩子们，在棉堆的四周游戏。

隔壁是梳化间。从纺织厂运来的棉纱的残屑、羊毛和棉花，由女人和孩子们按照颜色和品质分类拣开，再把它们撕碎后归堆，这正和造纸厂里处理碎布一样。

苦力们负着一包一包没有分类的碎屑走了上来。

汉拉

咻拉

咧拉

苦力们负着已经分类的材料走了下去。

咧拉

咻拉

汉拉

从那把山羊、鹿、伶鼬和家兔的毛皮装成包的长长的堆栈里，腐肉和石脑油精的臭气透入了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和每一个走廊，也在斜架着的跳板上飘浮，并且同棉屑羽毛的尘芥和肠子以及院子里的油潭的气味，同那系在建筑物旁边的轮船的烟掺和在一起。

女人和孩子们坐在篮子上，坐在篮子的前面，在从那丝厂运来的残屑里拣出蚕茧碎屑，准备作为工厂加工之用。

羽毛垫褥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从长江流域运来的千千万万的鸭子在春天被宰杀了，它们的羽毛不是拔掉的，是被人放在开水里面浸过，因此羽毛连着它们自己的——当然，常常是这样，一片片的皮，同时连着脚蹼和嘴壳一道脱落下来。羽毛放在户外晒干，在这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把它们翻转，以使它们不致于在中国太阳的热力之下晒焦，甚至于着火。之后，它们被人踩紧，装成一百五十斤至两百斤（九十至一百二十公斤）一包。许许多多的鸭子繁殖在沼泽很多的中国。许多商人，白种人和黄种人，埋伏着等待它们的羽毛。银行垫钱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垫钱给经理人，经理人垫钱给收买者，收买者垫钱给喂养者。钱是这样的流转，而货物朝着相反的方向流转。

现在它们在堆栈里了。除了做肥料以外没有别的用处的翅膀上的尾羽被拣出来了，其余的，被人拿到编织的筛子上，清除羽毛上面的污浊物，白垩，甲壳的碎片和沙子。尘芥和羽絮腾成了浓雾。所有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嘴上都扎着一块布，要不然他们会呛死——最新式的混凝土建筑物没有通气孔，也没有消除尘芥的装置。

茸毛和羽毛用水压力压成了三百斤重的包裹（一百八十

公斤，约值三百五十元）。当压榨机的板相互移近的时候，机器拉出一张厚密的覆盖物掩包在羽毛上面，而湿的稻草绳和铁带子把它们紧紧扎住。

许多苦力把这沉重的羽毛包挑在他们的竹扁担上，于是压弯着腰，单行从堆栈走下通到外洋轮船上去的跳板，而粗陋地缝起来的装着不洁的羽毛的袋子从内河轮船上运进堆栈。苦力交替的歌唱，在跳板上混和着：

咧拉 汉拉
 咪拉
咧拉 汉拉

肠子的贸易在堆栈里也有它的位置，而且对那难于忍受的臭气的音阶献出了一些音程。中国不制造腊肠，所有的肠子都可以运到欧洲去。它们从内地，从那出产它们的动物的地方运到这里来。人们从肠口灌进水去，一直到它们紧紧绷起的时候。凡是有肿瘤的地方，就被割掉了，这样，整个肠子就有着整齐划一的圆径。工人穿着木屐站在木格上，水常常浸到膝头。当他们量着肠子，割切它们，而且把它们装进密不通风的琵琶桶里的时候，空气里充满了动物的腐败物和肠子里面原有的气味。这里没有小孩子工作，臭气是使成人也要呕吐的。我们不能断定，轮船汽笛的尖叫声，是使得我们更加接近晕厥呢，还是使得我们免掉了昏迷。

从伦敦船坞散布于各街道间的气味，在这里是聚集在一个房子里的。这个房子比伦敦的造船所要现代化得多。泰晤士河流域很少有这种带着平静的威严，耸立空间的花岗石色

的灿烂的房屋正面，也很少有这种用水门汀筑成的通路。而另一方面，伦敦的船坞里，到处装备着强大的用沉重的木料造成的升降机，用电操纵的起重机，一直通到堆栈里面的铁路，和整套的运输小车；在黄浦江边，这一类的东西通通没有。就是五百年前在欧洲港口的木框屋端突出来的起货机的托梁，也还没有为了上海这个大城市发明出来。

比最廉价的机械还要廉价得多的，是中国人：他的手是升降机，他的手臂是链条，他的肩是运输小车，他的腿是铁路——这些机械不需要机械师，不需要燃料，而且即使这些机械有了什么故障，也并不花费雇主什么。

混乱代替了规则，武装代替了机械，鸦片烟代替了食物，传教师代替了教师，巡捕代替了工会——这是欧洲给中国的赠与。看一下，听一下，嗅一下和感觉一下堆栈里面的这种生活罢：看那棉花的灰屑和羽毛的飞绒里面的小孩子们，听那负着重物的苦力们的嗡嗡歌唱，嗅那肠子和皮革的气味，觉察那西方文明在这里施与了和没有施与的一切罢。

堆栈只有在包藏食料的地方是干净的。单单是英国，一天要喝一亿杯茶，这都是从中国和锡兰运去的。茶叶的栈房加了特别的装备：通气孔，木质的地板——这不会如混凝土地板一样的发潮。在茶山里面，采茶者——他们一天采摘十五磅茶叶，得工资六分至八分——为着英国的喝茶者也许不会那么考究，但在栈房里却有细筛，和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在工作，这样，使得那等待装运的茶叶上面不会留下一点细小的泥砂。

在蛋的栈房里，在那属于美国商号的，漂亮的光线适宜的建筑物里，卫生学同样的施展着威力——一切都是为了商品

的利益，为了顾客的利益，为了顾客的胃的利益。工人们系着白色围裙，打蛋的桌子，通常是崭新的，那把蛋黄从蛋白里分离出来准备运送到制作鸡蛋面条、通心粉、和蛋黄酱的工厂去的干燥室，也是一样的。

苦力们负了装有这种容易破碎的货物的沉重的箱子，从栈房的冷藏处，通过码头的夏天的光焰，走下轮船的冰藏库。

咧拉

咻拉

汉拉

走过通道的时候，每个苦力接到一根小小的竹签。他把这竹签交给工头，得着固定工资的工头，依照交来的竹签数目，付出铜板。在堆栈里，上面盖着公司戳记的竹签是工资的标记；普遍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赚七十个铜板。

饮水筒由饭铺供给，在对面房子的门口，或是在一个街头负贩者的肩上可以找到。伙食从饭铺里拿来，一碗饭，几滴绿色和红色的酱汁，一个粉团，要十二个铜板。和这一道，他们喝着用一个铜板买来的开水，要不然，就用砖茶，这是质料最低劣的东西——捏成小球的茶屑。

我们在学校里知道的，住在欧洲，有着洁白的肌肤，坦白真诚的眼睛，高大的鼻子，和完美体格的印度，德国，高加索人种的例子，在堆栈里很少看到。这种人也有，他们是只做会计员和监督人的，在蒙古——中国人种只换一次班的时间里，他们要换两次班。

我们看见一个苦力，被他的同伴围绕着，听从着他们的吩咐，他正在用棉布和黄麻包扎他的刚刚压坏了的两个手指。

应急治疗的事——且不要说包扎受伤的处所吧——这里是不加考虑的；但是，对于火灾，却有充分的戒备。这里有水龙软管的设备，水管口是用软铅封住的，要是失火的时候，软铅会立刻熔化，水会自动的淋漓着房子。

下面停着许多独轮小车，等着三四个大人或是七八个孩子坐在车轮的两边，被推回家去。

这些成熟了的和没有成熟的乘客的头，无力的垂在他们的胸前。他们的手臂无力的垂着，这些手臂曾经把中国的出口货物装运到欧洲和美国，茸毛做枕头，蛋黄做蛋黄酱，肠衣做腊肠，丝做衣衫，毛皮做毛皮衣服。

南 京

什么，南京是一座沉闷的城池吗？

我完全不能同意，相反的，我觉得它是多刺激而又有教益的。比如，今天——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我们看见准备开上战场的许多军队，通过中山路，走了好几个钟头。

那么，这有什么呢？马路是为了（军队！）运输而筑的——这不是新的事实——而中山路就不过是一条马路。

中山路并不就是一条马路；中山同时是孙逸仙流传远近的战斗的名字，为了纪念他，马路起了这名字。

为什么军队不该从一个起了孙逸仙名字的马路上通过呢？难道孙逸仙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吗？他不是国内战争中的元帅吗？要是他还活着在世的话，他不会亲自带领军队通过这条马路吗？

诚然，军队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路是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孙逸仙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国内战争中的元帅，而他，要是他还活着在世的话，是会亲自带领军队通过这条马路的。但是，决不会带领这些军队。

不会带领这些军队？但那不是十九路军吗？那不是六个月以前在上海和日本人敌，而且使日本停止了前进的十九路军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那不是孙逸仙的精神吗？

是的，那是孙逸仙的精神。但是现在他们是开去打苏区，而他们从中山路经过，从孙逸仙的马路经过。那也不算

什么吗？孙逸仙说过，每一个共产党的敌人也就是国民党的敌人，那是应该攻击的。他的信仰宣言——那使他招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恨和他们用着英国武器的武力抵抗的信仰宣言，是怎样说的？“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新的生活开始了。因此，让我们今天来祝贺这革命，而且让我们摹仿俄国人罢。”苏维埃俄国人，中国得了他们帮助建国之劳，而且受了他们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惠的苏维埃俄国人，不只是在政治上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模范，不，在军事上也是一样：“俄国的红军得做你们的模范！”检阅广东政府的军队的时候，孙逸仙对他们这样地大声说着。

而现在，军队是在开去攻打中国的红军。一个月以前，他们从上海近郊被调到南京。为了整顿的目的，每一个人的心和肺都受了检验——当然，并不是医学意味上的检验。凡是思想稍微表露出一一点不能做盲目的反动工具的人——就要毫不客气的被革除。被革除的人由其他部队的可靠分子补充了。家喻户晓的旧名称却依旧保留：十九路军。一切都驯顺地照办了，每个人都严格的依照德国军官，那军事“顾问”的训练，驯顺地受了训谕。有三十个德国神圣共和国的军官，他们和保尔上校一同过来，而且取得了蒋介石的信赖。最初，协约国害怕德国人给他们同国的实业家订立过多的军事合同。但这一事实终究是否发生，目前在列强看来并不怎样重要，因为德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是不会失掉国际帝国主义的欢心的。无论如何，这个职位，要是换了美国军事专家来担任，对于英国会没有这么方便，要是换了法国军事专家呢，对于美国怕也没有这么方便。

在没有装备，没有训练的情况下，公然抵抗了日军的十

九路军，它现在的装备和训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已经可以开去打中国，打那正在和平的进行他们的建设工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国人，没有鸦片烟，没有私人银行，没有儿童劳动，没有贩卖儿童，没有传教师，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土匪将军，没有贿赂的苏区了。

在这里，在我们面前跨着步子走过的许多士兵，我们曾在闸北的避弹工事里会见过，但是我们不认识他们了，他们装束得是这样漂亮了。

不，不，南京再也不是一座沉闷的城池！就是不离开中山路，也可以看到一切种类的物事。

蓝灰色的葛巾制服，绑腿，皮带，象澳大利亚的皇家军队所戴的高帽子：只是那缕着佛兰兹·约瑟夫皇帝的姓名首字母：F.J.I.的帽章换了国民党的蓝色太阳的帽徽。要是在每个兵士的背上，没有上下颤动的一大堆遮挡太阳的柳条编制物，而且没有系在每一个人的腰带上，以备在冷水里或是温热的茶水里浸湿去擦汗的手巾的话，这些纵队，可以看成欧洲的军队。军官们都携着手电筒，是那么大的手电筒，看去倒象将军们的指挥棒。是谁设法把这些军需品骗卖给中国人的呢？手电筒是中国新式军队最惹目的特色，正象军用水壶是日本军队的最惹目的特色一样。小孩样的兵士们的胸口上，都佩了一个奖章。装备和训练都完全了——现在是开去打你们的同胞和阶级兄弟；尽你们的可能多杀他们一些吧，这样你们会再得一颗奖章的。

他们走了，官方很高兴。虽然十九路军已经洗刷过，但究竟还是十九路军。各级军官，还有很多在上海参战的士

兵，他们没有奉南京的命令，就截住了日军进攻的路，而且不执行南京的投降条约。蒋介石，在那由他的卫队护卫着的军事学校里面的他的堡垒上，向外看着，安心地舒了一口气；财政部长孔祥熙，从他的北极阁别墅里朝外面窥着，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国民党中央所有一切短小精悍的委员们，和列强的公使们（这些公使自己都住在北京，到政府所在地要两天火车），大家都安心地舒了一口气；看着这开走的军队，人人都安心地舒了一口气。

军队在下关码头，上了那系在岸边的古老的柠檬色的扬子江的民船。最新式的炮舰停泊在大江的中心。要是运兵船上发生了骚扰的话，炮舰上会以更加大的骚扰对付他们。平静证实了这点。第六十一师已经上船了，第六十师和七十八师正经过我们身边，到码头去。而明天，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就可以称赏不已地报告，十九路军最后一半已经毫无意外的从南京开出，正在向苏区进发的途中。

在一切官方记录中，“苏区”和“共产党”这些字眼是不能不加引号而使用的。孙逸仙是过于强调地说过，每一个共产党的敌人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因此，当“共产党”是意味着没有引号的共产党的时候，总是指称有着引号的“共产党”。但最好是称赤匪。称赤匪就用不着引号；相反的，用了引号倒是一种该被惩罚的罪过。这种用语连在中国刊行的英国报纸也采用了；在他们看来，赤匪和共产党是一样的，而且要他们规定有引号的“共产党”和没有引号的共产党之间的差别，也很困难。

中国法院，总是用下面这一个公式来定共产党人的罪行：“因有反动活动。”这样，法官宣告判决，大意谓被告

显然曾参与反动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他曾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银行的统治权，反对放高利贷者，而且反对鸦片烟。

十九路军现在开上战场去，就是去进攻这种反动分子的。已经有大批的军队抱着这同一的目的开到了江西省。一九三〇年九月，有一个包含了一支英国的，一支美国的，三支日本的和一支意大利的炮舰的和睦的军团，开去打长沙；当美国、日本（它派了三只兵舰），英国和意大利决定去镇压“反动”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切争执很快都被忘却了。

虽然是这样，苏维埃还是在扩张它们的区域，那时候，苏区已经有了五千万人口。虽然是这样？正是因为这样呀！国民党为了它本身的目的，请外国军队去打中国人的这事实，连苏区以外的中立的农民，也被激怒了。

因此，再来第二次是不行了。南京政府应该表示它能做什么。一九三一年二月，江西开始“围剿”红军的时候，用了军政部长何应钦阁下亲自指挥之下的十五师兵力。到六月，“上帝的选民”去援助他：蒋介石率领了三十万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兵力调去进攻单独一个省的。

一种没有引号的围剿。被围剿的是乡村，围剿了留在乡村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围剿了畜产和田地里的收成。只有一样东西却是围剿不了的：红军。红军是农民组织的，三个人里面至多一个人有枪，每一支枪不过两发子弹。用了这样的武装，他们却和具备了二五六尊欧洲的野炮，一二架飞机，还有机关枪和外国战略专家的一支军队，作了长长六个月的游击战争。终于，国民党的师团被驱逐了，正和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保王党亡命客的干涉军队，被法国革命中的共和

主义激烈派的青年军队所驱逐，正和法—英—美—德—捷—日—白卫军的军队和舰队，被布尔什维克逐出了俄国一样。这是事实的例证：就是技术的优越成为唯一决定的标准，只有在战争的结果对两军的阶级利益都是一样的時候。在国民政府和人民对抗的战争中，阶级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在红军夺获的战利品中，有三架飞机，飞机遮上了一个防护的顶盖，直到今天，还是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没有人能够驾驶它们，这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报纸不绝嘲笑的事。政府的军队败北以后两个月，“停止征剿”被宣布了，理由是日军占领了满洲，使民族利害集中在外敌身上的事，成了必要。回来以后，军政部长何应钦阁下，在国民党第四次大会上，说明了整个军队竟连一个革命的省分也不能攻克的理由：“被赤匪所占领的区域的居民，都帮助这些有罪的群众，而政府的军队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最微小的帮助也极困难。”但何应钦先生还是能够使大会存着某种希望：“赤匪的兵营里面发生了一种传染疫病，而且由于医药救治的缺乏，大批的人正在死亡。因着严冬的到来，他们的困难正不绝增加，因为他们只有少数人备有冬衣。”

所提到的“红军”连冬衣也没有的这事实，大会上的人们听着，是不是面有喜色，这在记录本里没有叙述。总之，决议案宣布了对于赤色威胁的一次新的围剿是政府首要的职责。大会认为北中国的被日军占领也没有对付赤色威胁这一事实重要。

为了实行这个决议，在上海自愿投军去抵抗日本，保卫他们的家和家族的士兵们，现在要开去攻打他们的祖国，攻打他们祖国中正在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区域了。但

是这些士兵们，带着他们的新来福枪，他们的灰色制服，他们闪着光辉的奖章和他们的手电筒，是不会得到“军令”许给他们的胜利的。这种胜利凭着什么造成？将怎样去获得？分配了的土地的重新合并？把乡村拿给封建领主的重新分配？贿赂制度的重新开始？罌粟花田的重新耕种？传教师的重新进去？新的学校、印刷所、图书馆、新闻纸的封闭吗？

他们想用武力强迫人民重新陷入无知的境地是可能的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瑞金举行的中国苏维埃大会上，有人报告了在四年以内，六个苏区有八百万人民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可笑的，却又不无理由的，英国报纸把这个数字加了一倍，而且写道：

“有一千六百万人民被教会了读书，这样，有煽动性的宣传印刷品，就可以接近他们了。”马克思、列宁和孙逸仙的著作刊行了一百万册。有一个城市，因为纸张缺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很快卖完了，人民拿着他们自己手造的纸张，走到印刷所，亲自印刷那本书。一个美国人写信到上海的“晚报”说，“在和匪区接界的所有的区域，饰着有名的共产党煽动家马克思和列宁头像的纸币，被看成了十足通用的法币。”

什么？军队开走以后，南京就再没有有趣的物事了吗？讲到其他，这是一座沉闷的城池吗？

我“完全”不能同意！看罢，譬如，建筑工程是怎样的在每一条马路上进行。这个不是市政工程，这是一个政治工程，这是英国为了南京一心一意地竭力去剿灭红军，付与南京的酬报。

从一九〇〇年起，要中国人负担的赔款，最近几年投资给

中国自身了。美国人为了宣传的缘故，用庚子赔款派送中国人到他们的大学去。但是这些学生，没有变成黄色美国人，却总是成了外国统治的反对者和革命的信徒。

英国没有美国这样傻。英国交出这笔中国钱，专门作为建设交通的用途，而且作为购买英国能以很好的价格供给材料的那些必要的用途。我们看见到处在建造出入口，因为它们是属于“交通”一类的。我们看见这属国政府的首都到处在建筑防御工程。我们看见到处在安放水管和电线，一个播音台建起来了，这样，英国的实业可以赚钱。我们看见到处有房子被拆毁，让路给宽阔的马路，沿着马路，在这政府的堡垒的防卫上所不需要的人便可以派去打人民。

出入这城市是非常困难的。古旧的城墙，那绕着城市的双重的圆圈，和通过城墙的有着守卫的城门，都修缮了；虽然飞机决不惯于从城堡的城门飞过，而从海军大炮射来的炮弹也从来没有被城堡的城墙所困窘。步兵连在每一个拱门下面守卫，并不是为了抵御现代的炮兵……准备抵御的敌军没有轰炸机，没有兵舰在扬子江，而且没有现代的炮队。准备抵御的敌军不是外敌。外敌是随时可以来到城门外面的。南京是常常准备着出逃的。

每一个人都被阻在城门口。在你可以走进这“人民的党”的城市和它的政府以前，你是什么人，出身和职业以及许可你进城的证书，卫兵都加以精密的查问。贫穷聚集在城外，在从火车站到城门去的中间。但是在城内，也有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多的污秽和悲惨。

农民和花缎织造者的水田和茅屋是在坚固的里城内，或者是在秦淮河的坚固的河堤的阴下，颓败的木舍是花缎织造

者的工场。他们用旧的碑石支撑着他们的织机。花样在织工用脚踩动的十根竹竿之间织了出来，装着贵重金线的梭从左到右地穿动，孩子们把黑线和金线连接起来。你会以为他们只是在毫无意义的在空中白白动着他们的手指：接线是这样快，使你看不到线。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孩子们摇着他们的头，先向右边，再向左边，好象“脚踏车六日赛”中的骑者一样。他们不能抬起头来张望，就是有客人来了也不能望望。飞翔在丝绢上面的，是四只金色羽毛的鸟，就是刚刚生下来的，也一样飞翔。它们消失了，于是又有四只新的金色羽毛的鸟，和以前的一样，飞翔在丝绢上面。它们的出现和它们的消逝，是在一种污秽和饥饿的氛围气里发生的。贵重织物织工的老婆乞求着一点小小的施舍。

织工不能出卖他的花缎的一码。他的所有织造品早在它们织好以前就已抵押给浙江的丝线批发商人了。到处有乞丐围绕着你，虎列拉和麻疯都很猖獗，而且没有东西制止它们。

许多灾难潜入了这城市，不管居留的限制，不管这城市的双重防卫。双重防卫？是的。南京有物质的堡垒，同时也有意识的堡垒，而意识的堡垒也是物质的一种。实在的，我一点也不懂，南京怎样可以被称为沉闷的城池。

意识卫城的砦堡高高屹立在空中：孙逸仙的陵墓。就是在华盛顿的林肯的宏壮陵墓（很明显的，这边是摹仿它的），也没有这样的豪华，这样的浪费。千百万金钱花费在民国的这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上面。明陵就在隔壁。明陵就在隔壁，这似乎是十分应该的。明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而孙逸仙，这位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仅仅几个月以后，就要

让位给那自命为天子的清朝的官吏袁世凯。孙逸仙有四次被逼得逃开了民国：他惧怕民国的统治者，正和以前惧怕帝国的统治者一样。当他做了广东政府的总统的时候，他——这位国民革命者——在大实业家和列强看来是过于关心社会状况了。他们发动了广东的商团去反对他，而麦克唐纳劳动内阁执政的英国供给了他们军火。反对者的对抗使孙逸仙理解了他们的利益；他充满了含糊和妥协的主义，变得更加界说分明，而且更加集中于社会的变革了。

一九二五年，他死了，他葬在这里。有一公里长的装饰着花瓶、方尖碑、和柱石的宽阔的大理石阶梯，通到这达于极度的大建筑物，通到那巨大的雕像，通到那石棺。这壮丽的陵墓却并不只是奢靡的大建筑物。它是有着实际目的的建筑物，一千万元并非虚掷。这是意识的防卫：看我们是怎样的尊重孙逸仙，是怎样的服膺于孙逸仙的精神。“我们”——那些现在的南京的统治者，那些被孙逸仙认识了而且辱骂了的人们；这些堕落的革命者，这些假革命者，在最近几年间，除了为他们自己打算升官发财以外，你没有看见他们做过什么。这些人败坏了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伟大的主义，而且使它荒谬可笑了。“你们和这一类人断绝关系，而且忘却他们吧……”

官僚们自己实行了这种绝交：一种浴血的绝交。现在他们掌握了政权。没有一样，没有一样孙逸仙的教训是被他们实现了的，没有一样孙逸仙要做的事情是他们企图实现的。外国人，他们的统治是他所猛烈反对的，却成了他的继承者的保护人。他所创造的工会变成了各业工人的黄色俱乐部。他的革命的农民协会被解散了。贼党们——芝加哥资本主义

的标志——享受着政府的恩惠。土匪将军们——封建统治的标志——是帝国的联盟的王子。鸦片贸易很繁盛，军火贸易很繁盛，儿童劳动很繁盛，厘金税收很繁盛。

恪守孙逸仙的理想的孙逸仙夫人，不得不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被列强的十四个暗探机关侦察着。如果她要走进中国地界，她很可能遭受那自称是她丈夫的党的那个党的狙击。在外国人当中，她唯一的朋友是美国女作家斯沫特莱 (Agnes Smedley)，和那围绕在遭受各方面的迫害和摧残的杂志“中国论坛”周围的勇敢的一群。

开去攻打苏区的军队，通过这条取了一个人的名字的马路，这个人在他临死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莫斯科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领事馆是目前上海黄浦江岸上的唯一空着的房子。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工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的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次予我国之援

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①

他死了，而中国警官们，好几百人，强暴地闯进了北京特许的外交区域，侵入苏维埃大使馆，逮捕了使馆僚属，抄去了一切书信和文件，而且占据了房屋。在上海江岸上的高价的地址中，只有一个是不再被使用了，一座单独的房屋空在那里：那白渡桥边的苏联公使馆^②。

这是××党^③对于孙逸仙的最后的，他的最紧切的训谕“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的驳斥。

一座空的房子可以比一座住了人的房子更饶趣味。一座有着新而壮丽的陵墓和绵延不断的军队行列的公吏和官僚的城市，未必是沉闷的。

我觉得南京“一点也”不沉闷。

① 这封信的中文，照录“中山全书”所载。虽然他和基希的书的英文译本所引文字略有出入，我却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他。

② 这篇报告，写于中苏复交以前。

③ ××党指国民党，当时因书报检查，不能明写（编者今注）。

街 道

北平的维也纳

当我们迷失在错杂的狭窄的中国街道中时，卡尔·马克思说奥地利是德国的中国那句话^①，就出现在脑海。于是我们真觉得好象是在一个亚洲的奥地利，在一个中国的维也纳一样。愉快和凄苦，整日喧闹的茶馆和平静的贸易，卑鄙和严肃，外国的实业和对外国人的仇恨，都同时存在着。星期天也常常是工作日。白天也常常是夜晚。只是在火前，没有炙肉的铁。

人们所看见的饥饿的人比健壮的人多，中国人比维也纳人更象维也纳人。以前的维斯托普内托一点也不能和前门大街相比。这前门大街，在地图上，应该是用那磷光似的笔画表示的。在维也纳的普内托，有着——或是曾经有着——一个五米高的中国人，站在卡拉法蒂轮转机的中央，拖着辫子，生着下垂的胡须，当小小的马绕着他跑的时候，他举起手来。但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五米高的欧洲人站在吐露福音的轮转机的中央。那末至少在这里，维也纳要强一点。当梅兰芳或雍竹君（这个女伶，西文名字叫做Rosa jung，是一

^① 恩格斯在他所作“革命与反革命”一书里曾说，奥地利是“欧洲的中国”。这本书一向被当作马克思所作。这里所说，想是出于这书。

个德国人的女儿)走到街上来的时候,也不会象一个舞台红伶在普内托出现时引起那样巨大的骚扰。在普老溪的奇异物展览场的人群,和“十八狱”庙里的人群比赛中,获得胜利的一定是普老溪。酒呢?北平完全缺乏酒。但是其他方面就不同了,在维也纳被称为“精致的丧仪”的丧仪,和中国的出殡仪仗比较起来,那是太可怜了。(在夜游的时候,人们可以撞见两三具饿死的尸体,但是他们不会有出殡仪仗。)我们说的是有一口可以象绅士一样的躺在里面的楠木灵柩,穿红绿衣服的杠夫和乐队的一种体面的出殡。这种出殡,后面还跟着纸扎的美丽的姑娘,和纸扎的一切应用的东西。Aerkauff‘Smeiu G, wand, ifhr in Himmel^①’。

把衣服换成现钱的处所就在那里。当铺往往就在对角。那种营业的时间总是比较晚的。

Indessen feiern wir auf jedena Fall
Nur Instigar das wilde Crneval

(Fanst II.)^②

通往中国城的半闭的门路

上海的外国租界,是用闷锁的铁门和中国地界隔离开的。现在,白种人又加上了许多路障和荷枪的守卫,而在沙袋和有钩刺的铁丝中间,留一个狭窄的出入口,因为西洋人

① 卖了我的服装,我云游于天上。

② 其间我们觉得更高兴的庆祝野蛮的戒肉节礼。——浮士德第二部。

不能够完全不要东方人。当然，买办们，这些外商的本地大经纪人没有住在中国地界。但是银钱兑换者住在中国地界，白种商人的黄种经理、推销员和收账员住在那里。最要紧的是白种商人的顾客和苦力住在那里。他需要他们，因此他们得进外国租界来，就是在进来的路上安置着有钩刺的铁丝和沙袋，刺刀和门闩，路障和法国巡捕，也要进来。

越 过 国 境

法国人浮着骄傲的微笑念“法华民国路”的路名——年轻的中华共和国怎么可以和古老的法兰西共和国同日而语呢？你一旦走过法华民国路，越过国界，你就要被这年青的共和国的五千年的生活，被奇异的各色人们所骚扰，被那种难于理解的声音和未曾习惯的物事所迷惑，这样一直到南市，到摆满货摊的区域。

工 场 和 店 铺 以 及 住 室 是 在 同 一 个 地 方

牙雕工人工作着，同时又售卖着。他们把象牙和猪骨雕成麻将牌，阳伞柄，烟管，香烟嘴，骰子，搔痒的挠子和梳头的圆梳。木雕工人用木头雕刻成灯笼和算盘珠子。在他们的毛刷之下，物件装饰上刺目的光彩的鱼，可怕的张开大口的龙的牙床，可怕的张着口的战神的眼睛。做伞的人琢磨着竹的伞骨，剪裁着，伞面，装镶着丝制的花边。篮子、扇子和雕印章的刀具的制造者，既是生产者又是商人，省却了经纪人。代写书信的人，把花了几个铜板的顾客所要求写的内

容写满一纸。相手家看着手上纹路的特点，满口是对于未来的预言。在人行道上理发匠，用一个安在一根竹签上的绒毛球清扫他们顾客的耳孔。那用彩色的纸做成的奇异的小屋，是准备做祖先的灵龕的。银色纸做成的元宝，象征着银锭，这是要在死者的坟前烧化的。吹糖人的把烧融的糖浆搓成奇异的物什，而且染了色。鸡鸭店的窗子里，挂着的象是小提琴，但仔细看去，原来是酱红的烧熟了的鸭子。摆在肉铺里用有色的油纸包着的，是一些羸瘦的火腿，这是从那豢养在云南省的猪身上割取下来的。磁做的高高的茶几和巨大的暖炉放在磁器店的外面，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小小的有着装饰花纹的杯子，瓶子，墨水盂，痰盂和许许多多放到鸟笼里去的食碟。

鸟店常常围满了中国人，他们好象生了根一样，好几点钟地站在那里凝望着，谛听着小小的金雀和那有着灿烂毛羽的日本夜莺的歌唱。中国人是鸟雀的热爱者，当他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小心地提着关了鸟的鸟笼，在茶馆里，把鸟笼放在身旁。许多从闸北逃来的难民，就单单救出了一个枕头和鸟笼。在售卖活物的商店的窗子里，蛤蟆和小鼠在同一个盒子里共同的好好过活，好象在那描写一只水鼠和一只蛤蟆爬上险峻的山岭去赏玩日落的诗里写的一样。这首诗，一般人认为是哥德在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躺在沙发上想出来的。人们买了乌龟和金鱼，把它们丢进茶馆近边的池子里放生。在中国，这算是一种善行。警察佩带的装在木盒里的毛瑟手枪是欧洲的制造品。

交通很匆忙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交通。正象河道上面的船只——开到城里去的米船和开到乡下去的大粪船——不让一尺水面空着一样，贫民区的人们也不让一尺地皮空着。男人们穿着垂到脚踝的长衫，女人们穿着蓝色的葛布裤子。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们用着她们跛了的脚——由于紧紧的缠绕弄得跛了的脚，象踏高跷一样地匆忙走着，好象时时刻刻都会跌倒一样。许多女人头顶秃了，也许是由于用头去搬运水壶和篮子的缘故。头发剃掉了，只在头顶留着一根很小的嫩芽一样的发辫，穿着前后都开口的长裤的幼童在马路上游戏。五岁大的孩子就要干活，去用锡箔糊成纸笼或尖细的元宝，那亡灵的钱帛。六岁和八岁大的，要去雕刻麻将牌，并在那上面着色，要用手推磨去磨黄豆，打扫工场和递送包裹。一排排的男人对着屋栅墙站着，在那里小便；一排裸露的左腿，因为他们的裤子上没有开口，整个的裤管要卷起来才行。

房子都很低，不象公共租界的房子那样有好几层。在公共租界，飘展在商店上面的旗帜很大，而且是用锦缎制成的，在那里，商号的招牌是金字，在那里，人们可以安安稳稳地抽鸦片烟。在中国城，抽鸦片烟是被禁止的，因此，从私运鸦片烟和在鸦片烟窟分享红利的外国人，不会遭受麻烦的竞争。在南市的铁器商人的陈列窗里，并不陈列下面这些货品，这些货品是法大马路的他们同行的主要商品：“抽大烟”所需要的鸦片烟枪、烟钎子、烟盘子和其他器具。

乞 丐

乞丐们一排一排挤得紧紧的蹲在一块。他们的身世写在摊在他们面前的格子布上。有些人——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用粉笔在人行道上写着他们的自传。过路人把他们的布施投在那写着特别引起他们同情的遭遇的格子布上。关于乞丐行帮不收女人的这个事实，马路上没有露出什么形迹：女乞丐不能再多了。

上海的欧洲人中的巨大愤慨

现在，在上海的乞丐当中也可以找到白种人，在体格上和政治意识上都是白种人：白俄侨民。他们总是喝醉了酒，向中国人求乞。以前，这种穷困的欧洲人有一种可以赚钱糊口的可靠方法，他直截了当地去拉黄包车，白种人不能让他们的名誉给败坏，他们尽快的替他们买了回家的船票。对于白俄流氓，尤其是常常接待中国人的俄侨妇女，他们很高兴这样的处置，要是他们不是这样多的话！老赫德^①会说怎样的话——他在一百五十年前说过：“中国人不准我们欧洲民族进去，而且对于荷兰人和俄国人和耶稣教徒加以极度的限制的这个事实，不仅和他们整个的思考方式相调和，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被证实，只要是他们注意了在他们自己国度里，在他们周围和他们旁边的欧洲人的行为的话。”在那时候，

^① Son Herder 十八世纪德国著作家。

惊醒了中国人的“鞑靼人的自尊心”的，只是欧洲商人的商业行为，不是一群喝醉了酒的乞丐和娼妓。

异教徒是仁慈的吗？决不！

每三四个过路人中，差不多总有一个人拿一个铜板给乞丐。这没有逃掉基督教教堂传教师们的注意，他们宣讲着布施是使主欢喜的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政策；但因为浅薄的异教徒是不能有仁慈的基督教徒的心肠的，所以传教师们说明这种乐善好施是由于害怕乞丐行帮方面的报复，或是害怕那和残废老弱的人互相结托的魔鬼。要是每一个迟迟不肯施舍的施主，都得这么追求的话，乞丐一定没有工夫去求乞，而魔鬼也一定没有工夫去作祟了，

关于药号

医药常常带着迷信，但是中国的迷信是象煞有介事。一只画得很好看的老虎在每一家药号的门上拱着背，因为老虎在医学上有适宜于健康的声名，早在欧洲知道荷尔蒙^①和内分泌以前，在中国，老虎的睾丸对于虚弱的人已奏着奇效。人参，曼陀罗花，一种好象人的躯体一样的根子，有着这同样的性能。这里人民是怎样的迷信呵！只是，经过欧洲化学家的分析，才知道人参含着大量的赐保命和可兰林。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海参崴的中国商号购买从乌苏里斯克区和普里莫

^① Hormone—一种内分泌物。

收集起来的这种植物的根，把它们装运到中国去。这宗出口货，每年平均可以收入四五〇一〇〇〇卢布。当海参崴的商人看到他们的含着赐保命的商品在美国和满洲被试种，正在变成不大有利的事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一种叫做“Panit”的物产，那种乌苏里斯克的羚羊角研成的粉末^①，拿到市场上来，而且在广告上说明它有壮阳的性质。中国怎么能逃避人口过剩希望呢！

一个顾客带着药方到药号来的事，是很少的，他带着他的病痛走到象王者一样坐在漆成褐色的栏栅后面的医生那里——药剂师本人常常就是医生——诊病，开药方，配药和售药，都是他一手来。主要的是药的颜色：黄色的治肚皮，红色的治血液和心脏，棕色的治肝脏，蓝色的治眼睛，褐色的治肠子。一个相信自然治疗的母亲，只要吃点研成粉末的乌龟肉，就可以使婴儿自动地非常迅速地降生下来。

医生的广告！

医生的寓所，可以由挂在屋子正墙上的许多木质的还愿匾识别出来，感恩的病家，用这种方法宣扬他治好疾病的医术。这种匾额的大小——这是些法外的中国人——是不为任何医药会议所限制的。医生的诊室装点着摆在玻璃盒里的没有风趣的银盾，和我们的游艺会赠送的奖品一样，事实上，它们是成功的治疗的奖品。牙医却不能有这种匾额和银盾的夸耀；他的寓所的正面没有宽阔的墙，也没有诊室。牙医生

^① 是指鹿茸。

——至少是平民的牙医生——是在露天底下诊病的。他纪念的装饰品是穿在一起的几百个牙齿。他的广告是一只系在链条上面的小小的猴子——这个，其实是并不需要的，因为拔牙的时候，大家都在旁边看着，都怀着要尝一尝这同样的治疗的渴望。

当 铺

不管这种没有窗子的，半圆的建筑物是怎样的多——差不多在每一个街角上都有一家当铺——却还是常常的挤满了人，特别是在夜晚。顾客们拿着青铜的烟具、佛像、丝制的衣裳、鸭绒和椅垫走进来，用恳求和咒骂，竭力想讨到一笔较多的货款。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这么嘈杂的当铺。当铺在剥削人民这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在维特富格（K.A. Wittfogel）的“中国的实业和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一书中得到了了解。利息按月计算，贷出金额的一部分就在付款时，被作为收取的利息扣除了。典押的东西估价很低，典押的期间也很短促。典当繁盛的地方主要是在夜间场所繁盛的区域。这个事实，使人想起了纽约的黑人区域，哈伦姆。在那里，霓虹灯耀眼的辉耀着，成群的黑人挤进当铺，去当他们的无尾的常礼服和萨克斯管。这里和那里一样，这里比那里更是这样：当铺是一种失常的作乐和小小的奢华，使生活离开了原来的样式的要素。

游 戏 场

在“大世界”和“新世界”附近，当铺拥挤不堪。“大世界”和“新世界”是上海的游戏场。这是长长的，独立的，六层楼的娱乐场，里面有花园，剧场，走索表演，赌博台，小孩子的跳舞表演，掷椰子戏，抽彩，射击房，电影，哈哈镜和其他一切从欧洲游戏场学来的有吸引力的玩意。雏妓同她们的龟婆一道徘徊着。屋顶花园上，学生们——或是那些装扮做学生的人们——在打小高尔夫球。

在北平，前门大街实行了从社会现实中提供娱乐的作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下列各种营业：

玉石雕琢店	乐器店
毛毡织造厂	侧像绘画处
宝石琢磨店	铜器铸造所
古董店	银楼
景泰蓝工场	茶店
花爆店	风扇修理店
灯笼制造工场	卖龟处
阳伞铺	西瓜子摊
花瓶商店	纸扎店
纸花店	骆驼鞍具店
殡仪承办处	鸦片烟灯店
陪伴亡者的玩偶售卖处	

这些营业和千百种其他营业，都挂着写了金字的丝绒商旗，象行星一样大的灯笼，青白色的纸花和雕刻的门，装满了金鱼的盆摆在店铺前面。在每一条街的转角，都有不需要陈列窗，不需要广告的当铺的圆形厚重的建筑物。变压器把愉快的玩物购买者、鸦片窟的常客、嘻笑的戏迷、阔绰浴室的顾客，变成前门大街一切诱惑、招引、迷人的光彩之中偷偷走动的人物：变成了醒盹的乞丐，变成了背着婴孩的忧伤褴褛的女人，变成了象橄榄一样绿色的脸孔的憔悴蹒跚的抽鸦片烟的男子。

中 国 戏

一 毛巾，象征主义和毛巾

如果要记述中国的戏，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应该从毛巾着手。因为还在舞台上的戏剧开始以前，毛巾的戏剧早开始了：旁边通路上的毛巾浸湿者，把刚刚浸湿的毛巾掷给中间通路上的毛巾分配者，分配者又把用过的毛巾掷回去，因此，在演戏前和演戏中，戏场里充满了湿毛巾急急投掷的飞舞。

在明亮的观众席，观众用那发着蒸气的热毛巾揩拭他们的前额、颈、眼睛和耳朵（因此大大帮助了沙眼和天疱疮的流行）。除此以外，就搨扇子，和邻座谈天，喝茶，嗑葵花子，嗑罌粟花子，嗑西瓜子，吸香烟，从那不停不息地沿着一排排座位叫卖他们货物的小贩那里购买巧克力和糕点。

自然，欧洲的优伶是宁愿选取另外一种观众的，而且，欧洲的优伶也许是对的。可是，对于中国的优伶，是再找不到比中国观众更理想的观众了！

观众熟悉戏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单是这一点就不大适合欧洲舞台的演员。正象一位戏院经理，在他的剧本顾问提议为了纪念席勒的诞辰，应该指派角色演出Lied Von der Glocke（“钟声之歌”）的时候所说的话：“不要作这样的提议罢，这个剧本我的观众完全记得，而我的演员却得要学

习！”

在中国，观众完全记得古典剧本，但是戏子记得更清楚。他完全记得剧本，虽然他不会书写（这又和欧洲不同）。他是在童年时代从师父那里学来的，他的师父同样也没有写好或印就的脚本供使用。象这样，已经有一千年了。

观众也站在舞台旁边。他们挤得这样满，使得演员登场时都有困难。但他总还是设法挤了出来，所以对出现在舞台上的旁观者，我们是没有什么非难的。

但是大群观光者在台上的出现，是十分可喜的。从演员的观点看来，是可喜的，演员感觉到他登场以后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的愉快。从观光的人们看来，这也是可喜的，他们根本不用买戏票，从侧门涌了进来，可以听见戏台上的演唱，而且当演员装扮时也可以偷偷看到。

戏迷们这种免费入场叫做“听站戏”。“听站戏”的人都不坐下，都不喝茶，都不搨扇子，都不用热毛巾去擦拭前额。每当演唱者所演唱的一段戏文，正和他的先辈和先辈的先辈，所演唱的一模一样时，“听站戏”的人们没有狂欢地叫“好，好，”的权利。这种听白戏的人们，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直立在戏台后面好几个钟头。

唐明皇是出席每一个戏园每一回演出的观众。他坐在戏台后面的一个玻璃框子里，你很容易误把他当做是舞台道具，特别是，你如果不熟悉，在中国道具并不藏在戏台后面，却都整整齐齐的摆在观众完全可以看到的一张道具桌上。以准备应用时，你会更容易这样误认。需要道具时，台上打杂的人就把它从桌上取下。比方，还在公主由于一时的热情冲动，准备投在她的配偶的脚边以前，一个听差已经在她

面前铺好了一张绿色和金色的毡毯，就象他预先就知道这情感的爆发一样。如果女主角表露了快要发疯的征候的话，穿着普通衣服的化妆者走到舞台上来，没有把一切在场的人放在眼里，敏捷地用手帮助打散她的头发，解开她的衣服，却又维持她的平静和威仪；最后，为了使她确信这改装是成功的，化妆者从道具桌上拿来一面镜子，女主角可以如愿的观赏她自己。

是的，一切道具和一切布景都在舞台上，因此，坐在舞台后面那玻璃框子里的唐明皇不是一种道具，也不是一个布景。

他是一个神，一个戏园的神。变成一个神，在他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先前是一位皇帝。做皇帝的时候，为了他所爱恋的妃子杨贵妃——他是这样强烈的爱她，把她收入了他的后宫——的娱乐，他发明了舞台剧和舞台音乐。他亲自训练演员，在一座梨园里举办了他的戏园。因为这缘故，中国优伶现在还被称为“梨园弟子”，而且没有一个戏园——就是梅兰芳的戏园也一样——后台上可以没有唐明皇的雕像。

就是梅兰芳的戏园也是一样。这一点是该被强调的。因为就在这以前，梅兰芳游历了美国，在那里成为一个名誉博士，回国时，他是这样热衷于那个有着很高教养的国家的戏剧文化。他，一个柔韧的折衷主义者，肩起了改革中国戏剧的任务。中国的旧剧有许多可以非难的地方，但是谈到改革它，就好象要把演说术改作爵士音乐或是把罗马公所改造成“新的实用主义”的样式一样。

中国旧剧是一种封建的宫廷艺术形式，这是用来赞美朝廷和贵族，以及达官显宦的德行的——一种对于民众的催眠

曲。这种戏剧是保守的——保守到这种程度，使得它失掉了一切和人民生活的联系。

这样，观众望着台上的人物，他们发着尖声，不象常人的说话，化装成不象人类的脸孔，一点不象人，倒象荒诞无稽的东西。在一般人看来，这就象狮子和夜莺在一起对话。当祖母对小孩子们讲话时，小孩们都很欢喜，但要是她在故事中插进一点什么改变时，他们都会非常生气，他们要求照原样的姿势，照原样的声调，照原样的言语。

不，美国的名誉博士梅兰芳，你不能够改革中国的旧剧，它应该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存在和衰落。你，你自己就是这个范畴的亚种；你，你这装扮旦角的男子；你，你这用脚跟走路，脚趾朝天——没有一个尘世的女人是那样走法的！——的男子；你，你这声音尖利的，头上饰满金银花枝的男子；你，梅兰芳博士。你的舞台处理，不可能灌注美国的血液，根本不能灌注血液，因为它们正和中国绘画缺少阴影一样的缺少血液，因为他们是不现实的。

当你戏园里的每一个人看见摇着毛帚的演员就立即知道是骑者——比真骑一匹真马还要明白得多时，你还要把真马牵上舞台吗？

难道要那刚刚被杀的人，不再在死去以后站起来很快离开舞台，却依旧躺在那里，装做一具流血的死尸吗？他的刚刚成了寡妇的妻，虔诚地俯在那看不见的死者身上，楼厅和正厅的观客清晰地看见死尸的形体显现在他们面前，正在它应该躺着而实际并没有躺着的地方。

为什么要凶猛地抓住被捕的人的后颈呢——一个扮演警务通报者的龙套，象征地伸出手，是谁都知道的捕人的传统

的标志。

这位官员脸上的白色油彩充分表明了他滥用他的尊严的职权——你要给他好莱坞阴谋家的化装吗？宫廷的弄臣为什么要丑角的剑和铃，以及穿起杂色的紧身衣呢，当他鼻上涂着的一块白粉，十足明显的表明了他是一个宫廷弄臣的时候？

为什么要使格斗——这种并列地刺着，并列地击着，旋转着，掷动着枪支的野蛮而又凶猛，带着卖艺者的风雅的舞蹈——带着现实性呢？战事的起落为什么要群众场面呢，当一个阴郁的变戏法者挥动的一支剑——至多是两个舞蹈者的有节奏的决斗——已经够了的时候？

为什么要布景呢，当祖父和孙儿都知道演员登场处上面的灰色旗帜就是城门的时候？

为什么台上要朦胧的灯光，为什么要灯光的效果呢，当白天转入夜晚时，是由音乐节奏惊心动魄地——对于西方人的耳朵，是太惊心动魄了——表示了的时候？为什么要轿呢，当轿夫在坐轿的人旁边拿着两根竹竿跟着他走已经够了的时候？为什么要替窥看者布置一个巧妙的藏身处呢，当他为了看到一切而自己不被看到的缘故，他只要简单的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就行了的时候？

为什么要布景画师和布景制作师呢？当每一个观众都由他的祖先传授了浮士德式的愿望的实践，在那使他发生了兴趣的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的瞬间，他的幻术的大衣也把他载到了那里的时候？王子的脑后插着两根雉鸡毛，每一根有一码长——这样，现在，我们是在野蛮人的地方，而我们的王子被擒了，他走路的时候举起他的脚，在我们眼前摆动

着，我们可以看见实际并不存在的那种走路的步法。

“从左边出”，“从右边入”——舞台监督用不着要这样提示。有两张门通到舞台上，仅仅用一张薄薄的门帘掩蔽着。一切演员都从左边的门上场。此外到处有的是门，只是人们需要学着去辨认它们罢了。要是有什么人走进屋子或是离开屋子的话，他只要伸出他的两手，好象在把一个莫大的门闩拉到一边，而且在推开一张堂堂皇皇的门一样——你的想象简直不能有一张比这更堂皇的门了。

这一切可能改变吗？不可能的。而改良主义——因为这是问题的本质——是不会触到根本的，它是以涂抹病症为满足的。上面列举的一切是属于中国封建宫廷戏剧的基本东西，就是梅兰芳也不能够改变它。但如果他竭力想要使它现代化，他的成功只是在破坏它这一点上。他把乐师们撵出了舞台，他把观众们撵出了舞台，他甚至于不让听白戏的汹涌人群走进后台。在他的戏里，灯光效果起了作用，他为了所演的角色的便利改变戏中的动作，甚至于敢在一个抒情的场面（在“西厢”里，这曲本的德文翻译是 **Vinzenz Hundhausen** 的杰作）借着淫猥的表演来博得特别的喝采。

这是梅兰芳博士——他不时变成一个发出假声的优雅、美丽的女演员——修改中国旧剧的情形。他没有能够挽救它或是灭绝它，

而且就是在他的“开明的戏场”里，最贵重的丝绸服装和最精美的演出技艺，也不能够妨碍那些传播沙眼和天疱疹的毛巾在空中飞舞，妨碍递接那些毛巾的游戏。这种游戏，如果你要记述中国戏剧，不管高兴不高兴，你总得从它着手，用它结尾的。

二 我们去购买戏装

他是一位“旦角”。他扮演女性的角色，在舞台上用女子的最高音歌唱。在舞台上他沿着一条看不见的直线走路，就象走钢丝的舞蹈者一样。在哑剧中或是歌唱中，他把他的身体弯作S形。他的私生活是同性的。今天他要出去买衣服，蒙他允许我可以陪伴他去。(Honi soitgui mal y pensc! 对于这个，怀着邪念的人，是可羞的。)

洋车把我们拉过北平的前门大街，拉到一家商店。店里面挤满了店主、店员、学徒和苦力，他们除了这种关系以外，还是兄弟、儿子、侄儿或是相互间的远亲。这一点和大部分的商店一样。但是这人员的大集中，在我们看来，是很适当的，因为中国戏装是一种不大可能有大批购买者的货物。事实是这样，每一个剧本，每一种角色和每一个演员，都被严格的服装的规例限制了。自然，有一天，演员会把他的旧袍子换一件新的；自然，有一天，他会把他的奢华的衣服换成更奢华的。但是，中国旧剧永远是演同样的剧本，不可能有初夜开演的特别的装束，也没有关于服装的特别的考虑。或者也许有罢？

无论如何，做这同行生意的邻家店铺是没有一个顾客的，从这点看来，也许可以得到下面结论，店主和他的兄弟们和异父或异母的兄弟们，孩子们的孩子们和亲戚们的孩子们，堂兄弟们和乡下的堂兄弟们，一道出现在他的门口，不过是嫉妒地来看我们，当我们从洋车上下来，一直走进和他竞争的商店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遇着了两位顾客。其中的一个和我的朋友认识，他也和我的朋友一样是个戏子，但却是个恰恰相反的戏子：一个净角。净角是恶魔样的人，一个强盗首领或是一支军队的长官。他出阵的化妆是可怕的，他的眼睛被化妆掩盖了，舞台上的眼睛——这个使人生畏——画在他的上额两边。他发出一种深沉的声音，大摇大摆地走路。在这里，在这屋子里，他穿着没有装饰的日常衣服，在替他的徒弟买点什么东西，从中揩点油。我们可以毫不战慄地望着这净角，他使人想起西方扮演奇人的优伶。

至于第二个顾客，他并不是一个“梨园弟子”，不过是一个拉胡琴的人。我的朋友对他很冷淡。他的轻蔑是为了看不起拉胡琴的人（虽然戏子自身是在一个非常下贱的等级上，在介乎兵士和娼妓之间）；但是，他的轻蔑也是为了一般的异性之间的事，和这种邪气开始在剧场流行起来的事实。

最近，在中国的舞台上，旦角有时竟由女性担任了。在表演的时候，她们正和男性戏子一样，需要一把胡琴不断地伴奏，胡琴的节奏配合着演员的舞蹈身段，而且替他们的歌唱创造一种境地。没有乐谱，经过了多少岁月的共同演唱，音乐已经融和在表演之中，没有拉胡琴的人，戏子是根本不能登场的。如果戏子是一个女的，拉胡琴的人常常要依仗他的地位，威胁拒绝演奏，或是散伙，要是他的合作者不愿遂行他的旨意的话。

这店铺里的我们的顾客同伴和他的女戏子的关系这样的好，他可以替她购买戏装，掠取适当的外快，这在以前只是戏子的师父才保有的一种特权。

“淫乱和女人一道传入剧场了，”我的同伴喃喃地说。

我默不做声。

“中国的这种不幸是对欧洲的模仿。”

我低了我的头。

“这是你们的罪过！”

我带着惭愧颤抖了。我很幸运，我们立即被衣服商人的家族包围，问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一件红的绣花短衣和一条红裤。在我们不久将要出场的一出戏的第三幕，我们为了谋杀亲夫的嫌疑要被捕，而在中国旧剧的舞台上，将要被捕的人若不是穿着一件红的短衣出现的话，不管是怎样的突然，怎样的意料不到，被捕的事是不能发生的。

此外，我们要买一个木质的颈枷。这是一块木板，中世纪的欧洲用它来扣罪人的颈子，而罪人的手腕被扣在这种刑具的两个小洞里。在中国，这种刑具现在还存在，甚至于在舞台上也还存在，在别的方面，舞台上是摈绝了现实意义，局限于象征的表演的。

在我们期待着演出的为了谋杀亲夫的事将要被捕的戏里，我们要把这块木板围在我们的颈子上，一直到判明了犯罪的不是我们，而是被谋害者的另外一个老婆的时候。

不仅是这样。这个东西我们得自己去买——笑，你欧洲的戏院经理。我们需要那适合我们的颈子而且颜色又不和我们的脸色不相调和的一个。我们需要那蒙着深蓝色的丝绢而且饰着真珠的一个。但是现在，我们和一群店员的亲戚，和一位梨园弟子，以及一位拉胡琴的人同在这个商店，没有备办表明被捕的红衣，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木质的颈枷。在这里，我们能买到的只有陈列窗里的东西。这里被陈列着的，

被绸衣的色彩吸引了的前门大街的路人会走进来，为了有趣的化装的目的买一件衣服。这里，常来的顾客走进来看看，这样，竞争的邻家和他的亲族大生嫉妒。这里，净、丑、生、旦、末，大家会见了，而且在他们被带到这五种不同类的人物的五种个别的服装店去以前，他们一道去喝茶。

同着许多伴送者，我们走出后门，沿着摆满了布匹衣服的地摊的小巷走到旦角的商店去。藏着戏装的巨大的漆箱庄严地慢慢地拿了出来，而且庄严地慢慢地打开来，给我们看那绣花的绸衣和锦缎。我的朋友试着短衣、小的上衣和裤子——害羞的，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正如太太们在她们的女服裁缝店的一般情形一样，选择是快的，——自然，颜色是已经预先约定的——两小时以内，我的朋友居然能够决择了一种装扮。那绣在红色底子上的生着叭儿狗嘴巴的飞鱼完全合我们的意，那微带堇色的衣里完全合我们的意。长长的衣袖，与其说是衣袖倒不如说是羽翼，用白色的丝绸接长了，长得差不多垂到了地上。

在这选衣和试衣所需的并不过多的时间中，价钱也终于讲定了——三十二元。于是店家又拿出了各种桌围，御座的帷幔和椅垫给我们看。舞台的道具——笑，你欧洲的剧场经理！——由演员自备，这样，它们可以和他的服装相配合。

比较花费时间的是木质的颈枷，虽然一切木质的颈枷都是同一个式样。那种传统的鱼的模样。但是，终于也很快地发现有恰恰适合我同伴的纤细的颈子和纤细的手腕的洞孔的一个。使我们感到不满的是那丝织的蒙布的颜色和珍珠的排列。最后我们选了一块深蓝色的锦缎，而且画了一个表示我们要珍珠和金箔的装饰怎样排列的图案。但是，因为我们

没有方法知道这个刑具改作好了以后是否和被捕的人穿的光彩夺目的红衣相称，我们暂不付款，而且把两样货物都留了下来。

将近六个钟头的停留以后，我们从商店里走了出来，经过出售武士的装束的店铺。在这里，我们的同事，扮演净角的演员正在挑选一面三角旗。这是凶猛的战将用来插在他们背后的，每一只角象征一〇·〇〇〇军队，代替——笑，你美国的电影导演！——一〇·〇〇〇后备演员。

我们和我们的带了三万人的同事告别了。他说他希望明天在这里再会见我们，他为了完成他的挑选，还要到这里来。

中国关于旧剧的书籍，通通记录着：一切舞台装束被传统牢牢地限定了，在近九百年间简直很少改变。

译 后 附 记

本书原作是德文，我是根据达维德生 (Michael Davidson) 的英译重译的。

书中有几个无法调查的人名、地名，和不便写出的人名，一律译音。

书中有一两个作者的小错误（如北平有孔的双铜元），译文给改正了。

书中注释，除一个是英译者所加外，余为重译者所加。

译本书时，关于许多地名人名和其他的调查，蒙许多朋友帮助，在这里感谢他们。

基希是著名的德国报告文学家。他在轻快的笑谈间夹着逼人的严肃的风格，他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正义感，不负他的盛名，使他成为中国新起的报告文学者的良好的模范。

这书里的二十三篇文章，描写了上海，北平，南京三处地方的社会状况。这中间有榨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丑态笑剧，有受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基希带着充分的理解，和炽热的同情，描写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被人恣意宰割，放肆欺侮的时候，基希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使我们格外感动。他是中国的真挚的友人，是中华民族的亲切的知己。

校完这本书，正是北平、天津相继沦亡的时候，这真使人悲痛。那么，千百年的故都竟也沦于敌手，这本书里关于

北平的描写，竟成了对于失地的伤心的追忆么？

这伤痛不会长久的。我们会赶走日寇，收复所有失地，重振基希所称谓的“鞑靼人的骄傲”。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再一个附记

本书于去年七月八日在上海校好后不久，淞沪战争再起，于是，描写了一二八初次淞沪战争时日军暴行的本书的铅版，在八一三再度淞沪战争中，被日军的炮火毁去了。所幸书店保存了其所校改的一份校样，使它还有在汉口出版的机会。

这次汉口的版本，我不满意。字太小，也太挤了，错字也多。我不愿意基希的名作，以这么卑微的形式在中国出现。但是我没有法子，版权早不属于我，书店急于出版，当我来到汉口时，书的十分之八九已经制成纸板，我只能在纸板上校阅一次，尽可能地改正了几个重要的错字。

本来，有许多没有确定，或是不应写出的名字，我都译音，而且在上面注明了“译音”两个字。但不知是谁，在有的地方，把“译音”两字勾去了，有的地方却还留着。更使人难于理解。要是我早来几天，就不致如此。

本书是作者六年前的著作，有许多地方是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形势的。但他反对日本法西斯，描写日寇暴行的每一个字，都将有永远的价值。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口。